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七章（下）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

第七章

1949年-1966年

––

继续讲述中国宪法、人大、政协、政府组织架构

回首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在1911-1949年期间的三十八年时间，中国与亚洲第一个共和梦擦肩而过。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无数国民革命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渴望在中国建立起来一个人人平等、遵纪守法、天下为公的社会。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两千年改朝换代历史中的几乎唯一一次没有导致大规模国内战争、生灵涂炭的朝代统治变革。在基本上和平的过程下，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

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是建立在一个试图仿效美国参众两院民主制度的结构上的。然而，由于袁世凯的称帝，更由于袁世凯死去以后的原新军将领在各地盘踞，导致喧嚣混乱的北洋军阀时代。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间断地实行着参议院、众议院等制度。蒋介石北伐以后，从1927年至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中国政治经济取得了很多长足的进步。1947年，中华民国通过宪法，希望开始一种以人权、平等、民主的方式来建设战后中国。但是，自从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坐大，并在随后四年的惨烈内战中，以流氓、欺骗、厚颜无耻、欺瞒天下、政治鼓动、血腥镇压等等手段，夺取了中国政权，并开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

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从专制暴政的角度而言，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超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中共统治下，整个中国人的社会不仅处于官本位状态下，而且处于思想桎梏、经济桎梏、文化桎梏、人身桎梏的状态之下。中国的所谓宪法，人大，政协等等政治概念、文件、机构、组织，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赤裸裸的欺骗、冒天下之大不讳。甚至，这些虚假的东西并非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首创，而是对于苏联虚假政治制度的全面抄袭，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宪法，与其说是对于政府政治组织架构的约定性法律文件【正如西方的美国、英国、乃至日本战后的宪法那样】，不如说是一个空洞的、充满口号式堆砌的废纸一张。甚至即使如此，在中共统治七十多年中，也要一直地不停推翻宪法、不断地重写宪法，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____

中共党内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制度，不但成为欺压人民、施行专制暴政的工具，不但成为禁锢中国人思想、经济、人身自由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互相残酷斗争倾轧的平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中，不仅广大中国人民遭到了生灵涂炭、人生禁锢的苦难，而且，中国共

产党各层干部、乃至高层领导阶层中，都遭受了许多残酷斗争所带来的绞肉机一般的痛苦和苦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中，常常是恶人得势，老实人遭殃，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信奉“厚黑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至贱则无敌”。

这种血腥残酷的政治内斗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征，也是苏联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等等许多二十世纪的共产党的历史；这是由它们的残暴专制政权特征所决定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E6%AD%B7%E5%8F%B2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指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接受苏联共产党主导的第三国际指挥和援助。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决裂。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掌握的武装力量，与国民政府开展长达10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长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以苏联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影响，改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掌权。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打击了中华民国国军，使其退守台湾，进而取得大陆地区及其绝大多数的统治权。在1949年10月时，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战败的中华民国政府形成两岸分治的局面延续至今。

自1980年代开始排除意识型态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与数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党维持交流，其中包含许多采取民主制度的一党制国家执政党，以及在其他国家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团体。而在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瓦解东欧民主化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共产党于1991年时开始强调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发展政党交流，并且继续维持和世界各地非执政党的共产党联系。

成立前奏（1919-1920）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势力陆续侵入中国，使得社会结构从发生改变，陆续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与此同时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出现工人并且不断成长，到了1919年时人数已经达到200万人左右。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苏俄成立，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无产者宣言》，鼓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最早起源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所引起的新文化运动，当时许多改进中国社会的主张引起许多讨论，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也被中国知识分子引入，并且和工人运动开始结合。不过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有关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成为热门。其中许多主张共产主义可以改善中国社会的学者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于中国各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与此同时，李大钊则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1919年3月俄国第三国际宣告成立，鼓励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了隔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第三国际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1919年，俄共（布）决定在东亚发动民众斗争。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开始有关于建立共产党讨论。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库兹涅佐娃、杨明斋（翻译）五人作为代表前往观察中国状况，计划在上海建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并且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吴廷康随后在翻译杨明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与李大钊会面，之后则到访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商讨建党问题。同年5月开始，陈独秀邀请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共产主义支持者共同商讨建党事宜。7月，在华俄共党员开会，认为应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后来这在上海组建的首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中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而在早期组织建立后，包括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

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

尽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否要在中华民国政坛从事政治改革之论点有所差异，然而两人都把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开创性的行动，认为它预示著许多被压迫的国家即将进入新的时代。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市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则在济南市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决裂后，1921年春季陈独秀联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担任书记。同一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早期组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并未统一名称，其名称包括有“共产党”、“共产党支部”或者是“共产党小组”，后来则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参考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主义运作，并且被蔡和森等学术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

这些共产主义工作小组成员有组织且有计划地扩大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且批判各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还在各个地方还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并且领导工人成立工会以发动工人运动，这些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自身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发行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

积极创办了以工人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刊物，借此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这包括有上海市发行的《劳动界》，北京市发行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市发行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市发行的《劳动者》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进而举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同时还在各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国际时代（1920-1942）

新生时期（1920-1923）

民国九年（1920年）俄共（布）为了领导远东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时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的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以苏俄《生活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与上海的陈独秀、戴传贤（戴季陶）、张东荪建立了联系。

4月底，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向他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并向上海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资助。8月上旬，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称“中共上海支部”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所以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当代中国学界的正统观点，亦将它的成立视

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次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是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陈独秀还在另外几个城市（北京、汉口、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及巴黎）中发展了组织，并组织捣毁焚烧了与其观点相左的北京晨报馆。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该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中国科的工作任务是:进行党的建设、工会建设,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出版工作等。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间，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

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俄国，随后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书记，负责与中国、蒙古、日本、朝鲜等国的革命者联系，指导开展革命运动。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

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为了方便在中国南方变现，很多情况下不是卢布纸币现钞，而是珠宝、钻石甚至是鸦片），而被指责为“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 陈独秀个人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称将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但由于现实原因，最终妥协，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经费仍是由总部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提供。

共产国际驻中国支部代表

代表　任期

马林　1921年－1924年

维经斯基　　1924年5月－1927年4月

民国十年（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共有57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于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7月，在上海公开成立工人维权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陆续成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分部，发动工人维权罢工活动。

民国11年（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指导。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自民国12年至16年（1923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122次讨论中国革命的会议，作出了738个决议。

中共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大小

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惨重的一幕。

民国十年（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得到中国大总统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之后马林提议中共应该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马林推行“党内合作”。

1922年1月，莫斯科召开劳动者大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否定了中共的思路，要求与资产阶级合作反日。陈独秀最初对马林的提议不屑一顾，依旧投身工人运动，到6月建立了13个工会。中共在广州举行劳动大会，吸引了一些海员领袖入党。彭湃到海陆丰组织农会。7月，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支部，在其命令下与国民党合作。8月，吴佩孚派中共筹建工会，宣传劳工权益，驱逐铁路系统的奉系势力。中共将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积极支持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9月，李立三发动安源煤矿罢工，成功追讨欠薪，同期罗章龙发动的罢工则被取缔。11月，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开始支持党内合作、外蒙独立。这年中共推动罢工超100次。

民国11年（1922年）9月，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3-1927）

加入国民党

民国12年（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或称孙越宣言，开始联俄容共的策略。之后2月派廖仲恺继续与苏联谈判，8月又派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军事。10月，聘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为顾问，负责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类似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通过了党的“三大”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的决议案》。中共三大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中共系的活动

民国13年（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阐明了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国民党的“一全”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在苏联的援助下，民国13年（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黄埔军校与以往军校的不同，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依照苏联红军的样式。黄埔军校的成立为国民革命军奠定基础，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林彪、徐向前等解放军名将皆出自黄埔军校。

民国15年（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进行土地改革。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1925年5月30日，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在国民党、青帮和商会的协助下，中共派刘少奇和李立三成立上海总工会，又在广州成立全国总工会。6月，国共发动广州、香港罢工，到10月，中共党员增至2428人，到罢工结束时增至1.85万人，工人占60%。秋，段祺瑞（奉系）查封工会，苏联大力援助冯玉祥，国共也在北京发动示威倒段，最终归于失败。11月，邹鲁、林森等国民党元老出面表达不满，维经斯基要求中共收敛，缓和与“中派”戴季陶等的矛盾。

合作破裂

孙中山去世导致的国民党权力真空和权力斗争，国民党派系丛生。中共在权力斗争中也加紧行动，控制党政要害部门，联合国民党左派，分化国民党；其领导的农民运动亦使军方利益受到了冲击。最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权斗中败北。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主导的北洋政府派军警突击搜查苏联大使馆，搜查出多份苏联和中共分裂中国罪证，并逮捕李大钊等中共人员，并以叛国罪起诉处死。

蒋介石识破斯大林令中共通过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阴谋，奋起反苏清共，汪精卫和平分共。 民国16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起清党，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及亲共国民党员。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批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7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中共退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成立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参加中央领导

工作。当日，鲍罗廷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陈独秀动身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决定在张发奎（北伐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尽快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党的新方针，由李维汉、张太雷、瞿秋白筹备。重视武装斗争，抓枪杆子，针锋相对地反击蒋、汪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成为临时中央明确的指导思想。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准备发动军事暴动和秋收暴动。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武装割据时期（1927-1931）

武装暴动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贺龙（其时并非中共党员）等指挥发动南昌暴动，建立了军队。8月4日，中共部队放弃南昌，南下广东，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装部队、也是国共双方首次武力冲突。

武装割据的形成

1931年十月革命节，江西瑞金叶坪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典礼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发动秋收暴动。12月11日，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发动广州暴动，次日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但随即被广东军将领张发奎镇压。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战败后化装逃到香港。1928年2月，共产国际终于承认现在不是总暴动的时机，让中共争取工人和农民支持。1928年4月28日，朱德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并于1928年5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随着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井冈山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共产党控制区（苏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趁著蒋介石对付张作霖、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北方敌人，中共依靠南方山区打游击战，逐步扩展势力。中共吸纳了很多农民入党，1928年6月党员有13万人。年底，井冈山根据地陷入重围。毛泽东撤到江西，使用诱敌深入、乘胜追击的战术，击败江西省军。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国民政府三次对中国共产党位于江西、湖南的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第二波路线斗争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向布哈林和斯大林表示中国革命还处于高潮，应该考虑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案。但共产国际执著于工人革命，因此他们选择工人向忠发为中共领导，向忠发倚重李立三工作。1929年12月起，共产国际认为革命形势高涨，先后指示组建苏维埃政权，召开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及成立中国苏维埃临时政府，并至少应夺取一个中心城市。李立三下令所有苏区扩军，全力进攻附近城市，尤想夺取武汉，但并未成功。7月，红军攻占了长沙。中共认为全面夺权时机已经来临，要求苏联支援中共和准备世界革命。共产国际被中共的要求激怒，同时红军的军事行动迅速被何键率领的湖南省军击败。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安插王明、博古、沈泽民、康生、王稼祥等留学生任职。这年江西苏区开展反AB团运动，整个运动7.6万人被杀。其中，红二十军和红四军冲突，导致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军官全部被杀，史称富田事变。

1928年苏联对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美元）

	共产党（每月）	共青团（上半年）
中国共产党	12820	7692
日本共产党	1025	512
朝鲜共产党	256	460

失败责任的转嫁

民国16年（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该党文献称：该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总方针，并视之为根本任务；此会议改变了陈独秀过去对全党的领导路线；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确定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是探索如何完成根本任务的时期。该会议中，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此会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八七会议把中共三大、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中共中央的决定所导致的后果责任推给了陈独秀，而共产国际通过该会议解除知识派中的泰斗，削弱了知识派在中共内部的影响力。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代表	任期
向忠发	1927年7月－1928年7月
瞿秋白	1928年7月－1930年9月
王明	1930年11月－1937年12月
王稼祥	1937年12月－1938年3月
任弼时	1938年3月－1940年3月

对中国本土派的围剿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处于俄国1905年革命后的阶段，若无意外因素则无苏维埃革命条件；国民党政府趋于稳定，中共应致力于促进民主选举，但是共产国际认为绝对不应该妥协。1929年7月，陈独秀开始赞同托洛斯基主张。同月，中国和苏联因中东路事件正在中国东北开战，共产国际组织部分中

共在苏人员参战，要求中共举行示威，“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不要让资产阶级用叛国罪把自己吓住”。陈独秀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44号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斗争后，中国托派被作为“反革命”、“出卖阶级的叛徒”，从中国共产党内被清除。10月俄共（布）远东局在作出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认为：“陈独秀同志表达了最右倾机会主义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观点。”决议再次提到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态度，认为反对“保卫苏联”的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左翼国民党观点”。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不久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被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确立了其在红四军中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

国际派的胜出

1931年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试图进一步提拔王明等人，遭到工会领袖何孟雄等人的抵制。中共从中央到区县（城市）都发生了分裂。1月，罗章龙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日后式微。4月起，政治局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投降，致中共城市工作停转。

分离主义时期（1931-1937）

分离政权的建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援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江西省瑞金。该政权颁布了宪法（宪法内主张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应有民族自决的独立建国权），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 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表明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两国：“从现在起，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华民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剥削与压迫下广大工农兵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分离主义的受挫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共产国际认为这是推翻中国政府的好时机。中共认为国民党绝不抗日，要求士兵暴动，成立苏维埃。淞沪抗战期间，中共组织红军全力进攻中华民国。先攻赣州，未攻下。4月，红军攻克龙岩、漳州。江西、闽西苏区扩展到25个县。5月，中国与日本停战，蒋中正实施第四次“围剿”，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被攻陷。湘鄂西苏区肃反四次，杀两万多人；鄂豫皖苏区将二百多知识分子肃成五、六人。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

1933年，博古、李德要求重新查田，暗批毛泽东走“富农路线”，同时强调国土寸不容失，保障税收制度，批判其友罗明。红军大胜于黄陂后，博古强化整肃，3月，根据地陷入粮荒。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恢复集市和工商业。共产国际批评北方局与冯玉祥结盟。6月，共产国际不许与十九路军谈判，要求中共东征。7月，苏维埃政府发行公债，弥补财政缺口。中共大力倡导行业合作社。

民国23年（1934年），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在德国顾问建议下步步为营，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式进攻工农红军，而中共方面，毛泽东失去军事领导权，博古、李德等执行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政策，导致失败。1934年初，红军攻沙县。陈诚按兵不动，缓近广昌，吸引红军回援。第三路军击败红一军团，也向广昌进军。4月，红军力不能支，广昌易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迫于国民政府方面的军事压力于1934年10月18日撤离江西瑞金苏区，开始长征。同时，在南方还留下了一部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史称“南方游击战争”。红军在突围过程与国民政府军多次交火，损失惨重。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张闻天替代博古出任“总负责”，周恩来在军事上最高负责，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组成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及时调整军事方针，最终成功摆脱国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10月顺利到达陕西延安，与陕北红军会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长征结束。

分离主义的重生

中共中央通过长征从江西瑞金迁到陕北延安后，虽然摆脱了中央军，但依然危机四伏，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部和北部有阎锡山的晋绥军，西有马家军。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宣布开始东征抗日，一举击溃阎锡山七个师。5月中共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以实现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于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组建西路军，发动西征，意图打通经新疆与苏联的联系通道，但遭遇马家军的粉碎性打击而失败。

分离主义的放弃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并杀害保安人员、中央机关人员。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释。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停止与红军作战，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史称西安事变。

抗日统一战线时期（1937-1942）

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终于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会议中毛泽东指出，关于军事问题，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毛泽东还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与扩大红军，以及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9月6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其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延安整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陕北地区的红军（约4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依抗战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与此同时，另有约8,000名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集中组成了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对日作战。

中共的抗战活动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名义上保持着共同对日的势态，实际上在后方积极

拉拢农民成为共产党的一分子。期间中国军队与日本发生22次大型会战和上万次中小战斗。1937年9月八路军前线指挥官林彪配合阎锡山领导的太原会战，抓住有利战机，打了自称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平型关战役。 1940年8月彭德怀在未收到医院养病的毛泽东批复的情况下,发动了百团大战。 1944年3月粟裕、叶飞发动了车桥战役，开启了新四军的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

国共摩擦与决裂

国共双方之间也曾经爆发过多次流血冲突，其中有晋西事变、“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等。国民政府不再对共产党及其军队发放军饷补给，中共及其军队已不再听从国民政府号令，开始大力发展国民政府体制外的以抗日、民主为名的事实割据政权，国共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到了130余万人，民兵也发展到260余万人，控制敌占区约一亿人口。

毛泽东时代（1942-1976）

延安时期（1942-1946）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接受共产国际指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中共文献则称该运动是为了：提高党内成员马克思列宁

主义水平，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战斗力，以便战胜困难，夺取胜利。据此决定在中共党内开展一场普遍的整顿作风的运动。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同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号召其党成员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该党文献，此次会议检讨了其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错误，肯定了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更进一步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整风会议，整风学习从此开始。这是中共延安整风的预备阶段。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此次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中共党内军内的整风逐步展开。根据该党文献称此次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延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发扬党内民主，

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经过普遍的学习和整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达到统一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

中国共产党于1943年开始重新积极扩大自身的根据地。而自19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到若要取得政权，唯一的机会是要将自身定位为真正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中国的政治势力。因此自1941年开始以延安市为据点的中国共产党展开整风运动，排除以王明为首的第三国际代表在党内的影响，并且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指导思想；之后随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获得确立。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在1945年逐渐接近结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间的政治问题开始被提及。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代表于重庆市展开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隔年双方则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5个决议案，表示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之后双方分别在1946年2月底达成整军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达成《东北停战协定》。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延安整风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在此阶段，该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中共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

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据该党文献该报告：阐明了研究历史经验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态度，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其文献此会对于该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批评和结论。至此，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各机关的成员组成学习小组，来学习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个人著作讲话，其中以毛泽东的著作占六篇最多，而虽然也有许多国外作者如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实行上被列为居次。延安整风彻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延安整风后，王明在党内失去势力。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日后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以及第二次国共内战的胜利建立政治基础。

国共内战时期（1946-1950）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称之为"戡乱"。

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此时中共

有120万党员，132万正规军，260万民兵，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9-11月，美国帮助国民党接收华北，苏联帮助中共接收东北。国军抵定江南。苏联向中共转交5000挺机枪、15万支步枪及一批重武器。1946年1月，国共两党并民盟、青年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决议案，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 1946年2月底，虽有反苏运动等因素，国共双方仍达成整军协定，统一将国共军队整编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底，国共达成迄今最后一个正式协议东北停战协定。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国共双方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双方在东北、中原、华北等处展开争夺。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此时，国民政府为迎接制宪国民大会，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的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共产党方面认为国民政府没有诚意，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至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此时中共仍坚持在南京活动，不离开。国府两度委婉逐客无效，故2月底，国民政府公开下达逐客令，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留守处代表3月5日前撤离，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内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物资统计

时间	发货地点	机枪	步枪	子弹	其他物资
1945年11月2日前	沈阳	4000	11~12万		各种炮一批

1945年11月2-6日　沈阳、哈尔滨　　1000　3.6万 800万 部分炮；手榴弹15万；运输机6架；火车2列；大衣2万；皮鞋3万；兵工厂1座

1945年12月初　　旅顺　100　近万　　　飞机40余架

1946年3月　朝鲜　　　3万

1946年4月　哈尔滨　　1万　10万　　　1000门炮

1946年5月　朝鲜　115　　　43万　炸药1万箱

1946年6月　朝鲜　50　　5000　300万 本月另有一批，不详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　　朝鲜　688　　12145 1000万　　　167掷弹筒、7门炮、11164刺刀、43588发炮弹、22万斤炸药、火药500箱

1946年9月　图们　　　　　　　100多节火车弹药

1946年9-10月　　　安东　朝鲜北部日军储存之武器弹药，数十艘汽船每日往返运输

1946年12月到1月　　苏联　1.51亿卢布各式物资（含300万匹布、560万吨米和棉纱、3300吨汽油、500辆卡车、700吨炸弹等）

1948年2月到12月　　苏联　3.35亿卢布各式物资

1948年辽沈战役前　满洲里等地　仅我们（苏军）两个方面军转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稍后又转交给他们大批的苏制武器。各种枪炮、坦克，以火车运输数日。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苏式。

1949年7月到12月　　苏联　4.21亿卢布各式物资

马歇尔调停失败后，内战全面爆发。之后，国军调整战略，重点进攻共产党山东和陕北两大共产党控制区。在陕北，国军一度占领延安，但此时共产党已经主动撤离延安，国军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山东方面，解放军采取运动战打击国军，避免与国军进行主力决战。之后陈毅、粟裕率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重创国军，全歼国军王牌主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阵亡。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军开始攻势作战，在东北，将国军压缩至几个相互孤立的城市，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在陕北，彭德怀部队在1947年8月初围攻榆林，钟松整编36师北上救援。随后彭德怀围点打援，发动围攻钟松的沙家店战役。刘戡全力救援，钟松逃脱。10月，彭德怀再度围攻榆林，国军已经无兵可调，不得不由蒋中正致电宁夏主席马鸿逵求援，马鸿逵命整编18师支援榆林，彭德怀再度围点打援。宁夏军与彭德怀部队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彭德怀撤退。2月，彭德怀部在宜川围点打援，歼灭刘戡29军主力，刘戡自杀。4月底彭部占领延安，后撤至黄龙地区休整。中原战场局势错杂，虽然国军寻机作战，但解放军运动灵活，故国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1948年3月，陈赓谢富治兵团乘中原国军兵力空虚，进攻洛阳，两进两出，歼灭国军守军。4月，刘邓部队进攻阜阳。经过近一年的战斗，中原地区的战事转向对中共有利的一方，国军日趋被动。5月，中共成立中原野战军，发动宛东战役，击溃国军18军。6-7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攻克开封，歼灭整编75师，确定了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11月，在山东、华北等战场，解放军也展开了攻势。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

灭国军的主力精锐，国共内战大势底定。194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内容为：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入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四处迁徙。解放军则向全国进军，逐步攻占了除台湾和少数沿海岛屿外的全部国土。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2月7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被迫撤往台湾。

中共政权确立时期（1949-1954）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经过数月的筹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

至30日在北平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决定以北平为国都并改名北京、以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通过了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他6位为副主席、以及另外56位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迁往台北，并继续统治台湾本岛及福建离岛地区金门、马祖(通称为台澎金马地区)至今。至此，中国历史上海峡两岸分别统治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获得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席位。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虽有发展，但两岸在意识形态及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上立场歧异，继续处于分治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中国历经连年战争已近成废墟；按照中共论点，“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村“土改”，抑止了战时通货膨胀。”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力图普及国民教育与建立基层医疗保障体系。外交上奉行完全倾向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援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共产主义活动。军事上，1950年基本消灭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力量；同年，北朝鲜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击败朝鲜人民军，并推进至中

朝边境。10月中共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起与联合国军作战，使战线重回三八线，于1953年签署停火协议。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中共的军事能力，但也为中共和美国的关系的发展蒙上阴影，深刻影响了两岸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续发展方向。

1949年后，中共在建国前三十年由毛泽东主导发起了很多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绝大部分是政治运动，或者是政治运动与经济政策的结合运动。大部分政治运动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甚至被迫害。

政治领域的政权巩固

1950年5月1日至1950年底，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主要是在领导干部中克服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以及少数人的腐化堕落、违法乱纪。

1951年2月至1953年进行整党。

经济领域的政权巩固

中共称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中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政治运动的统称。

文化领域的政权巩固

双百运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其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1967年人民日报曾撰文称“双百方针”的目的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中共称反右运动是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中共认为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其党建的正常步骤。且称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的批评、建议；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反击右派的运动。中共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中共文献指出此次运动有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多达552877人。

社会主义建设、教育时期（1954-1966）

大跃进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由于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0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主张“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但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倒退和三年大饥荒的发生。其中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彭德怀等人的异议而下令发动反右倾运动，进而造成社会经济陷入

困顿，并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后才得以制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差异而宣告分裂。

反右倾运动亦称“反右倾斗争”，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即展开的一场政治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有较大异议的中共党员被打倒，会后毛泽东发动“反右倾”斗争。大量中共党员遭到批判，部分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大跃进运动温度不降反升，造成更多的人饿死。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中共后来认为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运动是错误的。

四清运动，简称“四清”，是1962年底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毛主席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一场政治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

1964年7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1966年2月3日小组发表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革除国

家和党的职务，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文革小组碰头会成为文革期间最高会议。 1966年2月3日，中国共产党透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150]。在这之后引起长达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并且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古迹造成严重破坏。这时期也因为文化革命造成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最终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遭到瓦解而结束。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章确立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翌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及林彪的其他党羽在会上，积极建议恢复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谋求林彪担任此职，遭到主张修宪“废除国家主席”的毛泽东驳斥，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

1971年9月8日，副统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的支持者和接班人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突然乘飞机出逃，并在蒙古坠机失事（民间传言飞机是被击落的）。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王洪文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

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展开。

1974年10月周恩来因病住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开始整顿生产秩序，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出修正。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76年2月，“四人帮”经毛泽东批准，掀起以批判邓小平为主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政变的方法，在没有逮捕令甚至没有正式的会议决议前提下，在中南海怀仁堂秘密逮捕四人帮成员及清洗其支持者的活动，中共官方号称“粉碎四人帮”。至此，长达十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古迹造成严重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据各方估计，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

“文革”结束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中共领导政策开始由

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华国锋时期（1976-1978）

华国锋权力的确立

邓小平再次复出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77年8月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预备。

改革开放的确立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议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在

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

1979年9月25日－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980年2月，在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书记处负责人）， 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时代（1978-1989）

中共十二大

1982年8月6日，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不再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职务，同时确立以总书记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政治风波

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中国大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之后，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4月26日，中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部队被许多北京市民阻拦，未能入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措施，6月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实行武力镇压，军方与群众、学生爆发冲突，造成平民及军人流血伤亡（流传的伤亡数字不一）。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总书记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等领导人逐渐退出前台，实际邓小平幕后问政直至九十年代中期。

权力交棒

六四事件不仅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紫阳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更导致邓小平威望受损。

邓小平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在保守派中有较高认可度的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不久邓小平又将改革派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小平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中共中央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就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出现意见分歧，眼见改革开放即将搁浅，已身无所职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南巡，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并期许广东能按其“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在20年内追上亚洲四小龙。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近代发展

在天安门广场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中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务，进而确立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且建立包括李鹏、朱镕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而尽管六四天安

门事件一度让改革开放政策暂缓，1990年代初期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政策重新获得施行，这让邓小平的经济学观点重新获得重视[164]。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列为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继承邓小平在1990年代“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并延续后者绝大部分政策。随后江泽民则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要众多人民的基本利益；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个代表思想获得批准并修订至《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并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透过制定理论的方式让民营企业家和入境资产阶级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胡锦涛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接替江泽民最高领导人位置，并且和吴邦国、温家宝等人组建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不同于先前的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人的统治，胡锦涛把重点放在集体领导上，而反对单一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由于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注重经济增长，反而促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发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锦涛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两个主要思想。其中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10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版中，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视为指导方针。胡锦涛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卸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且由新选出的习近平接替这两个职位，之后与李克强等人组建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上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便展开数十年来最为积极的反腐败工作，但与此同时开始整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办公室的权力，这使得外国评论家认为其破坏集体领导制度、而朝向毛泽东的统治方式。

2020年冠状病毒病疫情发生后，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一直强调自己亲自指挥防疫工作，并在2020年2月3日《求是》发表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表明：早在1月7日已经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防疫要求。香港《明报》“京城密语”专栏指，中央领导人初期对疫情并不重视，甚至要求不要造成民众恐慌，影响即将到来的春节气氛。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指，湖北省和武汉市党委和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造成疫情在1月下旬后大规模爆发，引致全国，乃至世界带来疫情压力。其后因防疫造成的人员流动限制，对中国大陆水利工作造成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Chinese_Communist_Party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选摘）

革命期间的历史

党的建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6月，共产国际的经纪人格里戈里·沃伊汀斯基（Grigori Voitinsky）是被

派往中国的几个人之一，在那里他遇到了李大钊和其他改革者。在中国期间，伏伊汀斯基资助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它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因此，按照严格的正统观念，它不应该为革命做好准备。但是布尔什维克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国家的潜力。莫斯科派遣了几位特使试图组织一个政党，通过宣布放弃沙皇时代的铁路和在中国的特许权来帮助其事业。其中一位特工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一份宣言... 1921年6月，汉斯Sneevliet是一位来自共产国际的荷兰人...到达上海，并在法国租界的一所空寂的女子学校里安排了一次会议，邀请了57名宣告共产主义者中的13人参加了会议...

在那里，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企鹅史》，企鹅出版社，2008年，第143-4页。）

中国共产党的初步组织和招募工作是由格里戈里·沃伊汀斯基（Grigori Voitinsky）领导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在1920年和1921年成立研究社团，一个非正式的网络。1920年在中国以及海外举行了非正式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1921年7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人说这次代表大会由13人组成，但中共的官方版本是12人。

在南湖的船上举行会议时，宣布了该党的诞生（共有50至60名成员）。正式统一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完成了最终议程。大会主要代表有李大

钊，陈独秀，陈功博，谭平山，张国涛，何梦雄，娄章龙和邓中夏。

毛泽东作为湖南共产党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其他与会者包括董必武，李汉军，李达，陈潭秋，刘仁静，周佛海，何书恒，邓恩明。来自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其中一位是Henk Sneevliet。未来的领导人李立三和瞿秋白缺席了。

第一次内乱时期-第一个统一战线（1922-1927）

1922年8月，Sneevliet召集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中央特别全体会议。斯涅夫里耶特在会议上提议，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其理由是从内部改造国民党比复制其成功要容易。李大钊，蔡和深和高玉汉反对该动议，随后，斯涅夫利特援引共产国际的权力并迫使中共接受他的决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该党于1923年按照列宁主义路线进行了重组，为北伐战争做准备。新生党未受到高度重视。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共产国际的五位创始领导人之一，在1922年11月说，中共在莫斯科没有受到高度重视。而且，中国共产党被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由邓中夏和李大钊领导的，以更温和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模式，另一个是由张国韬，娄章龙，何梦雄和陈独秀所倡导的强烈反帝制。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丁（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与孙中山和汪精卫协商了1923年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并入新成立的政党的做法。Borodin和Vasilii Blyukher将军（被称为Galen）与蒋介石一起创建了黄埔军校。中共对共产国际领导层的依赖充分表明了第一联合阵线的脆弱性。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去世，这使得谁来领导该党以及他们是否仍将与共产党一起工作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存在紧张关系，但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北伐战争（1926年至1927年）在推翻军阀政府方面取得了迅速的成果。中共仍然把孙中山作为自己

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孙说，“我们的民生原则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他的遗孀宋庆龄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第二次南北革命时期-苏联（1927–1937）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逼近上海，国民党领导层分裂。国民党的左翼武汉，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联盟，而蒋介石在南京变得越来越敌视他们，并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他们。这是在上海被占领后发生的，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仍然结盟。

反共运动变得普遍。随着蒋介石巩固权力，各种起义继续进行，共产党武装部队建立了许多“苏维埃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朱德和毛泽东，他们通过农民暴动在中国一些偏远地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的许多军事行动都失败了，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被赶出了上海，搬到毛泽东的基地，使他处于边缘。

蒋介石发起了进一步的运动，取得了成功。中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根据地，并开始了长征战争（1934–1935）以寻找新的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党领导层重新审查其政策，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长征期间，本地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和朱德获得了动力。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控制。他们定居在陕西，那里有一个现存的共产党基地。

西方世界首先通过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清晰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基础。

中日战争时期—第二统一战线（1937–1945）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和国民党暂时结盟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是，基本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和地区仍然独立于国民党政府。

在八年的时间里，中共成员从40,000人增加到1,200,000人，其军事力量从30,000人增加到大约100万，此外还有超过一百万的民兵支持团体。

一个公认的想法是，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中共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快。

第三次内乱时期（1946-194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爆发了内战。尽管国民党取得了最初的收获，但他们最终还是被击败并被迫逃往台湾。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执政党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群众面前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领导中央人民政府。从这个时期到1980年代，中共最

高领导人（例如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都是同一批军事领导人。结果，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人际关系主导了军政关系。

刘少奇在1952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提出了一党制宪法建议。然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变了前任联合政府，并建立了中共的唯一统治体系。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共与苏联共产党经历了重大的思想分离。到那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持续革命"规定，即使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已经完成，阶级敌人仍然继续存在，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迫害。并被杀死。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共主席华国锋与副主席邓小平之间爆发了权力斗争。邓小平赢得了斗争，并于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胡耀邦和赵紫阳一起率先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并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从而开放了中国。走向世界市场。邓在扭转毛泽东的一些"左派"政策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而不必成为资本主义。在维护党的政治权力的同时，政策的变化产生了显着的经济增长。但是，新意识形态在两面都受到毛派主义者和支持政治自由化的人的争执。由于其他社会因素，这场冲突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达到高潮。抗议活动被镇压了，邓小平对经济学的看法盛行，到了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被引入。1997年，邓小平的信念（邓小平理论）被载入中共宪法。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0年代接替邓小平担任“最高领导人”，并继续执行他的大部分政策。在1990年代，中共从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领导的资深革命领导转变为根据民间官僚体制的制度化准则而不断再生的政治精英。领导力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有关晋升和退休，教育背景以及管理和技术专长的规则和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由独立的专业官员组成，由中共最高领导层通过体制渠道内的正式关系提供服务。

作为江泽民名义上的遗产的一部分，中共批准了“三个代表”，作为2003年党的宪法的修订版，作为“指导思想”，鼓励党代表“先进生产力，中国文化的先进进程和根本。人民的利益。” 该理论使私人企业主和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政党合法化。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于2002年就任。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胡锦涛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一人独霸政治体系。坚持专注于经济增长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锦涛介绍了两个主要的思想观念：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在2012年举行的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了中共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习近平继任两个职位。自从执政以来，习近平发起了广泛的反腐败运动，同时以牺牲前几十年的集体领导为代价，将权力集中在中共总书记办公室。外国评论员把他比作毛。习近平的领导层还监督了党在中国的作用的增强。习近平于2017年在中共宪法中加入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意识形态。

2020年10月1日，美国国会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提出了立法，将CCP列入国际主要犯罪组织目标（TICOT）名单，并向美国执法机构提供了针对CCP活动的战略指示。

2020年10月21日，加拿大下议院外交事务与国际发展常设委员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迫害，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种族灭绝公约》，该党的行为相当于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Communist_Party_of_the_Soviet_Union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涵盖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系的历史。1912年的日期通常是作为苏联共产党独立党成立的时间，从那时起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布尔什维克党秘密和流亡的初期。

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

巩固党作为苏联的统治力量

1930年代的大清洗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1953年至1982年）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代（1985-1991）

命名法

由于党派前辈和继承人，该党相继使用了各种名称：

1898–1912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 RSDLP（俄语：**Российскаясоциал-**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рабочаяпартия–РСДРП）

1912年至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B）（俄语：**Российская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рабочаяпартия**（**большевиков**） – **РСДРП**（**б**） ）

1918–1925年：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俄语：**Российская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большевиков**）**–РКП**（**б**））

1925–1952年：布尔什维克联盟（Bolsheviks）（俄语：**Всесоюзная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большевиков**)**–ВКП**(**б**))(通常音译为VKP（b）或有时译为VCP（b）

1952–1991年：苏联共产党（CPSU）（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Со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КПСС**）

1991年：各种各样，包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КПРФ**）

RSDLP的成立（b）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届全俄党代表会议；当时没有他们的孟什维克对手在场。有二十多个党组织参加。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会议具有定期召开党代会的重要性。

在大会声明中恢复了破碎的中央机构并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有以下声明：“不仅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其纲领和革命派传统得以幸存，而且其组织也得以幸存；迫害可能削弱我们，但永远无法彻底消灭我们。”

此外，会议宣布孟什维克派被开除党籍。这样，RSDLP有效地分裂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组成了独立的政党（两个团体将继续使用“ RSDLP”这个名称。布尔什维克党在名称上加上“ bolshevik”，以区别于孟什维克。）

会议在关于地方组织提出的报告的决议中指出，“社会民主人士在各地进行了积极的工作，目的是加强地方非法的社会民主组织和团体”。会议注意到，在所有地方都观察到了布尔什维克在撤退时期采取的最重要的战术规则，即将非法工作与合法存在的各种工人社团和工会中的法律工作结合起来。

布拉格会议选出了一个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

弗拉基米尔•列宁

斯大林

塞尔戈•奥尔佐尼基泽

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

苏伦•斯潘达里亚（Suren Spandaryan）

菲利普•高洛希奇金（Filipp Goloshchyokin）

和别的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并没有出席会议；他们当时仍在流亡中；但赢得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央会选举的候补成员包括米哈尔•洛

林。

在谈到布拉格会议的意义时，斯大林说：

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至关重要，因为它划定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界线，并将全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

1912年夏天，列宁从巴黎搬到加利西亚，以便更接近俄罗斯。他在这里主持了两次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党的领导会议，其中一次会议于1912年底在克拉科夫举行，另一次会议于1913年秋天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小镇波罗尼诺举行。通过了有关工人阶级运动的问题的决定，包括：革命运动的兴起；党与罢工有关的任务；加强非法组织；国会的社会民主团体；党报；劳动保险运动；等等。

真理报

布尔什维克党用来加强组织和在群众中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是在圣彼得堡发行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根据列宁的指示，它是在斯大林，奥尔明斯基和波列塔耶夫的倡议下成立的。真理报旨在作为合法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檄文，与革命运动的新崛起同时建立。它的第一期发行于1912年5月5日。

在真理报出现之前，布尔什维克已经有一家名为Zvezda的每周报纸，专门为高级工人准备。在列娜（Lena）事件发生时，兹维兹达（Zvezda）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印刷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许多政治文章。但是该党感到，随着革命的高涨，周报不再符合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根据对党的领导的分析，每天需要为广大工人群体设计的政治报纸。这样就成立了真理报。

沙皇政府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八次镇压真理报。但是每次在工人的支持下，它都会以新的但又相似的名称重新出现，例如Za Pravdu（真相），Put Pravdy（真相之路），Trudovaya Pravda（劳动真相）等。

真理报的平均发行量为每天40,000份，而孟什维克的Luch（Ray）的发行量则不超过15,000或16,000。

在莫斯科，该党于1913年9月成立了纳什·普特（Nash Put）作为工人报纸。该刊仅发行了几版后就被禁止了。

在国会工作

党的另一个合法运作的中央机关是国会的布尔什维克团体。1912年，政府下令对第四届国会举行选举。RSDLP（b）决定参加选举。RSDLP（b）在国会选举中以自己的口号独立采取行动，同时袭击了政府党派和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选举中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民主共和国，每天工作8小时，土地改革。

1912年秋天举行了第四届国会大选。10月初，政府对圣彼得堡的选举感到不满，在许多地方试图侵犯大工厂工人的选举权。作为回应，RSDLP（b）的圣彼得堡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呼吁大型工厂的工人宣布为期一天的罢工。

由于处境艰难，政府被迫屈服，工人们在会议上能够选举出他们想要的人。绝大多数工人投票赞成由斯大林主导的"圣彼得堡工人对他们的劳工代表的职权（纳卡兹）"。这项授权宣布，人民的未来行动应采取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形式-反对沙皇政府和反对自由资产阶级。最后，RSDLP（b）候选人巴达耶夫（Badayev）被圣彼得堡工人选举为国会议员。

工人们在国会的选举中与其他人口分开投票（这被称为库里亚工人）。从工人库里亚选举产生的9名代表中，有6名是RSDLP（b）的成员：巴代耶夫，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伊洛夫，沙戈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布尔什维克代表是从大型工业中心选举产生的，这些工业中心集中了不少于五分之四的工人阶级。选举之后，RSDLP（b）与孟什维克（拥有七个席位）一起组成了社会民主国会联合小组。1913年10月，在与孟什维克发生一系列争议之后，RSDLP（b）国会成员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退出了社会民主联合组织，并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国会小组。

在国会，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项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的法案。它被否决了，但对布尔什维克具有重大的鼓动价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沙皇政府于1914年7月呼吁全面动员。俄罗斯与德国交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RSDLP（b）谴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此外，该党谴责支持各自国家的战争努力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称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从战争爆发起，列宁就开始集结力量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即第三国际。在1914年11月发表的反对战争宣言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呼吁成立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

1915年2月，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会议在伦敦举行。RSDLP（b）代表利特维诺夫在列宁的指示下在本次会议上发言，要求社会党人应从比利时和法国的中央政府辞职，与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并拒绝与他们合作。他要求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要与帝国主义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谴责对战争信贷的投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提出支持利特维诺夫的声音。

1915年9月上旬，第一次国际主义者会议在齐默尔瓦尔德（Zimmerwald）举行。列宁称这次会议为发展国际反战运动的“第一步”。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组成了齐默瓦尔德左派组织。但是列宁认为，在齐默尔瓦尔德左派组织中，只有RSDLP（b）采取了正确而彻底一致的立场来反对战争。

齐默尔瓦尔德左派（Zimmerwald Left）小组用德语出版了一家名为《Vorbote（Herald）》的杂志，列宁为此撰稿。1916年，国际主义者成功地在瑞士的Kienthal村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它被称为第二届齐默尔瓦尔德会议。到这个时候，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都形成了国际主义者团体；国际主义者与“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变得更加清晰。

肯特哈尔会议起草的宣言是各种冲突集团之间达成协议的结果。这是《齐默尔瓦尔德宣言》的一项进步。但是，与齐默尔瓦尔德会议一样，肯特哈尔会议也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即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在战争中击败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以及建立第三共产国际。尽管如此，肯特哈尔会议还是使后来形成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元素得以具体化。

战争开始时，尽管遭到了警察的迫害，但国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巴达耶夫，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伊洛夫和沙戈夫–拜访了许多组织，并就布尔什维克对战争和革命恐怖主义的政策向他们发表了讲话。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集团在国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有关战争的政策。会议的第三天，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捕。法院判处国会布尔什维克成员被没收公民权利和放逐西伯利亚东部。沙皇政府以叛国罪指控他们。

此时，列夫·卡梅涅夫（Lev Kamenev）偏离了政党路线。他在法庭上宣布，他不同意该党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为证明这一点，他要求召集孟什维克·约旦斯基为证人。

布尔什维克运动反对为满足战争需要而成立的战争工业委员会，并提倡抵制该委员会“工人团体”的选举。

布尔什维克在陆军和海军中也开展了广泛的活动。该党在军队和海军的前部和后部形成了核心组织，并散发了传单，呼吁与战争作斗争。在克朗施塔特，布尔什维克组建了“克朗施塔特军事组织中央集体”，与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彼得格勒党委军事组织成立，在驻军中开展工作。

1916年8月，彼得格勒·奥克拉纳（Petrograd Okhrana）的负责人报告说：“在克朗斯塔特集体（Kronstadt Collective）中，事情组织得非常好。”

在前线，该党鼓动交战军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声称世界资产阶级是敌人，战争只能通过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并用自己的武器对付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来结束。陆军单位拒绝发动进攻的事件越来越多。在1915年已经有这种情况，在1916年甚至更多。

布尔什维克在波罗的海各省北部阵线的军队中的活动特别广泛。1917年初，北线陆军司令尼古拉·鲁兹斯基将军通知总部，布尔什维克在该线进行了激烈的革命活动。

1917年革命期间的布尔什维克

二月革命

这一年是1917年由1月22日罢工开幕。在罢工过程中，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和下诺夫哥罗德举行了示威游行。在莫斯科，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人参加了1月22日的罢工。士兵们参加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维堡剧院游行。彼得格勒的警察报告说：“大罢工的想法每天都在吸引新的追随者，并且变得像1905年一样受欢迎。”

1917年3月3日，彼得格勒的Putilov工厂发生了罢工。3月7日，大多数大型工厂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呼吁下，职业妇女走上街头，抗议饥饿，战争和沙皇。彼得格勒的工人通过全市罢工运动来支持劳动妇女的示威活动。政治罢工开始发展成为反对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示威。

3月9日以更大的活力进行了示威。大约200,000名工人已经罢工。3月10日，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在彼得格勒参加了革命运动。各地区的政治罢工合并为整个城市的一般政治罢工。与警察的示威和冲突无处不在。口号像是“打倒沙皇！”，“打倒战争！”，“我们要面包！”。

3月11日上午，政治罢工和示威开始具有起义的性质。工人们解除了警察和

宪兵的武装并武装自己。然而，彼得格勒军事区的指挥官哈巴洛夫将军宣布，工人必须在3月13日之前恢复工作，否则将被送往前线。3月10沙皇下令Khabalovi将军：“我命令你在明天之前制止首都的混乱。”但是，不再可能停止革命。

3月11日，巴甫洛夫斯基军预备营第4连开火，不是对工人开火，而是向与工人发生小规模冲突的骑警小队开火。人们采取了最充满活力和持久的努力，以赢得军队，与他们结为同盟并呼吁他们帮助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工作由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领导，该委员会总部设在彼得格勒，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领导。2月26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发表宣言，呼吁继续进行反对沙皇的武装斗争，并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3月12日，彼得格勒的军队拒绝向工人开火，并开始与起义的人民保持一致。到3月12日上午参加反叛的士兵人数仍不超过10,000，但到晚上已超过60,000。

起义上升的工人和士兵开始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并使革命者免于入狱。被释放的政治犯加入了革命斗争。军队迅速走到了工人一边，这决定了沙皇专制的命运。当彼得格勒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其他城镇和前线时，各地的工人和士兵开始罢免沙皇官员。

在1917年3月12日，由于与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达成了协议，

第四界国会的自由党成员成立了国家国会临时委员会，由米哈伊尔·罗德赞科（Mikhail Rodzyanko）领导。几天后，国家国会临时委员会，工人和士兵代表以及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秘密地达成协议，组成一个新的由利沃夫亲王率领的俄罗斯临时政府。该临时政府包括帕维尔·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领袖，亚历山大·古奇科夫（Alexander Guchkov），社会革命党亚历山大·凯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等人。布尔什维克谴责新的临时政府为“帝国主义”。

列宁的归来

列宁经过长时间的流放，于1917年4月3日返回俄罗斯。到达后，他向党提交了他的“四月论文”，为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政治路线。列宁提议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合适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此外，列宁建议抛弃“社会民主党”一词，改为“共产主义”。他还再次呼吁建立新的第三共产国际。论文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一次党务会议上发表，随后又在同一个城市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举行的会议上发表。

4月14日，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彼得罗格勒市会议。会议批准了列宁的论文并将其作为其工作的基础。在不久的时间内，该党的地方组织也批准了列宁的论文。列宁的反对者包括卡梅涅夫，里科夫和比亚塔科夫。

四月示威

RSDLP（b）中央委员会于4月20日呼吁群众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1917年4月20-21日，不少于100,000名工人和士兵参加了示威活动。他们的标语带有这样的要求：“公布秘密条约！”，“打倒战争！”，“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工人和士兵从城市郊外游行到临时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其他地方，发生了与资产阶级团体的冲突。

像科尔尼洛夫将军这样更为直言不讳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向示威者开火，甚至下达命令。但是部队拒绝执行命令。

在示威期间，彼得格勒党委员会的一小批成员（巴格达捷耶夫等）发表了口号，要求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强烈谴责该组织的冒险行为，认为这个口号是不合时宜和不正确的，这种口号阻碍了党争取苏联多数党的努力，并且违背了和平发展党的革命路线。

第七届党代表大会

1917年4月24日，RSDLP（b）第七次（四月）会议召开。在党的历史上，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与党的代表大会相同。

全俄四月会议表明，党的发展突飞猛进。133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有18位代表发言但没有投票。他们代表了80,000个有组织的党员。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的党派路线：当前局势，战争，临时政

府，苏维埃，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

列宁在报告中阐述了他在四月论文中已经阐述的原则。党的任务是实现从革命的第一阶段的过渡，“革命将权力置于资产阶级的手中……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必须将权力置于无产阶级和农民最贫穷的阶层人民的手中”。”党应该采取的方针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列宁在口号中提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苏维埃拥有一切权力！”

口号是：“一切力量归苏维埃！” 这意味着必须终止双重权力，即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之间的分权，将全部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并将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赶出政府机关。

会议决定，党要鼓吹人民代表临时政府，而不是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并谴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合作政策。

4月的会议还讨论了农业和国家问题。关于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没收将由农民委员会支配的土地，并将所有土地国有化。

关于民族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宣称，该党必须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该党主张民族自决的权利，甚至达到分裂国家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程度。

列夫·卡梅涅夫（Lev Kamenev）和阿列克谢·雷科夫（Alexei Rykov）在会议上反对列宁。他们呼应孟什维克，认为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在俄罗斯只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可能的。他们建议党和工人阶级仅限于"控制"临时政府。

齐诺维耶夫在会议上也反对列宁。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党应该保留在齐默尔瓦尔德联盟内部，还是与之决裂并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列宁坚持认为，正如战争年代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该联盟为和平进行了宣传，但实际上并未与战争的资产阶级分裂。因此，列宁呼吁立即退出该联盟，并成立新的共产国际。季诺维耶夫提议，该党应保留在齐默尔瓦尔德联盟内。列宁谴责齐诺维耶夫的提议，并称他的策略是"机会主义的和有害的"。

在苏联工作

在四月会议的决定的基础上，该党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以赢得群众，并训练和组织他们进行战斗。在那个时期，党的路线是通过"解释布尔什维克政策和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妥协政策，使这些政党与群众隔离开来"，从而在苏联赢得多数席位。

除了在苏联工作外，布尔什维克还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工作尤其广泛。军事组织随处可见。布尔什维克报纸Okopnaya Pravda（Trench Truth）在前线扮演了使士兵们成为积极的革命者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1917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举行了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会议。在该会议上，四分之三的代表已经支持布尔什维克。几乎整个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都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苏维埃拥有一切权力！”

1917年6月3日，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了会议。布尔什维克仍然是苏维埃的少数派。他们在本次大会上的代表略多于100人，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则有700或800人。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坚持反对与资产阶级妥协，并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列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为工人提供面包，为农民提供土地，确保和平，并使国家摆脱混乱”。

当时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运动，以组织游行示威，并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于6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预计，示威活动将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进行。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为这次示威进行充满活力的准备。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写道：“……我们的任务是确保6月1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示威活动是根据我们的革命口号进行的。”在集会上，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胜过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家。

七月

7月初，圣彼得堡的普遍不满导致激进游行示威，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在前

线进攻失败的消息传出后，7月3日，在彼得格勒维堡区开始了自发的示威游行。他们整天继续。单独的示威游行演变成规模庞大的一般武装示威游行，要求将权力移交给苏维埃。该党当时反对武装行动，因为它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军队和各省还没有准备好支持首都的起义，而孤立和过早的崛起可能只会使反革命者更容易粉碎革命的先锋队。但是当显然不可能阻止群众示威时，该党决定参加示威。成千上万的男女游行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掌握权力，与资产阶级决裂，奉行积极的和平政策。尽管示威活动具有和平性，但还是派出了一些单位-官兵和学员组成的反对派。许多人在小规模冲突中丧生。

随后的镇压导致克伦斯基政府下令在7月19日逮捕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逃脱了俘虏，躲藏起来，写了《国家与革命》，概述了他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的构想。

第六届党代会

RSDLP（b）第六次会议于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列宁从地下主导大会。他通过中央委员会指派的布尔什维克与彼得格勒保持联系；布尔什维克在拉兹利夫拜访了他。列宁的论文《政治局势》，《口号》等项目构成了国会决议的基础。在拉兹利夫期间，列宁参加了国会最重要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大会一致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

大会议程上的项目是：

（一）组委会的报告；（2）CCRSDLP（B。）的报告；（三）地方组织的报告；（4）现状：（a）战争与国际形势；（b）政治和经济状况；（5）修订方案；（六）组织问题；（7）选举制宪议会；（8）国际；（九）党的统一；（十）工会运动；（11）选举；（12）其他。

大会听取了斯大林代表中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政治局势报告。关于政治局势的决议是基于列宁的指导性建议。它评估了七月事件之后该国的政治局势，并确定了革命新阶段的党的政治路线。大会宣布革命的和平发展已经结束，该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移交给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手中。按照列宁的建议，它暂时撤回了“所有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就在那时，由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是反革命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大会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争取彻底废除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专政，并通过武装起义争取与农民穷人结盟的无产阶级获胜权。

大会否决了普罗赫拉珍斯基的提议，普雷奥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俄罗斯获胜，俄罗斯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除非西方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代表大会还拒绝了布哈林；布哈林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农民应与资产阶级结成一个集团，并且拒绝跟随工人阶级。

大会特别强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穷人结盟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条件的论点。“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决议说，“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这项任务是由新的崛起设定的，但要得到农民穷人的支持”。

斯维尔德洛夫（YM Sverdlov）报告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活动。他指出，自第七届（四月）全俄会议以来的三个月内，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从80,000增加到了240,000，党组织的数量也从78增加到162。国会听取了十九个地方组织的报告。发言者们强调了地方组织正在进行的大量工作，以及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的稳步增长的影响。

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党的经济纲领，设想了银行的国有化和集权化，大型工业的国有化，没收地产的政策和全国所有土地的国有化，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权的建立，组织城乡之间的适当交流以及其他革命性措施。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在《规则》的第一条中，关于会员资格的规定得到补充，规定党员必须服从所有党的决定。规则强调，所有党组织都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不得少于两个月一次。

代表大会重申了RSDLP（b）第七次会议的决定，即有必要按照大会表示的意义修改党的计划。它认为有必要为通过新纲领而明确召集代表大会，并指示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党组织开始讨论对党纲的修订，为大会做准备。

大会决议“青年同盟”说，为青年工人的社会主义阶级组织的形成作出贡献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并要求党组织对这一任务给予最大的关注。大会在讨论“工会运动”这一项目时，批评了工会中立的理论，并指出，工会对推动

革命取得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他们可以完成俄罗斯工作所面临的任务阶级，只要他们仍然是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领导的好战阶级组织。

代表大会作出的所有决定均服从于主要目标，即训练工人阶级和农民穷人进行武装起义，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对全体工人，俄罗斯所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宣言中，它呼吁他们集结力量，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准备与资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包括VI Lenin, YA Berzin , AS Bubnov , FE Dzerzhinsky, AM Kollontai , VP Milyutin , MK Muranov, VP Nogin , FA Sergeyev (Artyom), SG Shahumyan , JV Stalin, YM Sverdlov and MS乌里茨基。

在大会上，列昂·托洛茨基所属的一个孟什维克异议团体-统一社会民主党跨地区组织也加入了该党。合并之时，联合社会民主党跨地区组织在俄罗斯拥有4000名成员。

当克伦斯基政府受到科尼洛夫将军领导的叛乱的威胁时，对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就停止了，并向那些捍卫圣彼得堡反对科尼洛夫的人提供了武器。布尔什维克征募了25,000名强大的民兵来保卫圣彼得堡免受袭击，并援助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敦促他们不要进攻。部队停了下来，叛乱失败了。科尔尼洛夫被拘留。但是，布尔什维克并没有退回武器，而克伦斯基只成功地巩固了布尔什维克的阵地。

在此期间，双重权力的状况持续存在。立法和临时政府由克伦斯基（Kerensky）与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联合控制，而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则日益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控制；而布尔什维克现在拥有相当于自己的私人军队。8月31日，即战胜科尔尼洛夫的第二天，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政策。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老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主席团，由尼古拉·克谢伊泽（Nikolay Chkheidze）领导，辞职，从而为布尔什维克扫清了道路。9月5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派往布尔什维克。莫斯科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主席团也辞职，为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清晰的路。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的鼓舞下，该党通过其与苏维埃的代表，得以在1917年10月下半日召开第二次全苏维埃苏维埃代表大会。

暴动与议会制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中央委员会花月和1917年10月讨论是否应使用议会的方法，或者是否应该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列宁在芬兰躲藏后，由卡梅涅夫，格里高利·齐诺维耶夫和雷科夫提倡的反对约瑟夫·斯大林和莱昂·托洛茨基的议会路线首先占了上风。布尔什维克参加了临时政府，全俄民主会议和规模较小，更常任的前议会召集的准议会机构。

列宁给中央委员会和圣彼得堡的激进分子发了许多信，敦促他们放弃议会路线，以暴动的方式推翻临时政府。列宁在他的文章和信件中概述了起义的详细计划，其中显示了如何使用陆军，海军和卫兵，将在彼得格勒占领哪些重要职位以确保起义的成功等等。

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抵达彼得格勒。同一天，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权力平衡转而支持10月初的暴动，导致该党代表团退出了议会前会议。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发动武装起义。列宁起草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

哥萨克人等在明斯克周围地区-所有这些使武装起义每天都在进行。因此，考虑到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时机已经成熟，中央委员会指示所有党组织得到相应的指导，并讨论和决定所有实际问题。

—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页 303。

中央委员会的两名成员齐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发言并投票反对该决定。尽管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没有直接对决议投反对票，但他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提议不应该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开始起义。

为暴动做准备

党的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前往顿涅茨盆地，乌拉尔，赫尔辛福斯，克伦施塔特，西南阵线等地组织起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Ordjonikidze，基洛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人指导各省的起义。安德烈·兹丹诺夫（Andrei Zhdanov）在乌拉尔（Urals）的沙德林斯克（Shadrinsk）的武装部队中进行了工作。尼古拉·叶佐夫（Nikolai Yezhov）为在白俄罗斯西部阵线的士兵起义做准

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使各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员熟悉了起义计划，并动员他们准备支持彼得格勒的起义。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成为起义的合法运作的总部。

10月16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选举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党中心来领导起义。这个党的中心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领导整个起义的实际方向。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季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再次反对起义。他们在媒体上公开反对起义，反对党。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纸Novaya Zhizn发表了Kamenev和Zinoviev的声明，宣布布尔什维克正在为起义做准备，而他们（Kamenev和Zinoviev）则认为这是一次冒险的赌博。列宁在这方面写道："卡梅涅夫和齐诺维耶夫背叛了他们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对罗兹扬科和克伦斯基的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向中央委员会提出齐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因违反党纪而被开除党籍的问题。

在起义的其余几天中，在部队，工厂和工厂都进行了充满活力的行动准备。精确的指示也被发给了Aurora和Zarya Svobody战舰。由于对克伦斯基政府的先发制人的反击持谨慎态度，该党中央决定在起义时间之前发起起义，并将起义日期定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

彼得格勒的暴动

10月24日晚上，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学院，并担任起义的个人指导。那天晚上，陆军和红卫队的革命部队不断到达斯莫尔尼宫。布尔什维克将他们带到首都的中心，包围了临时政府的冬宫。

10月25日，革命军占领了火车站，邮局，电报局，政府部门和国家银行。议会宣告解散。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斯莫尔尼成为革命的总部，并由此下达了战斗命令。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致俄罗斯公民”宣言，宣布临时政府已被罢免，而国家权力已移交给苏维埃。临时政府在突击营的保护下在冬宫避难。10月25日晚上，布尔什维克猛烈占领了冬宫，并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此时，彼得格勒处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日晚上10:45在斯莫尔尼开幕，当时彼得格勒的起义已经开始，首都的权力事实上已经交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国会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孟什维克，Bundists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大会，宣布他们拒绝参加大会的任何工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的一份声明中，他们将正在进行的起义称为“军事阴谋”。大会随后谴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大会宣布所有权力已经移交给苏维埃：

10月26日晚上（11月8日），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

大会呼吁交战国立即停战至少三个月，以便进行和平谈判以结束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

大会在向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讲话时，同时呼吁“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和参加当前战争的最大国家，即大不列颠、法国和德国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 它呼吁这些工人帮助“圆满完成和平事业，同时使辛勤劳动和被剥削的人民摆脱一切形式的奴役和一切形式的剥削”。

当天晚上，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该宣言宣称：“无偿立即取消了土地所有权。”根据这项授权，将永久废除土地的私有权，并由土地的公共或国家所有权代替。地主，沙皇和修道院的土地都将移交给所有劳役者。通过这项法令，农民获得了超过4亿英亩（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土地以前属于地主，资产阶级，沙皇的家人，修道院和教堂。所有矿产资源（石油，煤炭，矿石等），森林和水域均被宣布为人民财产。最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称为人民委员会（Sovnarkom）。列宁就任新政府的主席，从字面上看是总理；托洛茨基成为第一任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接管了其他政府部门，一直到1946年为止一直被称为“政委”。

革命的蔓延

反革命的尝试

现在被废黜的Kerensky试图重新获得彼得格勒。1917年11月10日，在起义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往北线的克伦斯基，召集了多个哥萨克部队，并在克拉

斯诺夫将军的指挥下将他们派往彼得格勒。但是叛乱遭到镇压。11月13日，克拉斯诺夫将军被送往普尔科夫斯基高地附近。列宁亲自指挥镇压反苏叛变。

政党路线辩论

党的领导层中的一个部门，卡梅涅夫，齐诺维耶夫，里科夫，什利亚普尼科夫和其他部门，与列宁在党的政治立场上存在分歧。他们呼吁组建一个“全社会主义政府”，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1917年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与这些政党达成协议。11月17日，卡梅涅夫，齐诺维耶夫，雷科夫和米留丁不同意党的政策，宣布辞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

与左派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关系

在农村产生重大影响的左派社会主义革命者最初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RSDLP（b）与左翼社会主义革命者之间达成了协议，几名左翼SR领导人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了任命（科列加耶夫，斯皮里多诺娃，普罗什扬和斯坦伯格）。但是，当时农民之间发生了深深的分裂。一些左翼的社会党与富裕的农民站在一边，并发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起义被苏维埃政府镇压。

俄罗斯仍在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布尔什维克认为，战争必须结束，以巩固苏维埃政权。苏联政府呼吁“所有反战的人民及其政府立即展开谈判，以实现公正，民主的和平”。但是，俄罗斯的前盟友-英国和法国-拒绝接受苏联政府的提议。鉴于这一拒绝，苏联政府决定开始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谈判。谈判于12月3日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开始。12月5日，停战协定签署。

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到怀特卫队的俄罗斯政治领域的大部分人都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谈判政策。而且，党内的一个部门对谈判路线存有疑虑。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由布哈林领导，也包括拉德克和比亚塔科夫组成的一个团体）认为战争应该继续进行。

1918年2月10日，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中断。尽管列宁和斯大林曾主张签署和平协定，但托洛茨基曾是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在1918年1月22日赢得了该党执行委员会的投票，并于1918年2月10日宣布他的“不和平，不战争”政策：苏联谈判代表退出谈判，希望德国国会大厦中的和平派别确保德国不会恢复冲突。战斗恢复了，德军迅速进军俄罗斯领土。

在这个关头，RSDLP（b）和苏联政府发出了呼吁：“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敦促工人阶级加入红军。

1918年2月18日，该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向德国政府发送电报的

提议，以达成立即和平。但是，德军的进攻仍维持了几天。德国政府表示愿意在2月22日签署和平协议。

在党内，辩论仍在继续。列宁宣称，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实际上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并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发展”。2月23日，中央委员会决定接受德国司令部的条款并签署和平条约。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在内的大片领土被移交给德国控制，乌克兰在德国的统治下转变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此外，苏维埃政府承诺向德国人赔偿。

第七届党代会

关于和平问题的辩论是1918年3月6日举行的第七届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这是该党执政后举行的第一届代表大会。有46名代表参加表决，58位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145,000名党员。实际上，当时的党员人数不少于270,000。之所以出现差异，是因为由于大会开会的紧迫性，许多组织无法及时派遣代表。当时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上的组织根本无法派遣代表。

列宁在这次关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平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由于我们党内部形成了左翼反对派，我们党现在正在经历的严重危机是俄罗斯革命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

列宁提交的关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平主题的决议以30票对12票，4票弃权获得通过。这项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列宁写了一篇题为“痛苦的和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和平条款是无法容忍的。然而，历史将拥有自己的历史。。。。让我们着手组织，组织和组织。尽管经历了所有考验，但未来是我们的。

— 列宁，著作集，拉斯。ed。，Vol。第二十二页 288。

大会在其决议中宣布，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进一步军事袭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会认为，党的基本任务是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组织红军并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

入侵，内战和战争共产主义

苏维埃共和国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军事打击，无论是来自外国还是来自国内的反对派，即所谓的白俄。为响应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威胁，RCP（b）宣布该国为武装营地，并将其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置于战争的立足点上。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险之中”，并呼吁动员红军。列宁的口号是：“全力以赴！”。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约有一半走到最前面。在党的宣传中，这是一场为祖国而战，是一场针对外国入侵者的战争，也是一场针对被革命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的战争。列宁组织的工人和农民国防委员会指导了为前线供应增援，食物，衣服和武器的工作。

在这个关头，社会革命党开始暗杀党的领导成员。他们杀死了乌里茨基和沃洛达斯基，并尝试了暗杀列宁。此后，"红色恐怖"开始实行；在俄国各地，社会主义革命者遭到镇压。

该党通过红军内部的政治委员积极参加了军事事务。政治委员会负责对部队的政治思想训练。

面对极端物质困难的局势，苏联政府出台了战争共产主义政策。除大型工业外，它还控制了中小型工业，从而积累了用于军队和农业人口供应的货物。它实行了国家对谷物贸易的垄断，禁止了谷物的私人贸易，并建立了剩余分配制度，在该制度下，农民手中的所有剩余农产品都要由国家以固定价格进行登记和获取，以便积累粮食储备以供军队和工人使用。最后，它为所有阶层引入了普遍劳动服务；在党的政策中，实行了"不工作，就不许吃饭"的原则。

击败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和德国政府的推翻而告终。苏联政府现在取消了对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协议的承诺，并发起了一场军事和政治斗争，要求收回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和特兰科卡西亚。

第三共产国际

自从第二国际组织中断以来，布尔什维克就一直在主张建立新的第三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在欧洲新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成立于俄罗斯；革命起义发生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国家组成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在1919年三月举行；布尔什维克是新国际组织的创始方之一，其总部位于莫斯科。

第八届党代会

RCP（b）第八届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举行。它是在战争中集会的。出席会议的有301名代表，代表313,766名党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的代表。列宁在就职演说中向在大会前夕去世的YM Sverdlov致敬。

第八届党代会通过的RCP（b）党纲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该方案包括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描述，并比较了两种国家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联制度。它规定了党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具体任务：资产阶级被没收财产；按照单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国家的经济生活；工会参与国民经济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在苏维埃机构的控制下利用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逐步和系统地争取中农。

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除了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外，还对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的旧计划中的工业资本主义和简单商品生产进行了描述。列宁认为该计划必须考虑到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并注意到该国存在以中农为代表的多样化经济形式，包括小商品生产，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是，布哈林提议将有关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中农经济的条款排除在方案之外。

布哈林和比亚塔科夫在民族问题上与列宁不同。布哈林和比亚塔科夫反对在方案中列入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款；声称这是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不同民族无产者联合的口号。列宁反驳了布哈林和比亚塔科夫的立场。

第八届代表大会审议中的一个重要位置专门用于对中农的政策。《土地法令》导致中农的数量稳定增长，中农现在占农民的大多数。在对党的分析中，中农的态度和行为对国内内战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分析规定，国内内战战争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农将以何种方式摇摆，哪个集团会赢得他们的效忠。

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对中农的新政策要求无产阶级应依靠贫穷的农民，与中农保持稳定的联盟，并与“富农”作斗争。这意味着党要竭力阻止中农站在小农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但是现在这还不够。第八次代表大会从中立农民的中立政策转变为与他们稳定联盟的政策，目的是反对白俄和外国干预。

与红军建设有关的问题在大会的审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出现在战场上。这次“军事反对派”包括现在破碎的“左派共产党人”团体的许多前成员；但其中也包括一些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对活动但对托洛茨基处理军队事务的方式不满意的党的干部。“军事反对派”对托洛茨基怀有敌意，理由是他依赖于旧的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他们是“军事反对派”眼中的敌人。

列宁和斯大林谴责“军事反对派”，因为它抵制了正规的红军的建立，抵制旧军军事专家的使用以及严格的军事纪律的建立。斯大林在回应“军事反对派”时说：

我们要么建立一支真正的工人和农民-主要是农民-的军队，训练有素的军队，保卫共和国，要么灭亡。

大会上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这项决定背后的动机是加强红军并使它更接近党。

最后，鉴于新党员的大量涌入，大会概述了改善党的社会组成的措施，并决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引发了党支部的第一次清洗。

1919年3月25日，由第八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任命了由卡梅涅

夫，北·克里斯汀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组成的政治局，布哈林，齐诺夫耶夫和加里宁为候补委员。

第九届党代会

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下旬举行会议。有554名代表参加了投票，代表611,978名党员，有162名代表发言但没有投票权。大会确定了该国在运输和工业领域的紧迫任务。它特别强调了工会参加建设经济生活的必要性。

大会特别注意了恢复铁路，燃料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单一经济计划。该计划的主要项目是该国的电气化项目，列宁将该项目称为“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一项伟大计划”。这构成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GOELRO）计划的基础。

革命共产主义党合并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决定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共产党，革命共产主义党解散，其成员加入了RCP（b）。

十届党代会

该党最初允许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自由和公开辩论，但由于内战而改变了。在1921年的第十届党代会上，该党的各派被禁止，包括工人反对派。在1922年，共产党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

1922年，犹太共产党（Poalei Zion）（EKP）合并为该党的犹太区Yevsektsiya。这是当时活跃于俄罗斯的两个Poalei Zion（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之一。另一个是犹太共产主义工党（Poalei Zion），于1928年被禁止。

斯大林上台

结果，该党的权威增加了，它对政府的控制也增加了，而在党内部，政治局的权力也在增加。根据列宁的动议，斯大林于1922年4月被任命为共产党总书记。

下个月，列宁遭受了第一次中风，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这一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列宁在政府中的作用下降了。1922年12月，他第二次中风，政治局下令将他隔离。他在1923年3月的第三次中风使他卧床不起，无法讲话，尽管他仍然可以通过写作进行交流。列宁最终因1924年1月的第四次中风而去世。

由于列宁患病，总书记的职位变得比最初设想的更为重要，斯大林的权力也随之增强。由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出现，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并试图阻止托洛茨基掌权。然而，列宁对斯大林变得越来越不安，在他于1922年12月中风之后，他致党的一封信批评他并敦促他免任总书记。斯大林得知列宁的遗嘱，并出于健康原因使列宁处于孤立状态，并增强了对党派组织的控制。

由于与托洛茨基和他的左翼反对派之间日益扩大的政治分歧，斯大林，齐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的三驾马车于1923年秋天团聚。在1923年第十二届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未能使用列宁的《遗嘱》作为对付斯大林的工具，原因是担心危及该党的稳定。

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5月在中央委员会大声宣读了他的《遗嘱》，但齐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认为，列宁的反对意见毫无根据，斯大林应继续担任总书记。中央决定不发表遗嘱。

同时，针对托洛茨基的战役愈演愈烈，他在年底前被从人民战争委员会撤职。1925年，托洛茨基因其《十月的教训》而受到谴责，该文章批评齐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最初反对列宁在1917年进行暴动的计划。托洛茨基也因其永久革命理论而受到谴责，这与斯大林提出的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立场相抵触。在1920年代，随着欧洲（尤其是德国）发生革命的前景变得越来越黯淡，就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言，托洛茨基的理论立场开始变得越来越悲观。

随着托洛茨基辞去战争委员会的职务，三驾马车的团结开始瓦解。Zinoviev和Kamenev再次开始担心斯大林的力量，并感到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斯大林在支持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与布哈林及其盟友结成同盟，并鼓励工业化进程放慢脚步，鼓励农民通过市场激励措施来增加产量。Zinoviev和Kamenev谴责这一政策是对资本主义的回归。这场冲突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党代表大会上爆发，齐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抗议斯大

林的独裁政策，并试图重新强调列宁的遗嘱问题。斯大林利用托洛茨基对季诺维夫和卡梅涅夫的先前批评击败和降级他们，并招募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米哈伊尔•卡里宁等盟友。托洛茨基在1926年完全脱离政治局。第十四届国会也看到了斯大林人格崇拜的最初发展，斯大林首次被称为“领袖”，并成为代表们称赞的主题。

托洛茨基，齐诺维耶夫和卡梅涅夫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而组成了联合反对派，但由于党的斗争，他们失去了影响力，不再对斯大林构成严重威胁。1927年10月，托洛茨基和齐诺维耶夫被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在1927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左翼反对派的其余成员受到侮辱，1928年，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被共产党开除。

接着，斯大林通过赞赏托洛茨基对右翼政策的批评来反对布哈林。斯大林现在提出了一条新路线，促进农民集体化和工业的快速工业化，迫使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陷入右翼反对派。

在1928年7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哈林及其支持者争辩说，斯大林的新政策将导致农民破产。布哈林还暗示了列宁的遗嘱。布哈林在莫斯科获得了党组织的支持，但是斯大林可以操纵全国各地的党员选举，从而使他可以控制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会。右派反对派被击败，布哈林试图与卡梅涅夫和齐诺维耶夫结盟，但为时已晚。

清洗旧布尔什维克

在1930年代，其他许多高级共产党员被撤职，其中许多人是斯大林的盟友，其中许多人在神秘的情况下被处决或死亡，包括列夫·卡梅涅夫，格里戈里·辛诺维耶夫，阿列克谢·雷科夫和尼古拉·布哈林。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煽动了对该党高级成员的一系列清洗活动，最终以1935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Great Purge）行动为主要过程，称为莫斯科审判（Moscow Trials）。

表面上看，清除工作开始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调查。齐诺维耶夫及其前支持者被指控谋杀，并在被处决前受到审判。继续进行“调查”，很快发现数千名涉嫌密谋者，他们被类似地围捕，开枪或安置在劳教所中。斯大林声称，基洛夫的刺客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是齐诺维耶夫，卡梅涅夫以及最终列昂·托洛茨基领导的针对苏联政府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

促成清洗的其他诱因可能是1932年政治局拒绝批准MN Riutin的处决。MN Riutin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分发了200页的小册子，呼吁撤除斯大林。斯米尔诺夫（Smirnov）自1896年以来一直是共产党成员，还被发现煽动斯大林的罢免。

政治局未能对党内的反斯大林主义者采取残酷的行动，这可能与斯大林的思想和基洛夫日益增长的声望结合在一起，使斯大林确信必须果断地对付自己的对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中的对手，并摧毁他们的名声。

莫斯科审判一直持续到1938年。包括布哈林，拉德克，雷科夫和拉科夫斯基在内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都被指控密谋推翻斯大林，甚至与希特勒密谋反对苏联，并受到审判和处决。

1936年至1938年间，大清洗从该党中开除了850,000名成员，占党员总数的36%。其中许多人在监狱中被处决或杀害。1917年加入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尤其成为目标。

在1939年举行的全联盟共产党十八大，只有2%的代表也曾经参加在1934年举行的上一届大会。

斯大林主义

在斯大林与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战争中，劳改营被扩大到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制度。斯大林还对库拉克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安置，类似于沙皇建立的ssylka刑罚制度（偏远地区的重新安置），该制度是为应对政治异见者和普通罪犯而没有处决他们而建立的。

随着斯大林巩固他的统治，在斯大林领导下，党本身不再是一个严肃的审议机构；与党代会相比，尤其是在大清洗之后，党只不过是展示代表们对斯大林的赞美而已的作品；这成为了一种个人崇拜。在1939年至1952年之间，根本没有举行过党代表大会。秘密警察的作用在苏维埃社会和党内变

得至为重要，要密切监视党员以确保他们遵守斯大林。同样，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成为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橡皮图章，没有任何能力挑战斯大林的权力或质疑他的决定。

在1952年的党代会上，斯大林让莫洛托夫和米科扬从中央政治局被撤职，并通过以25名主席团成员（加上11名候选人）取代该机构，稀释了执行委员的权力，这是旧政治局的两倍。但是，为了使决策更易于管理，成立了一个与旧的政治局相当的非正式主席团。这包括斯大林，拉韦伦蒂·贝里亚，乔治·马林科夫，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古拉·布尔加宁，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拉扎尔·卡加诺维奇，马克西姆·萨布罗夫和Mikhail Pervukhin，未来的决策在实践中仅限于其中的前四个或五个。

斯大林之后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引发了新的争取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斗争。人们普遍认为，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明显继任者，但他在斯大林任职的最后几年就不受欢迎，并于1952年从政治局撤职（尽管他在斯大林死后复职）。为继承而进行的斗争成为了贝里亚（NKVD令人恐惧的领导人），Malenkov和Khrushchev之间的较量。

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召开主席团的核心会议，贝利亚提出马林科夫为部长理事会的主席（或总理）。

尽管贝里亚（Beria）曾是斯大林最残酷的下属，但他在斯大林去世后却处

于去斯大林化和自由化的最前沿，这可能是为了赢得支持、以使他成为领袖的一种手段。贝里亚（Beria）不仅煽动从古拉格（Gulags）释放数十万名政治犯（他一开始就抓捕过的囚犯），而且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并说服了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敦促乌布利希特德国政权放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进行了自由经济和政治改革。

幸存的党领导们特别担心贝里亚和赫鲁晓夫将他们视为他最严重的竞争对手。赫鲁晓夫无法赢得莫洛托夫（Molotov）等主席团的保守派支持，直到贝里亚（Beria）的一项举措（即他的德国政策）导致苏维埃政权遭受灾难。在贝里亚（Beria）的敦促下，东德政府向公众发出了关于该政权放松的信号，从而提高了期望，但是当他们对实施改变时，例如取消了一项计划，以增加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单个工人的工作量），导致了大规模抗议运动。这威胁了东德政府的安全，并导致了苏军的严厉镇压（参见1953年东德起义）。

德国发生的事件使贝里亚的保守派和支持者，例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确信他的政策是危险的，破坏了苏联的力量（他的国籍政策被视为对苏联本身统一的威胁）。在德国发生事件的几天后，赫鲁晓夫说服他们支持对贝里亚的有效攻势。1953年6月，在斯大林去世三个月后，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主席团成员（改名政治局）同意在主席团会议上伏击贝里亚。贝里亚逮捕。1953年12月，他遭到审判并被枪决，但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在6月的主席团会议上开枪打死了贝里亚。

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成为第一书记，迎来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共同掌权的时期。1955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林科夫因与贝里亚的密切关系

以及未能履行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承诺而受到批评。下个月，他被免职。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的召开，标志着党同斯大林正式决裂；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讲话，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和暴行。这迎来了一个去斯大林化时期，结束了在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释放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并解冻了政治和文化禁锢。对于主席团（已更名为政治局）的保守派人士来说，这太过分了。1957年夏天，马林科夫（Malenkov），卡加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和布尔加宁（Bulganin）试图罢免赫鲁晓夫，并在主席团中投票罢免了他；但乔治·朱可夫（Georgy Zhukov）国防部长兼战争英雄支持赫鲁晓夫，要求将此事交给中央委员会决定。赫鲁晓夫最终战胜了所谓的反党集团，并于1958年成为总理，同时保留了第一书记的位置。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家安全机构比党和军队更强大。贝里亚（Beria）被捕和处决所导致的逆转，终结了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Gulags）的许多任意逮捕和强迫劳动制度。

赫鲁晓夫试图在1962年按照经济而非地域范围重组政党结构。这导致了许多共产党官员的困惑和疏远。

由于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的声望受到了严重破坏；古巴危机最终导致党内许多人认为赫鲁晓夫没有能力、因而给苏联招致了屈辱。由于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他的农业和工业政策失败，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0月将他免

职。勃列日涅夫上台；但是，没有恢复针对党员的恐怖政策。

勃列日涅夫能够巩固权力，成为领导者，但他从来没有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那样获得过非常大的权力。在1966年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得以宣布自己为该党总书记，从而恢复了自斯大林以来从未拥有的头衔。主席团还恢复了以前的政治局名称。尽管Kosygin试图推行一项政策，使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优于重工业，但是，勃列日涅夫（Brezhnev）支持军事扩张，因此必须继续重视重工业。当科西金继续担任总理时，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赢得了胜利，到1968年，他成为党和国家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时期迎来了党内无与伦比的稳定时期，这种稳定最终导致了停滞。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则从1966年的55岁上升到1982年的68岁。苏联老龄化的领导导致人们将其描述为老年主义国家。勃列日涅夫（Brezhnev）于1975年中风，但尽管健康状况恶化，他仍继续掌权，直到他于1982年11月去世，享年76岁。他的最后几年的特点是试图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党内成员日益腐败。

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于1985年成为中央政府总书记。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在切尔年科去世之前可能已经掌握局势，因为他是在1985年3月10日切尔年科去世的第二天宣布成为新任总书记的。

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制定了格拉斯诺斯特（Glasnost），佩雷斯特里卡（perestroika）和加速政策。公开性政策允许言论自由；苏联改革企图重组政治，特别是该国的经济组织，同时加速更快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的

自由化最终以苏联集团在东欧的解体而告终。

在198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进行了一些改革，以减少该党对政府的控制，其中包括提议对地区和地方立法机构进行多候选人选举。尽管戈尔巴乔夫能够从党中获得改革的认可，但苏共的成员越来越抵制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多地绕过该党，以依靠政府机构实施其改革。

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

1989年，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允许其他政治协会（事实上的政党）与共产党共存，并于1990年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这条宪法使该党在社会上的所有机构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终止了其先锋队地位。

到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该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无法领导该国。党失去了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失去了领导国家的权力或保持党团结的凝聚力。

苏联解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苏共的强硬派分子于1991年发起了八月政变，这使戈尔巴乔夫暂时失去了权力。1991年8月19日，即在签署新联盟条约将权力下放给各共和国的前一天，一个自称为“国家紧急委员会”的组织在莫斯科夺取了权力，宣布戈尔巴乔夫病了，因此解除了其总统职位。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被任命为代理总统。该委员会的八名成员包括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内政部

长鲍里斯·普戈，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和总理瓦伦丁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

但此次政变失败了。政变失败的原因是大规模的公开示威活动以及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努力；鲍里斯·叶利钦后来成为俄罗斯的真正力量。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返回莫斯科担任总统，并誓言要清除强硬派。克格勃与苏共的其他相关机构也被解散。

政变在政治上摧毁了苏共。几乎所有的说法都表明，政变证明该党是无法改革的。出于各种目的和原因，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于8月24日结束。那天，戈尔巴乔夫解散了中央委员会，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并下令解散政府中的所有党派。当天晚些时候，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Vladimir Ivashko）被选为代理总书记。但是，实际的政治权力在于苏联总统（由戈尔巴乔夫担任）和俄罗斯SFSR总统（由叶利钦担任）。

11月6日，叶利钦发布法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活动，并没收其在俄罗斯的所有政党财产。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不仅维持了该法令，还禁止苏共重新成立。它接受叶利钦的说法，即苏共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一个以苏联为独裁政权而违反苏联宪法的犯罪组织。

如今，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政党，自称是苏共的继任者。

在其他共和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亚美尼亚共产党，共产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乌克兰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和共产党塔吉克斯坦。这些党与CPRF一起组成了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SKP-KPSS）。

在土库曼斯坦，由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领导的地方政党机构转变为土库曼斯坦民主党。

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将苏共的分支机构转变为人民民主党。

在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工党成立于1992年。该党后来演变为格鲁吉亚共产党（SKP）。格鲁吉亚另一个比SKP大的共产主义派系是格鲁吉亚联合共产党（SEKP）。

在爱沙尼亚，苏共的分支机构掌握在改革派手中，改革派将其转变为爱沙尼亚民主工党（EDTP）。少数人重新加入爱沙尼亚共产党。

在立陶宛，苏共于1991年被正式禁止。由阿尔吉达达·布拉索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领导的"进步的"共产党人的分支改成了1992年成立的立陶宛民主工党。在拉脱维亚，共产党组织被正式取缔，并且该党的主要部分于1990年脱离并成立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苏共的残余成员成

为拉脱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该联盟进入地下。后来的共产党人重新组成了拉脱维亚社会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Communist_Party_of_Vietnam

越南共产党的历史

本文介绍了越南共产党的历史，该党从1945年开始统治越南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ThanhNiên

越南共产党（CPV）起源于1925年。在这一年的春天，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治组织，越南革命青年协会（越南语：ViệtNam ThanhNiênKάchMệnhHội-通常称为："ThanhNiên"）。

Thanh Nien寻求利用爱国主义来结束法国对该国的殖民占领。该小组寻求政治和社会目标，包括民族独立和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

ThanhNiên的最初建立是起于1924年12月；当时，共产国际国际工作人员胡志明从莫斯科抵达中国广州。表面上说，胡志明被派往中国，担任Mikhail Borodin的秘书和口译，但实际上，他几乎立即着手工作，试图将现有的越南爱国运动转变为革命目的。他成功地将一小批名为Tam Tam Xa（心连心协会）的移民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ThanhNiên诞生了。该组织在广州的总部领导了越南的地下革命运动，做出了所有重要决定。

Thanh Nien旨在为反对法国殖民占领的武装斗争做准备。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设想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将建立一个外部中心作为培训中心，统一的政治宣传资源和总部，以进行战略决策以及维护组织和思想学科。秘密革命团体将在广州接受培训，然后返回越南开展活动。

在第二阶段，活动将变为“半秘密”，其中，干部将发起政治和经济活动，包括罢工，抵制和抗议活动，其中可能包括政治暴力作为动员群众的手段。第三阶段是起义阶段，它将上升并通过武力推翻已建立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

ThanhNiên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群众组织，其最受信任的成员是指挥中心的一部分。在Thanh Nien于1929年解散时，CYC被认为由24名成员组成。除了Thanh Nien之外，这个小圈子还有另外两个群众组织Nong Hoi（“农民协会”）和Cong Hoi（“工人协会”）。

CYC和ThanhNiên出版了小册子和报纸，包括1925年6月至1930年5月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技巧指南《通往革命之路》以及四家报纸-Thanh Nien（“青年”）。1926年12月至1928年初出版了“工农”；1927年初至1928年初，出版了Linh kach menh（“革命士兵”）；和“越南人”（1927年）。

1929年的派系分裂

1928年，为了避免中国国民党的镇压，该中心不得不反复搬迁，首先是搬到梧州，然后搬到香港。胡志明于1927年5月离开广州，并与越南运动保持隔离。缺乏与统一总部的联系导致了组织分裂，激进派激进分子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他们通过法国共产党和其他人遵循了不同的道路。

1928年9月，激进的ThanhNiên的Bac Ky地区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肯定了共产国际的新《第三时期》分析，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革命性的热潮。ThanhNiên注意到该组织在城市中心的知识分子中的增长，会议决定将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送入农村和城市工厂，以期将共产主义思想带给贫穷的农民和数量很少的工人阶级。ThanhNiên在致共产国际的信中估计，其成员中约90％为知识分子；希望有全面的攻势来赢得群众的支持。

ThanhNiên中央委员会召集该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929年5月5日开始。这次聚会于1929年5月1日至9日举行，越南三个主要行政区中的每个区的1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那些主要强调所谓的“民族问题”（摆脱殖民主义的独立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社会革命的人之间产生了分裂。

一些ThanhNiên领导人被指责为“假革命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月17日，来自整个TONKIN地区的20多名代表在河内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宣布ThanhNiên解散，并成立了一个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ICP）的新组织。

北方新政党出版了小册子，详细介绍了其根据共产国际的《共产党规约范本》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于1928年批准的国际计划制定的规则。

发行了三份期刊—报纸《Co do（ “红旗”），理论杂志Bua liem（“斧头和镰刀”）和工会出版物Cong hoi do（“红色工会”）。

另一派系设在该国的中部和南部行政区，于秋天自称为安南共产党。这两个组织在1929年余下的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企图在这场运动中获得霸权。

第三个越南共产党出现在这段时间，这个团体的根源是另一个民族解放团体，它是作为ThanhNiên的对手而存在的。

1930年：越南共产党

ThanhNiên的两个斗争派系与第三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成员成立了PhanBộiChâu，在1930年2月3日至7日在香港举行了“统一会议”。胡志明再次活跃起来并负责促成和平，以及撰写该团体的初步宣言和战术声明。新党被命名为越南共产党（CPV）。

香港会议（在九龙城举行）选举了一个由9名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北部TONKIN的3名委员，安南中部地区的2名，南部的华侨乡镇的2名和越南移民社区的2名组成。后者是先前在南海共产党内部组织的。

共产国际强烈批评该组织的统一方式，谴责越南党派未能消除所谓的“异质性要素”。该组织以“独立越南”为口号、对民族解放的强调，被批评为民族主义的体现；而该党对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认识被认为是不够的。共产国际要求召开新的会议，将其称为“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于1930年10月在香港举行，并将组织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ICP），以标记共产国际施加的变化。

ICP正式成立之初，可以说只是一个小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一个拥有1700万人口的国家中，工人只有22.1万人。即使是少数人，其中多数也远离现代工业，其中三分之一以各种身份受雇于橡胶园等。北方的工人阶级本质上是半农民，在矿山和工厂里工作。工作条件差，劳动力流动率高。

在最初的五年中，ICP的会员人数达到1500人，外加一大批同情者。尽管该组织规模不大，但在动荡的越南社会环境中却发挥了影响力。1929年和1930年的歉收加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许多难民激增。在工业城市Vinh的“五一劳动节游行”是由ICP激进分子组织的，当半农民工人的家庭加入示威游行以发泄不满时，游行示威活动达到了临界点。

随着五一劳动节的三天游行集结起来，法国殖民当局开始压制他们认为是危险的农民起义。政府军向聚集的人群开火，杀死数十名参与者，激怒了民众。作为回应，地方委员会在各个村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期在叛乱蔓延的时候进行自治。镇压始于秋天，最终约有1300人被法国人杀害；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倍。潘富邦总书记和中央许多领导人被捕并被杀害。尽管ICP在该地区被有效淘汰，但记忆仍然存在。Lê HồngPhong被从共产国际指派来恢复运动。

人民阵线时期（1935–1939）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5年在澳门秘密举行。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政策，以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阵线，并指示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反法西斯势力合作。这要求ICP将印度支那的所有民族主义政党视为潜在的盟友。

HàHuyTập被任命为秘书长（代替LêHồngPhong）。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对欧洲战争的全神贯注使得法国不可能进行殖民统治；越南被日本帝国军队占领。

ICP指示其成员搬到农村地区并作为地下组织藏身。尽管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但仍有2000多名党员被监禁，其中包括许多主要领导人。共产党活动家在科钦南的南部地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那里以前强大的组织干部被逮捕和杀害殆尽。1940年，在COCHINCHINA起义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被捕，被杀害，其中包括阮国文秘书长，哈韦·图普（HàHuyTập）；Lê HồngPhong被驱逐到CônĐảo，然后死亡。

在废除了旧的领导层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小组，其中包括Tr Chng Chinh，PhạmVănĐồng和VõNguyênGiáp。这些人与胡志明一起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承担统一的领导作用。

1941年2月，胡志明返回越南，成立一个军事组织"越南联盟"（常称为"越盟"）。"越盟"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爱国组织，以争取公众对反抗日本军事占领的最大支持。作为抗击占领的最坚定的力量，"越盟"在越南将发展为政治真空的过程中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和合法性。

胡志明的个人命运并非易事。1942年8月，他的组织处于困窘、缺乏武器状态，其基地被孤立，他前往中国寻求盟军的军事援助。胡志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遭受了14个月的残酷监禁，随后又被限制行动一年。直到1944年9月，他才能够返回越南。若没有胡志明，越南共产党难以成功发展。尽管印度支那共产党（ICP)是越共组织的核心，但在整个战争年代，其规模仍然很小，估计在1944年为2000至3000名成员。

ICP于1945年发起了起义，即八月革命，解放了Le Duan和其他地区。

解散和改革

ICP于1945年正式解散，以掩盖其共产党人的隶属关系，其活动被归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和"越盟"。它的残余部分成为了越盟的核心。美国中央情

报局（CIA）估计，其人数增长如下：50,000名会员（1946年），400,000名会员（1950年）。

该党于1951年在TuyênQuang举行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重新成立为越南工人党。当时该党有766,349名成员，并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是越南、老挝、柬埔寨。1960年在河内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在当时的北越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并宣称该党要在南方进行解放革命。该党有大约500,000名成员（南越加上北越）。在1976年的第四届代表大会上，北越工人党与南越人民革命党合并，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当时，该党有1,550,000名成员。

执政党（1976年至今）

1976年7月2日，南越和北越统一，成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CPV保留了权力。

第四届代表大会（1976年至1982年）

第四届大会由1,008名代表组成。批准了一项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批准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80年），并对党章进行了几处修正。强调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支持社会主义在国外的扩张。该党当时的经济目标是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20年内建设一个强大和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彻底失败。在党的四到五次会议期间，人们对经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第一次会议是在1979年9月的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进行的，但最具启发性的讨论是在1981年10月9日至11月3日举

行的第四次会议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的。

第五届代表大会（1982年至1986年）

XXXX

在1982年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LêDuẩn表示，该党必须实现两个目标。首先是建设社会主义，其次是保护越南不受中国侵略，把社会主义建设放在首位。党的领导层承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失败，声称是他们未能掌握经济和社会条件，这加剧了该国的经济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1981-1985）强调需要改善生活条件和需要更多的产业投资，但农业是放在首位。

“在我们党争取权力的日子里，它依靠人民的支持。现在，拥有权力很可能导致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导上与群众疏远，自大和霸道，贪婪和贪污，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所有这些都必须受到强烈批评和谴责。”

“第三个五年计划”引入了市场价格，导致通货膨胀达到100％以上。第三个五年计划也失败了。

1986年8月25日至30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为更激进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改革运动是由前毛主义-斯大林主义强硬派TrườngChinh领导的。

第六届大会（1986–1991）

新的领导层随后将发起ĐổiMới并建立面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框架。经济改革是在放松国家审查制度和增加言论自由的同时发起的。

1990年11月17日至26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创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纲要草案》，为即将召开的第七届大会做准备。它宣称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道路”，“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面对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共产主义运动将得到振兴。

在第七届党代会上，NguyễnVănLinh退出了积极的政治生涯。他重申越南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在第七届党代会之后，保守派试图恢复对党的控制。1994年，第七届政治局任命了四名新成员，他们都反对更激进的改革。尽管采取了保守的措施，但改革仍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七届和第八届党代会之间的经济平均增长了8％。尽管增长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要持续增长，就需要进行持续的改革——但是，人们认为，这样的改革将导致局势动荡，甚至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权。保守派因此反对变革，而改革派则认为变革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19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每年的增长率缩水至2％。

内斗

在党的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爆发了派系内斗，削弱了该国的领导地位。虽然由VõVănKiệt领导的改革者想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方式使越南对全球经济开放，但这与列宁主义经济学完全决裂，保守派人士希望越南的国有企业独领风骚。

VõVănKiệt在1995年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中写道：“为了动员党内所有才能，必须实行不妥协的民主制度。”他抨击保守派，声称国有部门必须收缩以支持私营部门，越南必须放弃与其余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他建议该党停止干预政府事务，把国家利益置于政府事务之上。作为回应，保守派派遣NguyễnHàPhan到全国各地，批评VõVănKiệt；他声称他背离了社会

主义。随着权力斗争的继续，参谋长**ĐàoĐìnhLuyện**因支持改革派而被降职，NguyễnHàPhan在1996年4月因叛国罪而被从政治局降职并被软禁。

第八届代表大会（1996年至2001年）

党的领导层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年来，中央领导层第一次被省级党支部和政府官员所取代，只有8.9%的新中央委员会成员来自中央党组织，而67%的新成员具有直接的省背景或政府背景。

自第六届党代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下放迅速增加。省级官员首先感到经济危机的紧迫感，并且最热衷于进行改革。这导致了LêKhảPhiêu在2001年垮台。尽管他能够说服政治局继续让他担任总书记（三分之二多数投票赞成保留他），但第八届党代表大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全会推翻了政治局的决定将他赶下台。NôngôcMạnh于2001年在第九届党代会代表大会上接替LêKhảPhiêu担任总书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

7%E5%85%9A%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8%97%E8%A1%A8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列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发动的各主题政治运动。

群众与法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董必武指“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改革开放后，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继而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意味着中国“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所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仇恨心理和斗争哲学，进而它还意味着我们抛弃（苏俄）洋教条”。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师承自俄国十月革命，清华大学法学院苏亦工写道“俄师教给我们的除了暴力、强权和欺诈外，还多了三样东西：仇恨、斗争和丧失自我。关于仇恨和斗争，凡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走过的人，哪个不曾有过‘仇恨在胸’、‘斗志昂扬’的经历？回首1921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史，[...]频繁不断的斗争,接踵而至的运动，无不弥漫着暴力和血腥。”

运动列表

时期　运动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主要目标群体　　　死亡人数　　备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打AB团　　1930年　　1931年　　党群机关（后发展到军队）　　7.6万 其中，红二十军和红四军冲突，导致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军官全部被杀，史称富田事变

肃清社会民主党　　1931年　　1931年　　闽西苏区　　6352　起因是有人错喊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肃清国民党改组派　1931年　　1932年　　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　　2万多 湘鄂西苏区肃反四次，杀两万多人；鄂豫皖苏区将二百多知识分子肃成五、六人。

反王明路线　1933年　　1933年　　　　并未杀人

第一至第五次查田运动　　1931年　　1933年

肃清托派　　1935年　　1937年　　与王明、康生敌对的中共驻莫斯科党员

毛泽东时期　延安整风　　1942年　　1945年　　全体党员　　超过一万人

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　　1952年　　解放区　　83万至300万

以土改前地主占农村总人口4.75%（土地38.26%），土改后约占2.6%（土地2.2%）计算，前后减少约667万人。有约5%的富农，部分视同地主处理。

思想改造运动　1949年　1950年代　全国知识分子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　1953年　全国国民党残余、特工、土匪势力　反革命：71.2万（1954年报告）

87.46万（1996年报告）土匪：240万（至1952年10月）

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　1952年　三反：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中国国民党党员及无党派官员

五反：中国资产阶级　1320人自杀　王朝彬著《三反实录》：312万人被调查，123万人被指控贪污，运动共处分39.4万人，枪毙51人。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报告称383.6万人被调查，120.3万人被控贪污，至1952年底27万人被处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1952年　1956年　文艺界人士　中宣部与公安部逮捕92人，至年底查处100万人

大肃托　1952年　1953年　全国托洛茨基主义者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　1956年　全国

中共称该政策系源于年中粮食严重减产，但该年并未减产，且在之前已在四川试点。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1955年　1955年　党政机关

大鸣大放　1957年　1957年

反右运动　1957年　1958年　全国（以知识分子为主）　4117
55至460万人被定为右派。夹边沟有3000多名右派因饥饿而死，全国范围内的右派死亡数量未知。

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8年　1958年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　全国农村　各地结束时间不同，人民公社解体时间亦不同

大跃进　1958年　1961年　全国　2000万-4000万
农村供应中断

拔白旗、插红旗　1958年　1958年　高等院校、科研机关

第一次整风整社　1959年　1960年　全国　至少波及600万人，起因是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

第二次整风整社　1961年　1961年　公社官员　起因是信阳惨案曝光

四清五反运动　1962年　1966年　中国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

学雷锋运动　1963年　至今　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3年　1976年　全国农村

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　1963年　林彪要求解放军“突出政治”

工业学大庆运动　1966年　1976年　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　1977年　全国　2000-3000万人死亡，700多万人伤残，1亿人受到迫害　1977年8月，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

上山下乡运动　1955年　1978年　城市青年（1968年开始）　1968年大规模展开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　1967年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相关成员　1970年大规模展开

三忠于四无限运动　1968年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　1972年　全国　超过十万　周恩来下令按1‰肃清阶级敌人，处决者少，自杀者多。

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　1971年

反右倾回潮运动　1972年　1973年

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　1975年　全国

反师道尊严运动　1974年　1974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　1977年　全国

华国锋时期　揭批查运动　1976年　1979年　四人帮及主要追随者

抓纲治国　1976年

普及大寨县　1976年

新大跃进　1977年

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　　　　　1978年10月，邓小平阵营与华阵营面争，占上风。11月，平反四五事件。1981年6月，华国锋下台。

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等）

邓小平时期　清理三种人　1982年　1986　全国

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0年代初　全国

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　1983年　全国知识分子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6年　1992年　全体党员

反和平演变　1989年　至今

江泽民时期　爱国主义教育　1994年　至今　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三讲教育　1998年　2000年代初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取缔法轮功　1999年　至今　全国

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　至今　全体党员

胡锦涛时期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2003年　至今　全体党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4年　至今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5年1月　2006年6月　全体党政机关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2006年3月　至今　全国

创先争优活动　2010年　2012年　基层党员

习近平时期　反腐运动　2012年　至今　全体官员

猎狐2014专项行动　2014年7月22日　2014年底　逃亡到境外的贪官（中共党员和官员）

"天网"行动　2015年　至今　逃亡到境外的贪官（中共党员和官员）

脱贫攻坚战　2015年11月27日　2021年2月25日　贫困人口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3年　至今　全体党员

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　至今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2014年　至今　国防部门和军队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2015年4月19日　至今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　2016年2月29日　至今　全体党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18年1月24日　至今　黑恶势力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ampaigns_of_the_Chinese_Communist_Party

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清单

年　　活动　本地名称　　内容描述　　死亡人数　　来源

1930–1931年 反布尔什维克同盟事件　　打AB团　　　　　　对江西共产党基地的政治清洗，该运动导致大量红军官兵的审判和处决。

1937年　　　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1941–1945　　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　　长征结束后，在延安共产党基地开展了一次思想整风运动。通过这次运动，毛泽东巩固了自己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作用，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受苏联启发的思想改革方法有助于标准化，包括使用自我批评和“斗争”。

1947–1952　　土地改革　　　　　这是许多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第一个，它使得中国农村的土地被强行从地主手中夺走，并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

1950–1953年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镇压反革命者运动”，目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权威并镇压残余的反对派，其中包括前国民党的支持者和工作人员，商人和知识分子。那些被指控为反革命的人在大规模审判中遭到谴责。许多人被判处强迫劳动或被判处死刑。估计在这场运动中有700,000至200万人被杀。

1950年至1955年　新婚姻法　　　规定，必须通过国家机构对婚姻进行登记，并将可结婚年龄提高为男性的20岁和女性的18岁。

1950-1956年 打击文盲运动　　　在1950年的重点是将识字率从15%提升到25%。

1951–1952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1951）和五反运动（1952）是针对资本家和企业主的城市改革运动。它们表面上的目的是消除腐败，贪污和浪费，尽管它们还被用来清除对新共产党政府的反对力量。

1951–1953　退出宗派运动　　退道运动/退教运动 谴责和镇压秘密社会和宗教组织的运动，这些运动被视为对中共权力的潜在威胁

1953年　新的三反运动　　新三反/新三反

1955年　肃反运动　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隐藏的反革命者"进行政治清洗，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机构内部。人民日报宣布，共产党员中有10%是秘密叛徒。在保守方面，有消息来源称有81,000人被捕；另说有770,000人在这场运动中被杀。

1956年至1957年　百花运动　百花运动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鼓励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就国家政策问题发表各种观点和批评，其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批评开始针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时，该运动遭到镇压，许多参与者受到了惩罚。意识形态镇压使毛主义的正统观念再次公开化，并催生了反右运动。

1956年　公私合营　《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财产清算若干重大问题的规定》，涉及机械，房屋，矿产，成品，原材料，公积金等。

1957年　　党的整改

1957年至1959年　　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为响应百花运动而出现的，是为了查明和清除所谓的“右派”和对共产党政策的批评人士。从1957年至1959年，该运动分两波进行，大约有40万人至70万人受到了政治迫害。知识分子是特定目标，估计有10%的知识分子，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标记为右派分子。遭受该标签折磨的人会遭到社会排斥，批评和迫害，或者被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地作为惩罚。

1958年-1960年　　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由毛泽东发起的，其宗旨是通过农业化，工业化和土地集体化进程，将中国迅速转变为现代共产主义社会。禁止私人耕种，从事私人耕作的人被标记为反革命者并受到迫害。大跃进虽然旨在增加中国的经济产出，但实际上是一段经济衰退的时期。期间制定的政策，加上使用胁迫和暴力行为，导致了大饥荒，并导致3600万-4500万人丧生。

1958–1962年 消灭四害运动　　消灭麻雀运动　　大规模动员努力消灭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对麻雀的灭绝破坏了生态平衡，使蝗虫扩散，严重损害了作物。

1961年　　党员教育

1963年-1966年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次清理”运动，旨在清除“反动”分子和官僚主义，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域。该运动的一部分包括派遣政府成员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向农民学习。

1963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　　宣传活动鼓励模仿22岁时去世的年轻的解放军士兵雷锋。雷锋被推举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榜样，其中包括坚强的职业道德，自我牺牲的本性以及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奉献。

1964年　　　党的整改

1966–1976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俗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至197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由毛泽东发起，其既定目标是在该国实施共产主义——通过从中国社会中消除资本主义，传统和文化元素，并在党内强加毛主义正统思想。文化大革命标志着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重新掌权。该运动在政治上瘫痪了中国，并在经济和社会上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500,000至200万人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

1966年　　　破四旧是文化大革命的首批重大举措之一。毛泽东呼吁销毁“四个旧时代”，即旧习俗，旧文化，旧习惯和旧思想。这项任务主要落在了红卫兵身上。红卫兵听取了毛泽东关于烧毁和摧毁文化文物，中国文学，绘画以及宗教符号和庙宇的呼吁。拥有这些物品的人受到惩罚。知识分子被当作四旧的化身，因此遭到迫害。

1967年　　　清理阶级

1969年　　　党的整改

1968年至1978年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遏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解散红卫兵，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将城市青年派往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向农民学习”。该运动从196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在中国产生了“迷失的一代”，因为“下乡的青年”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70–1972年 一打三反　　以打击贪污和贪污，暴利，奢侈和浪费的“三个反面”为借口，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官方估计表明，在活动的前十个月中，有280,000名“反革命者”被捕。

1973–1975年 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发起的一项运动，将先前对已故

林彪的袭击与对儒家思想的批评联系起来。这场运动涉及寓言，其中毛泽东和四人帮代表了秦始皇和法制传统，周恩来则代表了儒家的反动势力。该运动间接针对周恩来，同时支持四人帮。

1975–1977年　　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人帮用它来攻击邓小平

1976年　　谴责四人帮运动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组成的“四人帮”被谴责为反革命分子。由于这四个人都在毛泽东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被指责为“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承担罪责者，并于1981年被起诉。

1982年　　反腐败，反经济犯罪

1983–1984年 清除精神污染　　反精神污染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保守派别，特别是邓立群在1983年秋天发起的。该运动是针对以增进人文和民权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其他表现形式的知识分子言论的强烈反对的一部分。

1983–1987年 党的整改

1986–1992年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9–2000年 反腐败运动

1991年–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该运动始于1991年，但直到1994年才全面进行。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增强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1996年　　抓大放小　　经济运动

1998–2000年 “三讲”（党的整风）　　江泽民于1998年底发起的“三讲”运动，是要求共产党员讲政治等等的思想改造。该运动是使市场改

革与社会主义哲学相协调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运动过程中，一些高级共产党官员因腐败指控而被起诉。

1999年至今　取缔法轮功　该气功是气功的精神实践，据信在1999年有7000万跟随者。该运动涉及对法轮功信徒的政治宣传，法外处决和强制性的“再教育”。据信至少有2000人遭受酷刑折磨致死，数十万人被监禁。

2005年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运动　开展意识形态整治运动，旨在增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反腐败和防范威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社会矛盾。该运动于2005年1月正式启动之后，数百万的党员参加了教育和自我批评会议。

2006年　八荣八耻　胡锦涛提出的道德守则旨在“衡量共产党员的工作，行为和态度”。

2009年　6521项目　由习近平和周永康主持的全国性行动，是通过压制具有政治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期间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来确保“社会稳定”。该运动的名称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1959年西藏起义50周年，天安门广场抗议20周年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10周年。

2012年　习近平领导下的反腐败运动　习近平发起的全国性行动，旨在消除腐败并清理中国共产党。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4%E5%AF%A8%E5%85%B1%E4%BA%A7%E5%85%9A

柬埔寨共产党是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政党，也是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执政党和唯一合法政党。1981年12月解散，其领导人改建民主柬埔寨党。

历史

成立

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按照“一国一共产党”的原则，将该党一分为三，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地方的组织分别成立共产党。同年6月28日，高棉人民革命党在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的基础上成立。

早期

高棉人民革命党自其成立以来就长期对外隐藏自己的存在，曾成立合法政党人民派作为掩护机构，人民派曾于1955年、1958年先后两次参加大选，都落败。1960年9月30日改名为高棉劳动党。1962年大选前，西哈努克宣称发现人民派受外国势力领导的证据并将其解散，自此柬共完全转入地下活动。在柬埔寨内战中，柬共最初同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对抗。

1963年，高棉劳动党召开三大，选举波尔布特为中央书记。1970年朗诺政变后，成立高棉共和国，西哈努克被推翻并流亡中国。1971年9月，高棉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共宣布仍奉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共同对抗朗诺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是其坚定的支持者，曾经为其提供过大量的物质支援。

夺权

1975年4月17日，攻占金边，成功推翻美国支持的高棉共和国政权，并掌握实权。1976年1月15日，柬埔寨颁布新宪法，将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柬共成为执政党。不过柬共仅自称“革命组织”，简称“安卡”。柬埔寨民众只知道是由“安卡”领导了推翻高棉共和国政权的革命，“安卡”的领导者被称为“安卡勒”。在柬共夺权的早期，甚至依然尊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以达到隐藏自己的目的。外界也长期不知道该党的存在，只知道是一股共产主义势力，将其称为“红色高棉”，“红色高棉”也成为世界上对柬共及其后继组织的称呼。

屠杀

柬共夺权后，便立即着手开展其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1978年，波尔布特向南斯拉夫客人鼓吹柬埔寨“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柬共奉行农业社会主义，故当局将城市人口全部迁移到乡下，同时其领导人波尔布特等人宣称要“洗净平民”，因而开始杀戮。此外，柬共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废除货币、禁止宗教信仰、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拆散家庭、并禁止知识和书籍的传播。民主柬埔寨政府借用中国的术语“大跃进”，将自己的经济计划也称为“大跃进”（Maha lout ploh），事实证明了这是一段危险的探索；由于中央施行不切实际的目标，大量人死于疾病、过度劳动或营养不良。在柬共执政期间因各种天灾人祸造成了将近当时25%人口（约200万人）的死亡。这段时期民主柬埔寨的人权状况也备受国际社会的诟病，此间发生了“红色高棉大屠杀”。

76年9月初，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柬共成立25周年前不久逝世。波尔布特在评论毛泽东逝世时，第一次公开表示柬埔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然

而，柬共的存在依然被隐瞒，据美国学者大卫·钱德勒推测，柬共可能计划在9月30日的25周年建党纪念日公开其存在。然而柬共内部却出现了分裂，一派主张以1951年（高棉人民革命党建立年）当作建党之年，另一派则认为1960年（改为高棉劳动党的年份）才是柬共的开始。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倾向于后者，在他们当选中央委员后，认为视1951年为建党时间的党内人士有忠于越南的嫌疑。而此时期越南与柬埔寨发生了边境冲突，更加重了波尔布特对他们的猜忌。波尔布特随即对这些人展开大规模清洗；波尔布特后来声称镇压了一次反对自己统治的“潜在政变”，大卫·钱德勒认为可能是针对这些党员的“先发制人的清洗”。

衰败

自1977年起，越南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的军队都曾多次侵入对方控制下的领土。波尔布特及其同事认为越南南部的下高棉人正准备推翻越南人统治，他们企图将下高棉纳入民柬势力范围。此前西哈努克和朗诺也曾梦想过建立大柬埔寨。然而下高棉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装备、动机和组织能力发动起义。

同年9月27日，波尔布特在金边广播电台作出发言，于柬共成立17周年正式宣布柬共的存在。他的讲话主要回顾了柬埔寨的历史轨迹，并声称柬共的胜利标志着柬埔寨历史达到巅峰，对柬埔寨未来的建设持乐观态度。在讲话中，他还含糊地警告越南。

1978年5月，越南人民军全面入侵柬埔寨，推翻了民主柬埔寨政权。众多的万人坑被发现并公诸于众。

解散

1981年12月8日，柬共宣布解散，其领导人改建民主柬埔寨党。民主柬埔寨党声称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放弃共产主义。

后续

1994年，民主柬埔寨党被柬埔寨政府宣布为非法政党。红色高棉遂占据拜林省，成立柬埔寨民族联盟和救国临时政府，与柬埔寨王国政府对抗。1998年，随着红色高棉领导人塔莫克被政府军抓获，民柬势力彻底覆灭。

另外，现在的柬埔寨人民党原名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是1979年由民柬脱逃的军政官员、柬共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原印度支那共产党老战士等多派人士共同组建的。该党视高棉人民革命党为自己的前身，以1951年6月28日（高棉人民革命党成立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但不承认1963年至1981年期间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视其为“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篡党夺权”。该党承认柬共执政期间发生过红色高棉大屠杀，对柬埔寨人民造成重大苦难。1991年，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放弃共产主义并更名为柬埔寨人民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5%8A%B3%E5%8A%A8%E5%85%9A

朝鲜劳动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在其国内常被简称为劳动党或党。现任最高领导人是任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金正恩，金正恩、崔龙海、李炳哲、金德训、赵勇元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历史

早期的朝鲜共产主义政党

1925年4月17日，朝鲜共产党成立，并确立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人为金永奉和朴宪永。由于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原则，流亡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未能再组建新的共产党。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还短暂存在过高丽共产党、韩国工农总同盟、大韩青年总同盟、大韩社会党、火曜会、汉城青年会等共产主义组织。

1928年，因朝鲜共产党内部宗派斗争，共产国际下令解散朝鲜共产党。此后，虽然朝鲜共产党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但该党仍以各种党小组的形式继续存在。

1945年9月，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汉城重建，朴宪永被推选为党中央责任书记。1945年10月10日，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在平壤成立，金镕范任责任书记，但实权被金日成掌握。北朝鲜分局名义上是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下属，实际上由于美苏分别占领南北朝鲜而独立运作。1946年3月，原在中国延安、太行山地区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改组为朝鲜新民党，领导人为金科奉。7月，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更名为北朝鲜共产党，成为完全

独立的政党。8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6年11月，半岛南部的朝鲜共产党、朝鲜人民党（1946年11月成立）和南朝鲜新民党（1946年7月成立）也合并为南朝鲜劳动党。

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政权。1948年3月28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金日成提出的争取祖国自主统一的斗争方针。由于韩国的李承晚政府镇压，南朝鲜劳动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转移到朝鲜半岛北部。1949年6月30日，北朝鲜劳动党和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统一的朝鲜劳动党，并选举金日成为委员长。建党纪念日定为10月10日。

建党初期党内的不同派别

由于朝鲜劳动党是由许多不同背景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组建而成，因此在其建党之初存在许多派别。

国内派：这一派以日本占领时期在朝鲜半岛国内秘密坚持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其代表人物还包括；李承烨、玄俊赫、吴琪燮、朱宁河、郑达铉、金镕范等。

苏联派：这一派以在苏联出生和取得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许嘉谊，其代表人物还有朴昌玉、朴永彬、朴义琓、南日、金烈、方学世等。

延安派：这一派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1945年至1950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金枓奉，其代表人物还包括：武亭、崔昌益、朴一禹、朴孝三、韩斌、徐辉、尹公钦、金昌满、李相朝等，他们中许多人与毛泽东、林彪等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关系密

切。

游击队派：以在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中级军官金日成为核心，其代表人物还包括：崔庸健、金策、安吉、金一、徐哲、朴成哲、吴振宇等，他们当时是苏军第88旅（即抗联教导旅）的军官。虽然势力最为弱小，但因与苏联人熟悉、首先得到苏联占领军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优势。

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1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金日成在党内建立绝对权威的过程

金日成从苏联回国后，首先清除了原朝鲜共产党的代表人物玄俊赫。在朝鲜战争中，他先以修复水库不力为由将内阁副首相许嘉谊降职，随后又指责其在吸收党员的问题上搞“关门主义”，阻挠党的扩大，于1951年11月撤消其一切职务。金日成随后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政治教育活动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1953年初，开始散布“南劳派（即国内

派）即将发动政变”的谣言，金日成随即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1953年停战之后，李承烨和另外11人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提交公审，其中包括李承烨在内的10人（驻中国大使权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锺镐、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在停战一周后的7月30日被处决。金日成随后将矛头转向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残余力量，试图将苏联派也牵入这一案件中来，许嘉谊闻讯后自杀。朴宪永于1955年12月被处决。朝鲜劳动党的国内派势力经过这次打击已经全部覆灭。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他不在国内的期间，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枓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这是朝鲜劳动党权力斗争史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推翻金日成的尝试。金日成得到这一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扑。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公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徐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枓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1956年9月，劳动党内仅存的一小部分未被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分子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这一抗议毫无效果。延安派于1958年被清洗完毕，苏联派于1961年被清洗完毕，这两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绝对个人

权威，开始独裁统治。

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在清洗其它派别之后，自身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朴金喆为代表的抗日时期由抗联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派遣回国，在朝鲜北方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派”。另一派是以金昌凤大将为代表的一直追随金日成在东北和苏联从事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来被称为“军内反对派”。金日成重军事、轻经济的政策转换引起甲山派与军内反对派的对立，军内反对派主张继续强化国防，而甲山派主张发展经济优先。

1966年10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届十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委员长、副委员长制为总书记、书记制；组建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机构--党中央书记局。选举金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组织体制更改后，甲山派在党中央政委会常委会中占有两个席位，在中央书记局中占有四个席位，成为党内的实权派。与此同时，军内反对派在党内的地位也得到提高。金光侠成为党中央政委会常委，金昌凤、崔贤、李永镐等升为党中央政委会委员，许凤学、崔光、吴振宇等为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军内反对派还在中央书记局占有两个席位。

甲山派与金日成的对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经济政策优先的主张，反对金日成的国防和经济并重的政策；反对不切实际地歪曲党史、军史，夸大金日成个人作用，在全国到处大建纪念碑、史迹地；反对内定金正日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认为搞世袭继承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大忌讳。但是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使金日成认为，要保留自己政治遗产的唯一方式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因此金日成下定决心肃清甲山派。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四届十五中全会。以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树立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1968年，朝鲜针对韩国策划的“青瓦台事件”失败后，金日成以“左倾盲动主义”、“军阀主义”和不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为由，追究军方领导对这些失败所负的责任。批判与处理了军内反对派。

1960年代－1970年代，金日成通过清除甲山派的朴金喆、李孝淳，清除军内反对派的金昌凤、许凤学，以及后来通过落选、放逐等方式让金昌满、朴正爱、金光侠、金东奎等人从政坛上消失，终于达到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树立为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也为1974年确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扫除了政治障碍。

确立主体思想指导地位

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的演讲《关于在思想领域中消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建立主体性》，首次谈及“主体”这一概念。演讲指出不能照搬苏联的思想和习惯，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推动朝鲜的革命。此举被认为是为了防止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风潮蔓延至国内。

为在朝鲜推动革命，不仅需要熟稔我等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也需要精通朝鲜的历史与地理。只有采用适合他们的方法、同时唤起他们对故乡和祖国的热爱之情，才能教育我们的人民。

— 金日成，《关于在思想领域中消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建立主体性》

苏联反个人崇拜的风潮仍然传至朝鲜，并引发了一场未遂政变。政变失败后苏联派和延安派几乎被尽数肃清、苏联和中国对朝鲜的控制被削弱，金日成得以自行解释马列主义。有观点认为，50年代末当金日成考虑构建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见解时，黄长烨发现1955年演讲中的“主体”概念可以被看作是马列主义的延伸，并开始将这一概念体系化。不久后中苏交恶，冲突的双方都意欲拉拢朝鲜，故未对朝鲜进行介入。把解放朝鲜半岛作为国策的金日成不满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也企图在中苏政争中保持中立、不偏向中苏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故“主体”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

1963年，金日成对朝鲜人民军进行了有关“主体”原则的演讲。1965年4月14日，“主体思想”这一词汇首次于金日成在印尼的演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南朝鲜革命》中登场，演讲中提出一国独立的前提是“思想主体性”“政治自主”“经济自立”“国防自卫”、这一立场就是“主体思想”。

1966年10月的朝鲜劳动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再次确定了主体思想的内容，“对帝国主义的彻底斗争”“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政权”“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互惠平等”。

1967年5月肃清甲山派后，同年6月28日至7月3日，在第四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大会上，制定了“唯一思想体系”。该理念强调以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作为治国方针。

从1967年开始，朝鲜政权全面禁售、封存、回收马列书籍，禁止一般民众阅览，只有极少数获得批准的研究人员才能阅读马列著作。

在1970年的朝鲜劳动党第五次大会上，主体思想被提高到和马列主义同等的地位。

至1972年，主体思想被称作是“当代的马列主义”和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金日成被尊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1974年，金正日将金日成创立的思想体系正式确定为“金日成主义”，使之成为朝鲜劳动党指导思想，同时提出全社会的金日成主义化纲领。金正日强调主体思想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还说“主体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

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主体思想“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1976年10月，金正日在同朝鲜劳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谈话中说，“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组成来看，金日成主义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形成金日成主义的精髓的主体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新发现的思想。”“主体思想的哲学原理，是不能在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内解释的。”“其社会历史原理不能按唯物史观来解释”。“金日成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区别的独创的革命思想。”

1980年，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大会决定取消党章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把主体思想作为唯一指导方针，同时选举金日成、金一、吴振宇、金正日、李钟玉五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

朝鲜劳动党集会

1992年4月9日，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决定对宪法进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被主体思想取代。

2009年4月9日，第十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对宪法进行修正，追加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并明文化，将“维持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等基本路线”等共产主义相关内容删除。此举被不少外国媒体认为朝鲜已经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

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修改党章。其中，劳动党

的定义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建的主体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改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政党”，党的最终目标由 “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改为“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人民大众的绝对自主”，追加“先军政治”。党章仍保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仅有一处）字眼，但不再提及“共产主义”。

2012年4月11日，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会议发表关于修改党章的决定书。新党章规定，朝鲜劳动党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为唯一指导思想。

2016年5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大会，党章中又添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内容。

在2021年1月10日的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并在大会结尾时奏响《国际歌》。随后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金正恩、崔龙海、李炳哲、金德勋、赵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尽管官方意识形态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交接而数度更易，“社会主义”一词在朝鲜依然经常被提到。朝鲜的宪法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而在《金正日将军之歌》中，也提到了“社会主义”一词。 朝鲜劳动党声称其当前目的是“在共和国北半部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 劳动党发布的宣传图书《对于朝鲜劳动党》中称“朝鲜劳动党是深深扎根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群众中，在他们当中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献身奋斗的先进战士组成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劳

动人民群众的群众性的党”。第一书记金正恩也于2016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提到“争取主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高度弘扬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的尊严与威仪”。

今天的朝鲜劳动党对外依然保持着共产主义政党的形象，通常会派代表团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且在会议上会获得一些支持。朝鲜劳动党在2011年的提案“让我们共同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作为全世界人类的盛大政治节日”，与会的79个党派中有30个签署了该提议。朝鲜劳动党也把自己视作国际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冷战期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就奉行“输出革命”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援助左翼游击队。

然而，目前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朝鲜劳动党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其意识形态与二战时期的纳粹党非常相似。

组织结构

创党初期，朝鲜劳动党的党员人数仅为4530人，目前则约增加为400万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兼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体现了该政党对武装力量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结构体系

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央书记局

组织指导部

1. 第1课（中央）

2. 第2课（中央）

3. 第3课（地方）

4. 第4课（朝鲜人民军）

5. 第5课（护卫司令部）

6. 第6课（国家安全保卫部）

7. 第7课（人民保安部）

8. 第8课（司法部）

9. 第9课（朝鲜内阁）

10.

11. 第11课（对南朝鲜工作部署）

12.

13.第13课（生活指导课）：是组织指导部，负责党员和劳工进行每周自我批判，生活指导课是由军方干部负责，首长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14.第14课(检阅课)：是负责对高级干部的检查，肃清、监视和管理的部门。

15.第15课(通知课)：是拥有对政策承认和批准权限的部门，直属劳动党最高指导者，确立最高指导者唯一指导体制。

宣传鼓动部

党中央领导人

由2017年10月7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

委员长：金正恩（朝鲜最高领导人）

政治局常务委员：金正恩、金永南、崔龙海、朴奉珠 、黄炳誓

政务局委员长：金正恩

政务局副委员长：崔龙海、太宗秀、安正秀、李洙墉、金平海、吴秀容、金英哲、朴光浩

政治局委员：太宗秀、安正秀、李洙墉、朴道春、李勇浩、朴光浩、朴泰成、李勇浩、金元鸿、

政治局候补委员：吴克烈、朴太德、朴太德、金平海、崔辉、崔富日、金彰燮、卢斗哲、赵延俊、金与正、吴秀勇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炳誓、李永吉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玄永哲、金元鸿、崔富日、金庆玉、尹正璘、李炳哲、金永春、金英哲、徐洪灿、黄炳誓、朴奉珠、李明秀、李万建、李永吉

朝鲜劳动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李尚源（委员长）、郑明学（第一副委员长）、李得男（副委员长）、车冠席、朴德万、车顺吉、金勇善、李京哲、元亨吉、金世润、金天弼、孟泰浩、申京植、宋琴顺、崔致善、韩英镐、韩胤昌、韩泰容、朴英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第一副部长金庆玉、赵延俊

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浩，第一副部长金与正

干部部：部长金平海

国际部：部长李洙墉

军事部：部长金永春

民防卫部：部长吴日正

机械工业部：部长李万建

科学教育部：部长韩光福、崔相建

劳动团体部：部长李英洙、李日焕

39号室（负责特别外汇资金管理）：室长金东云（对外称党中央第一副部长）

计划财政部（负责国家计划财政工作）：部长吴寿勇、郭范基

党史研究所：所长卢光燮

文书整理室：室长不详

申诉室：室长不详

总务部：金永春

行政部：部长不详

轻工业部：部长白启龙、安正秀

金日成高级党校：校长明善永

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朴哲民

党报党刊

朝鲜劳动党的党中央机关报为《劳动新闻》（日报），党刊为《勤劳者》（月刊）。

==
==
==
==
==
==
==
==

===

===

===

===

===

===================

什么是民主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历史中，会清楚地看见，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不仅发源于欧洲，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

系。一般性而言，在西方各国中间，如果，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得越广泛，人民的基督教信仰越真挚而热忱，那么，在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越容易建立起来，并且，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中就发展得越快、越稳定；反之，当一个国家中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混乱喧嚣、内耗内斗；甚至，当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离弃了敬虔信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终将引向彻底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最终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所推翻、篡权。

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民主制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复杂过程。在这样的复杂过程中，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主要国家中，必然会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观点角度、不同的意识理念等等。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甚至激烈的力量角力过程中，怎样能够达到和平安祥的、团结一心的、众志成城、稳定牢固的政治结果呢？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民主制度若要成功【而不是逐渐滑向无政府主义以及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和面对以下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在民主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成分、很多政治力量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政策方向是被很多人所彻底反对的。【——尽管，当然，政策方向之所以被决定下来，是因为社会中超过半数的政治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在某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但是，由于社

会政策决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因此，这些在每一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加在一起，人数就反而会占据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例如，有的人反对某些医疗方面的政策决策，而另外有些人则反对某些教育方面的政策决策；虽然那些人在每一项具体政策决策上都少于半数，但他们在不同政策决策相关方面上相应的人数加在一起，却超过了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怎样避免扯皮、庸碌无为、无法决策？怎样避免决策结果导致国家动荡、不稳定、怨声载道？

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那么，当面对某个不符合“我”利益、违背“我”意识形态的、然而却是民主程序下所制定的决策结果的时候【例如，民主决策的某个政策结果是：——减少某个地区的、面向某类职业的教育经费，增加某种医疗的收费，针对某种行业加税，增加某些方面的军费，甚至是堕胎，毒品合法化等等】，——在“我”的内心中，怎样还能有和平安宁的心情呢？“我”怎样还能够平静地、和平地遵守那些既定的民主秩序和政策法律结果【即，和平地等到下一次投票的时候再去表达意见；甚至，——“我”心里明知道自己是少数派，无论再投多少次票也没用，根本不可能改变某种政策决策结果】，而不是心怀怨言、鼓噪喧嚣、甚至图谋用非法手段推翻既定政策法律结果呢？

本书必须在这里清晰地、大声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生死成败之关键所在。

如果在社会中的千千万万个“我”，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决策结果面前，都忿忿不平地面对上述困境【例如，有的人是在医疗决策结果上，非常不满；有的人是在教育政策决策结果上，充满愤怒；等等】；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就一定没有和平、平安和幸福；在这样的人民之中，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失败。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各种具体政策决策结果本身，就公义、平等、公正而言，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人们心中的各种怨言、不满、甚至愤怒本身，并不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不对、不合理的。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甚至看似很严重的政策不合理之处，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看似合理的不满之处，但是，——民主制度本身怎样才能够，保持稳定、和平、长治久安，而不是被动辄轻易推翻、政权总是处于动荡更替的无序混乱之中？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有限性，如果我们不知道应当

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应当怎样面对上述困境，那么，——我们国家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不会成功，就必然会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并必然最终被专制主义所取代；我们就必然无法挣脱专制主义的欺骗、愚民、诡计、邪恶、与枷锁。

____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在各样的复杂政治角力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间，如果没有一种深挚真诚的、敬虔热忱的、谦卑虚己的、以对于造物主上帝之敬拜为中心的信仰，——来调和、引领、协调民主决策过程，并在民主过程中起到根基性的作用，——那么，从几个世纪以上的长远眼光来看，所谓民主制度就一定会面临失败，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并被专制主义取代。

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人们以那属天的国度为心灵的归依，以造物主上帝自己为心灵归依的时候，那么，——就会在生命品格中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样的人会积极热心地投身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投票、决策过程之中，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当民主决策的结果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和观念的时候，这样的人并不会要死要活，以为自己是绝望

的；——因为，他内心的倚靠，从终极的、根本的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上，在那上帝永恒的国度里。

最重要的是，在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中，人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更不会颐指气使地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要“替天行道”、唯我独尊等等；而是，在内心深处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心灵深处一定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的心灵之锚，他的一切盼望与期待，究其根本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那永恒的天上国度里。正是因此，他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既勤勉地生活、一丝不苟地努力去做好一切所当行之事，以热忱的心灵和情感，去面对一切世事和世人；但同时，他并不以这个世界为依归，而是把心灵的眼目单单地瞩目于那天上的国度，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所在。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中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无数英国清教徒们、和过去漫长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无数敬虔基督徒们的深挚信仰和坚定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用一句简单的英文总结就是：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意思就是，勤勉热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以这个世界为归依。

正是这样的以圣经为核心、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导致了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诞生。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能够使得民主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地、平安地、和平地持续下去，并使得其中的人民看见世事真理、享有幸福。

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使得无数人们以敬虔的心去顺服“在上掌权者”、顺服于世上的法律体系、政权秩序、决策过程；使得人民群众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无论决策结果是否如己所愿，都能够和平地彼此相处。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督徒们在关于各项公共政策事务的协商与决议过程中，会主动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努力地献计献策；但是，若自己的一些主张和意见建议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采纳，那么，基督徒们的心里仍然是有平安的，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的盼望与归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顺服在上掌权者】】】

《顺服掌权者》：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

【第一部分】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正义是什么？正义的源头在哪里呢？正义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吗？我们又应当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正义呢？在这个世上能够得到完全的、真正

的正义吗？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这世上有多少罪恶，是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之下发生的。有多少人，看见不平，拍案而起；但是，他们却不过是在用一种罪恶来代替另一种不义。

许多人，想要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的心中，却不过是在自以为义。

许多人，口中喊着替天行道（这话本身就是对神的亵渎），心里面热乎乎地热血沸腾；但是，他们心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他们内心的罪恶和污秽，遮盖在光辉理想的旗帜之下。

（3）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

在人们口中，无论是哪种所谓的正义，无论是哪种情境；如果，在人的心中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圣洁、公义、主权、主宰、创造、救恩、恩慈的敬畏，没有人内心中发自心底的真正谦卑，没有摒弃自己心中的固执、愚顽、刚硬，那么，在人们中间的任何所谓“正义”都是枉然。人们所谓的革命，造反，战争，斗争，等等，都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的野心、贪婪、罪恶、欺谎、虚空、狡诈、诡计、虚荣、负气、情仇、自义所充斥着、包裹着、裹胁着、淘汰之下的恶性循环。

那么，又该怎样呢？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顺服在上掌权者。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退后，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使自己的生活圣洁；以爱对待人；祈求神，不乞求人；敬畏神；对掌权者应当恭敬而惧怕，但是，不要在灵里畏惧人；倚靠神，而不要倚靠人；活出基督的圣洁生命与爱，作基督救恩的见证；以彻底地的谦卑和爱，来对待所

有的人，包括在上掌权者。

【第二部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是人应当如何在世上立足、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第三部分】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真正的正义和公义，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是在那些“在上掌权者”那里吗？也是，也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应该是在何处。我们应当以这世界为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吗？不，决不是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1: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

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作寄居、作客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坟墓更绝不是我们的归宿。以这世界为家的人，想要在这世上找到终极的公正；可是，他们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只能是品尝到真正的失望、眼泪、痛苦、无奈、疾病、衰残和死亡的滋味。在这世界中寻找正义的归宿的人，必然要空手失望而回。更何况：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更应当警醒自己，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只有当有了倚靠神的信、圣洁的生命、基督的救恩时，才能够在这世上真正地见证出神的爱、公义和圣洁。

++

++

++

++

++

++

++

++

++

在这世上的主要宗教信仰中，除了以圣经为中心、核心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之外，还有以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此外，还有具有一般泛神主义特征的印度教信仰。

那么，除了基督教信仰以外，其它的那些宗教信仰体系，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什么现代民主主义制度没有原发性地起源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中，而是在来自西方外力的影响下，才开始实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呢？【甚至，在今天的中东世界，在许多强烈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民主之路仍然非常遥远。】

在伊斯兰教信仰中，虽然也是对于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天的敬拜，但是，却有着强烈的政教合一、排他主义的色彩。在伊斯兰教中，是典型的“因行为称义”的教义，即，一个人的信仰是否敬虔，要通过外在的许许多多繁文缛节的规条，例如禁食、每日定时祈祷、不吃猪肉、等等无数的规矩，来体现。一个人是否算作是真主阿拉面前可被接纳的信徒，要看其行为是否满足那些繁文缛节的规条，甚至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圣战士，等等。伊斯兰教的重要主旨，是在地上按照可兰经的律法规条建立起伊斯兰国。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是在于，人必须在行为上遵从和顺服阿拉、以及其最

大先知穆罕默德的话语。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会两个严重的致命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内心和良知中真正是诚实的，就一定无法否认自己心中的罪性，无法否认自己所曾经说过的谎话、自己心中曾经的不义的愤怒以及嫉妒、自己对于他人所属之物的贪恋、自己所曾经做过的错事，等等。任何一个百分之一百诚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无法“因行为称义”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一定会导致人在内心中自高、自傲、自义，并会论断他人、俾倪他人，从而导致和加剧——而不是消饵——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上述“因行为称义”的特征，在其他宗教信仰体系中，例如佛教和印度教中，也很普遍，但在伊斯兰教中尤其明显。事实上，伊斯兰教所导致的文化土壤，从其当年所开始建立时的火与剑的时期，一直到今天，都始终常常贯穿着戾气、冲突、矛盾；以伊斯兰教为主的社会中，往往是专制主义、或是万马齐喑、而没有生机勃勃、热忱、勤勉而自由的状态。

佛教信仰的教义，与印度教特征一样，都是属于泛神主义宗教信仰体系。在这样的宗教体系中，并没有【——甚至直接否认——】：在这个世界之上的那样一位无限全能、全知、至善至美、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造物主、上天、上帝、永生真神。因此，佛教信仰与印度教信仰都具有泛神主义的一般特征，即，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它们的眼中，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虚无、虚空、虚浮、虚幻的，人生的本质是苦的；通向幸福的道路，就是出世，就是看穿世事与人生的虚无，放下执着，以“舍得”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一切。换言之，它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浩大、瑰

丽、奇妙、精确、秩序、等等，是出于上帝的无限智慧、设计、和伟大创造；它们更看不到在人的生命与心灵中，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在它们看来，世界就如同荒芜、默然、没有生气的沙漠、旷野、荒地；人生就如同荒诞而荒谬的一场戏。在它们的体系中，看不到道德法则的绝对意义、隽永价值与永恒根基，看不到生命的本质含义与指向永远的真正价值在于什么。它们更看不到"罪"的本质根源所在，以及怎样除去罪的根本途径【罪，不仅在于外在的言语行为，更在于人内心的自傲自义，在于人对于造物主、上天的背离，在于对良知中道德法则的悖逆】。它们所看见的世事人生，是空的、苦的，但它们看不见罪的本质。它们的敬拜体系中充满了人手所造的金、银、石、木的偶像。它们的教义中有许多关于超自然世界的烦冗的、人为臆想的"知识"，充满了人对于自己悟道与修行过程的倚靠和自傲之心，但却看不见"义"的本质和源泉所在。

在一个佛教或印度教所影响下而产生的文化土壤中，人们往往在心中、在关乎世事上没有执着、认真、奋进、殚精竭虑的态度，而是凡事看空、放下、舍得、反对执著。在这样的土壤中，人们并没有对于道德之罪的同仇敌忾的心理，并没有对于世事人生的热忱、对于公义的执著向往和锲而不舍的追求。当在西方外力作用影响下【甚至是在西方外力的胁迫下（如日本等地），或是保护下（如台湾、韩国、泰国等地）与促进下（如缅甸等地）】，它们的文化土壤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实行民主制度，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它们一定很难于发挥持之以恒的奋进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执著态度。

在中国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贯穿着下级服从上级等等三纲五常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拥有极高的人身权威。儒家思想中强调，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以此世为中心的国家社会秩序伦常观念。然而，这种文化土壤所导致的是，人们在人身依附上、社会权势与权力分配上，在生命与人格上，都围绕着权力分配、追逐权力、争夺权力、依附权力等等生活方式为中心。在这种思想伦理体系中，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究其本质而言，人与人不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分成两类，所谓君子和小人。甚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思想的这种文化土壤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的今天，在中国却仍然没有开始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甚至，今天的中国距离一个稳定、成熟、现代、先进、发达的民主制度，还非常非常遥远。即使有一天，中国开始在表面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很有可能会如同70年前一样，是虚假的挂羊头卖狗肉，或是如同100年前一样，是动荡混乱、喧嚣躁乱、纷争不断的局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说到民主制度，人们往往会想起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度之一、但却是现代社会中最早的民主制国家。实际上，今天的现代世界中之所以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民主政治制度，与美国和英国等国在过去一百年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榜样和影响力，有着很大程度的关系。

说到美国，人们往往会想到基督教信仰，因为，在美国的早年那批开拓者、建国者中间，很多都是清教徒、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们。可以说，今日的美国，正是被当年那样一大批追求信仰纯洁、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们、虔诚基督徒们所建立起来的。直至今天，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在美国政府各级官员就职、法官就职等等仪式上，他们都是以手按圣经宣誓而就职。

显然，任何对于历史稍微留心的人都无可否认，现代民主制度正是从基督教信仰国家发源而来的；现代民主制度不仅诞生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中，而且，现代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蔓延、传播和发展，也与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有着直接而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多数的中国人其实对于美国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立国，存在着很多的

误解。这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并不明白：——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到底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什么是真正的政教分离的本质含义；以及，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中才会有"政教分离"这样的提法。【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政教分离"的这个提法，仅仅是出于五百年前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后；尤其地，这是出现于英国清教徒运动以后】。

由于上述误解、不解，人们常常会对于基督教信仰与民主的关系有两种不正确的心态反应。

一种是，一味地排斥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甚至反对基督教信仰。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们认为：————民主制度与基督教信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或是必不可少的关系；民主制度可以、也应当完全摆脱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应当"敬鬼神而远之"，与基督教信仰体系保持越远越好的距离。他们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最好应当是彻底的世俗化主义，而不要与宗教信仰发生任何瓜葛。

另一种是，认为应当"以基督教立国"，即，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成所谓的"国教"，并在此基础上来推行民主制度。

显然，上述两种态度与立场都是偏颇的、不正确的、不恰当的。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内涵、外延等等，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深入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仅简单地做一些一般性的陈述；简言之就是：——（1）基督教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是建基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信仰，而不是建基于逼迫、强迫、勉强人意的基础之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恩典与救赎，是要人甘心乐意地、由衷地、而不是被迫地、相信与接受。（2）正是因此，所谓政教分离，只有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才是有其真实意义的。在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中，政教合一是本质性的内在教义关系。在许多佛教小国中，也存在着强烈的政教合一的色彩。而流行于中国的大乘佛教，则强调悟道、出世、消极、四大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等，不仅与政治毫无瓜葛，而且甚至反对一切执著的人生态度；因此，其本身并不存在政教分离的问题。（3）基督的国度不是属乎地上，而是属乎天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们应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不问世事等等。相反，基督徒们应当以热忱敬虔的心，在这个世界上、在世人面前，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出上帝的恩典与慈爱。简单而言就是，“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

关于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深刻、极其重要、具有核心性意义的问题。对此，我们在本书后面专门章节中深入思考。

============================

怎样建立民主

如上所述，民主制度不仅是一个极其深刻、意义重大、涵义复杂的社会政治治理体系，而且，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困难、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甚至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达成的事情。尽管如此，民主制度是一件非常值得花费巨大的代价和心志去努力达成的事情；因为，正确的民主制度、正确的民主道路，将会随之带来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治理体系，将会给一个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幸福与繁荣。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建立起民主制度，怎样实行民主制度呢？我们应当怎样设计出一条从实际出发、从大局着眼、紧贴道德与信仰原则、紧贴现实政治情况的、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路线图呢？我们又应当怎样借鉴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实践经验，并结合普通中国人思想文化观念实际情况，来提出一条实现民主、符合民主道路原则的路线原则地图呢？

这也将是本书后文中所思索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些鸟瞰性质的、简略的思考要点。

=============

第一，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而现实地认识到，民主革命的正确目标，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正如，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包含着许多极其艰巨的任务，都需要极其巨大的代价、极其辛勤的努力、甚至舍生忘死、甘洒热血的精神；同样，民主革命的事业更是如此。我们必须完整、深刻、全面地认识到，民主事业的极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才有可能取得民主事业的成功。

民主制度，要远远地比“人民当家作主”、“一人一票”等等简单口号更加深刻、更加复杂。那些简单的口号，在很多时候不仅无益于民主制度的真实实现，反而会因其过度简化真实世界的问题，而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并进而使得许多人以此为借口、推翻民主、实行专制、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等等。

那么，民主制度的目标内涵，具体章程、法则、规律、条例、组织、架构等等，在一般原则的层面上而言，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要包含那些内容呢？对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仔细的筹划。

====================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民主制度与道德和信仰之间的深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种法律、规章层面上的关系，而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上、政治层面上，民主制度与宗教信仰之间，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原则？很多人挂在口头上的、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与道德信仰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石的“表里”原则，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换言之，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是，民主制度需要建基于世人心中的道德的信仰；然而，民主制度则是关乎法治、自由等；那么，在国家政治层

面，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推动、鼓励、支持道德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并反过来，民主制度从道德信仰的发展中深受益处呢？政治与信仰之间，怎样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呢？是通过法律、政策等强行的手段吗？还是通过鼓励、允许、支持等柔性的手段呢？为什么？这些原则又怎样在具体行动和事务中体现出来呢？

更深一步说，虽然，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民主制度是诞生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但是，一般性而言，在世上一个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中，应当怎样面对、处理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务呢？其中的原则、原因、机理是在于什么？

在本书后文，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深思，为什么说，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对于民主制度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推动性的意义。

======================

第三，实现民主制度的渐进性。

我们不要设想、或是期待，民主制度是一件一夜之间就能够一蹴而就地建立起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思考建立民主制度的路线图原则的时候，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渐进性”原则的重大意义。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更何况，建立民主制度这样的伟大事业，更是何其艰难、又更将何其收获巨大、深刻改变无数人的生活、生命与心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殚精竭虑地来面对这件事情。

在考虑具体的渐进措施与路线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清醒地、智慧地取得共识，使大家都明白，渐进性的原则在关于建立民主制度过程中的一般性意义上，是多么重要。

一方面，建立民主制度过程的渐进原则，绝非是原地踏步、口是心非、甚至推搪阻塞、挂羊头卖狗肉。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诚实客观、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认识到，渐进性原则与过程，是一定不可或缺的，否则，急功近利就一定会给建立民主的过程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使历史开倒车，导致民主的梦想变得更加遥远。

为了凝聚共识、保持耐力、长久稳定地前进，必须应当有一个公开的、实际的、深思熟虑的渐进原则路线图，以及具体的、可操作的、诚实的方法步骤。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书后文中深入思索。而且，我们也将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思考渐进性原则。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哪里、怎样去寻求那终极的真理与正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又应当怎样以敬虔的信仰原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为民主自由正义事业添砖加瓦？自由的本质是什么？正义的本质是什么？渐进性原则的本质与信仰根基是什么？民主是革命，而不是改良，但却是渐进性的革命；——为什么？我们又应当怎样去渐进而行？

==========================

第四，政治治理的可操作性。

如前文所述，所谓民主，是自由、圣洁之民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

式。

我们如果深思这件事情，就立刻会意识到以下问题。

A。我们怎么判定人民是否真正是自由的、有着起码的道德品德？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起码的道德品德？谁来判定？谁来制定标准？难道，就像那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制政权国家中，给人民中每一个成员所制定的道德档案吗？显然，这不仅是荒谬的、行不通的（在实际操作中，一定会被人为操弄、并成为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滋生之地），而且是罪恶的、残酷的、不公的。（为什么是荒谬、行不通、甚至是罪恶、残酷、不公的？）

但是，难道在民主社会中，就对关乎人的道德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吗？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或是任何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中），人们并不应当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任意而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深刻而本质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人的思想与心灵中，所追求的、所渴望的是什么？在人的生命本质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罪性吗？什么是罪？罪的表现是什么？什么是自义？我们又应当怎样面对罪？怎样处理罪性？怎样除去罪污？怎样防止人心灵中的罪性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表现，以及给社会与他人所带来的伤害？

同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关乎道德领域的事务上，法律规章制度是重要的，但却是不足的。原因很简单，在法律规章层面，世人无法真正地去、也不应当去制定那些“诛心”的法律。“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那么，究竟什么是凯撒的？什么是上帝的？

什么是自由？

B。怎样实行选举制、代议制？怎样了解民意？怎样取得共识？

所谓人民自我治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要解决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统治者怎样产生？统治者的权力包括哪些？统治者的权力怎样分配？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应当基于什么原则？为什么？

究其本质而言，到底什么是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与专制主义的治理有什

么实质性上的异同？怎样避免和防止多数暴政？多数暴政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多数暴政？

怎样了解民意？什么是民意？民意一定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吗？怎样确保民意是公平、公正的？当民意不公正、不公平、不正义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

民意的特征、优点、缺点、规律、本质、等等，是什么？所谓民意，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集合反映。然而，如果说，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是背离上帝、背离道德法则、充满罪性和罪行的，那么，我们又怎能相信民意、依靠民意呢？

什么是人民？人民是伟大的吗？什么是人性？人性是光辉的吗？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等政治伦理哲学观念中的优点、缺点、盲点、正确之处、缺失之处、值得肯定之处、以及谬误之处、等等是什么？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在一个充斥着各行各业、喧嚣嘈杂、利益纷争的

社会中，在处于各种不同社会条件环境、不同人生光景之中的大千世界中的世人中间，在一个庞大的、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我们可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共识吗？我们怎样取得共识？我们怎样在长期的年月中，在漫长而繁杂的事务之中，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在人民之中不断地取得共识、不断地前进和进步、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众志成城？

C。怎样实现公平与制衡的原则？何谓平衡的原则？以参议院与众议院为例（或，上议院与国民代表大会）。

所谓立法、司法、执法等权力的三权分立政治结构，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具有极其重大而深刻意义的认知：即，在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并非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在人的心灵与灵魂深处，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遍及的、本质性的、根深蒂固的罪性。

这个浩大的宇宙世界，是来自于那无限全能、智慧、圣洁、公义的造物主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世人的生命，也更是来自于他、那伟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永生之神。我们都是被他所造的，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万物之中是独特的、高贵的、珍贵的，因为在人的里面，有着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有生命、道德、爱的能力。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唯有是在上帝、上天那里，才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实

现。在人的里面，有着一颗指向永远的灵魂。

然而，世人的生命却在本质中背离了他。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属世之利、以被造之物为自己心灵的归依，却不寻求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但是，人却背离那上帝所放置在世人良知之中的道德法则，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人，没有一个未曾说过谎言，未曾做过违背良知的事情，未曾在内心中有不当的愤怒，未曾在内心中没有犯过奸淫。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人做事可以不用受到惩罚，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任何后果，那么，我们就会深为震惊地看见，在世人心中，隐藏着多么普遍的、多么丑恶的罪恶与污秽。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建基于“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不切实际的、甚至自高自大的主观幻想之中，而是建基于这样的谦卑认知：——人类自身是充满罪性与缺陷的。

上述原因，是民主制度中权力分立、平衡、制衡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仅仅在概念上讨论权力分立与制衡是容易的，但在实际实行中却是困难、甚至危险的。这是因为，正如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一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在权力分开、制衡的民主架构中，最常见的弊病，就是那些政客们彼此的吵闹与互相掣肘，而缺乏团结、妥协、宽容、同心同德的精神。关于民主制度中的重要妥协特征，以及其相应的重要文化土壤条件，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讨论。

在具体操作与体制设计中，民主制度里面的权力制衡以及权力集中、责权利对应机制等等，会表现在很多方面、表现在政府的很多组成部分中。在权力制衡体系背后，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怎样既能够达成尽量多的公平、稳定、制约、平衡，又同时尽量地避免政府机构之间的内耗、敌意、互斗。为了使民主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就必须尽量同时兼顾两个相互矛盾的方向，即，稳定与效率；平衡与专注；公正筹划、集思广议，与果断执行力；等等。

比如，在这其中，立法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成员任职期较长（即，每名成员的重新竞选时间的间隔较长）的上议院或参议院，与成员任职期较短（即，每名成员的重新竞选时间较频繁）的众议院之间的平衡与协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这种两院制度，能够避免国家权力过度地倾斜于某些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区，从而使得国家能够尽量均衡而公正的发展，并使得国家发展在整体的层面上更加健康有序。这是因为，参议院的成员选举产生，倾向于以地理省份为单位，而众议院的成员选举产生，则倾向于以人口分布为单位。这样，在权力分配、社会资

源分配等等方面，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就不会被人口稠密的地区所挤压。

这种参众两院制度的设计，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深层的隐含原因，即，始终保持这样一种谦卑的认知，即，在世人心灵的深处，遍及着自私之罪，因此，人的决策应当通过适当的制衡来加以协调，避免权力与资源的不公正分布。（否则，逐渐地，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就会以人多势众的优势，而欺负小地方、地广人稀地区之人的发展；久而久之，人口就会越来越向大都市集中，最后使得全国人人都辛苦不堪）。

关于这些权力均衡的具体事项，我们也会在后文深入探讨。

D。民主与自由。

民主与自由两者虽然本质内涵截然不同，但是却彼此互为补充，缺一不可。若没有民主，自由也必终将失去。我们在世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看到这样的事例。另一方面，没有自由的民主则往往是虚假的、形式主

义的民主，或是很容易演变成乌烟瘴气的多数暴政。

那么，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里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以及相应的一般性原则，来尽力保障自由呢？从政治意义而言，自由的内涵、外延、范畴等等，又是什么呢？

自由的本质是在于，人的思想、心灵、灵魂、信仰等等的珍贵价值。正是因为人是有着这些宝贵的属性和能力，所以，人才有言论、集会、结社、就业、迁徙等等的自由。然而，自由本身并非是没有方向的，也并非是没有限度的。自由的限度，就是在于，不能对他人造成切实的伤害；而且，自由的限度也包括，不应当超越道德的底线。关于道德底线的定义，不应当被扩大化，而是要以人良知中的是非之心、以那来自于上帝放置在普世之人心中的道德法则为准。

E。法治、平等、公义，与民主。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为什么要实现民主”这个问题，那么，最好的回答就

是来自于圣经中的这样一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上面圣经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圣洁属神的社会中的重要原则是在于，应当有公正、正义、平等，并应当有恩典、慈爱、怜悯、良善；在人的心里应当充满谦卑，在爱中要常以为亏欠，而不是自高、自大、自傲、自以为义；最后，最重要的是，在人的心中，应当有敬虔的信仰；世人应当有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那伟大的上帝、上天有真诚的敬拜、倚靠之心。

从上可见，真诚的、对于造物主的信仰，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民主制度的诞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也是使得一个美好的民主制度能够得到成功发展的文化土壤背后的重要动机和动力。

如果离开了对于造物主、上天的敬虔信仰，那么，平等、公义、公正等等概念，就失去了根基和基础。如果离开了那敬虔的信仰，那么，所谓民主制度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久而久之，就必将陷入乌烟瘴气的喧嚣吵闹之中，并最后一定会被专制者、阴谋家所推翻。

==================

第五，组织架构的可经营性。

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效公正的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怎样满足政治治理的可操作性的要求，而且还在于，怎样建立起一个稳定可长久持续的、可经营的组织架构体系。

这样的组织架构体系，不仅仅在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机制以制衡、保持公正、防止世人心中之罪所带来的伤害与混乱，而且，更加要针对从各级地方政府到联邦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的多样化特点、特征、需求和适应性。

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即，"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要考虑到地方的省、市、县、乡、镇、村等不同的自我管理特点。

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在于，后者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金字塔权力架构中，所有人都是向上级负责，直到金字塔的顶端。而在民主制度权力架构中，内部权力之间的关系则要远远地复杂得多、微妙得多。

A。首先，一般性而言，所有的各级政府首长都是由本地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被上级政府任命。因而，每一级政府成员都是向下负责，而不是向上负责。换言之，村长不是镇长的下级，镇长不是县长的下级，县长不是市长的下级，市长不是省长的下级，省长不是国家主席的下级。因为每一级官员首长都是被辖地的人民所选举产生的。

那么，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又怎么能保持整个国家，或是每一个省市县等等，仍然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生机勃勃的机体呢？在各村、各镇、各县、各市、各省之间，怎么能保持协调关系，而不是互相争竞、好勇斗狠、一盘散沙呢？

换言之，究其本质而言，所谓“人民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怎

样保持人民之间和谐融洽、彼此互助合作的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地看见了世人心中之信仰与谦卑的重要性。

B。在民主制度内部的复杂组织架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尽量清晰地定义各个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以及重合部分关系等等。例如，整个联邦国家体系内的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以及各省市县不同层级内，各级地方的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等等，应当如何进行不同的区隔与联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各省市县等范围内，应当分别有不同的章程、宪章等，以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级政府组织结构与运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这些不同层级的宪法、章程、宪章、政府组织架构运作指导原则等等，以及，其本身如何产生、如何修订、如何制定产生与修订的程序等等，都是关乎整个民主制度成败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好，那么，就会建立起一个公正稳定高效的、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反之，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那么，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失败，就会落入一盘散沙、纷争不断、互相扯皮的状态，并会不断地被野心家、革命家、暴民运动所搅扰、推翻、打断。

再一次地，在建立民主制度革命的这整个过程中，必须要非常谨慎地采取渐进性原则，并有清晰的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清晰的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包括，民主制度建立的程序、步骤、时间表，以及，在每一个程序、步骤、时间表中，相应的选举机制、成立机制、权力组织架构定义等等。

对于一个从未有过真正民主制度的文明体系、国家社会来说，这样的关于建立民主制度的清晰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等等的好处和重要性在于，它们使得整个国家社会的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渐进性建立过程有方向感、目标感，并且会不断地凝聚和增强人民内部心灵之中的共识与民主认同感。

同时，这样的时间表、路线图不应当过于漫长，而最好应当尽量在一代人之内（例如，十年至二十年内）就可以完成。否则，如果时间表过长，路线图过于遥远，那么，就可能会催生专制主义的土壤，并且会把所谓的民主梦想变成谎言、变成挂羊头卖狗肉，从而使得真正的民主制度并无法得到建立。

关于这样的民主建设路线图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会在本书后文继续讨论。

======================

第六，执行力的集中性与长期法治规划的分散性。

正如前文所述，民主制度的两个最大敌人就是专制主义与无政府散漫主义。专制主义者们偏颇地强调权力与执行力的集中性，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却故意忽视、无视、蔑视国家社会人民的平等、公正、公义。无政府主义者们偏颇地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去中心化，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故意忽视、无视、蔑视，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内部之间的协调合作、统一行动的必需性。

无论是专制主义思想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如果得不到谨慎的处理、平衡、妥善考虑、回应，那么，它们最后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彻底失败，并把整个国家社会带入灾难祸患的深渊之中。

一方面，在专制主义社会中，由于统治者不具有合法道德性、公义性，因而，统治者们往往是陷入恶性循环中，往往是以强制、挤压、逼迫的手段来统治社会，并会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人民、钳制人民。这种统治，终将给国家与社会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革命、战争、生灵涂炭、心灵荼毒、等等。

另一方面，在无政府主义者所带来的喧嚣混乱之中，国家社会失去秩序与法制，整个社会处于一盘散沙之中。在各个省市县乡镇等等之间，充满了互斗；在社会不同阶层、团体、职业、以及持有不同理念的人群之间，也充满了互斗、内耗、不和谐。这样的局面，必然导致社会中有一些人会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替天行道"、"主持正义"，最后，野心家们、无耻下作的政党集团、打家劫舍的流氓无产者们夺取权力，劣胜优汰，从而进入下一个专制主义社会的循环。

就这样，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道路就像是一个钟摆一样，不断地、持续地在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来回变换交替、不断死循环。在这样的败坏动荡、充满谎言的国家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智慧、敬虔、道德、谨慎、渐进的、现代民主主义革命过程，那么，民主制度就永远也不会实现。

从反方面来说，具体而言就是，是否能够保持政府权力执行力的集中性与长期法制规划的分散性之间的正确平衡，是决定民主制度成败的重要关键因素之一。

所谓权力执行力的集中性是指，政府行政长官（例如总统、总理、省长、市长、县长等等）以及其相应的政府内阁、组织部门、执法部门、检察机关、等等下辖部门，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权威，在治理政事的过程中，政令统一、有力、集中、有效、集结迅速；而不是拖沓敷衍、人浮于事、怨声载道、等等。

所谓长期法制规划的分散性是指，在关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长期性本质问题层面，决策机制不应当是由少数人、精英阶层、寡头政治、少数统治者集团来完成，而必须是以恰当的、分散性质的、甚至去中心化的组织决策机制来完成。这样的过程，往往是由参众两院的协调和协作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体现在联邦国家层面、以及各省市县区级的立法工作的程序设置等等。

所谓立法工作是指，由人民定期选举产生的各级参众两院的成员们，在国家层级、以及各省市县等级别，制定关于各地长远发展规划方面的民事、政事、经济、刑事、教育、医疗、移民等影响人民与社会发展状态的非短期的、非急迫的、但却是长期性的、本质性的、重大性的、深远性的问题的法律、规章、措施等等。

这样的立法性质的工作，由于是“非短期”的、“非急迫”的问题，因此，可以进行相对而言缓慢的思筹以及激烈的反复辩论过程。同时，由于所面对的问题是深远长期、影响广泛的重要本质性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涉及尽可能多的社会动员，使得尽可能多的声音、思想与建议过程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立法权与执法权应当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前者倾向于处理长期深刻本质问题，后者倾向于处理雷厉风行的问题、以及探索性、尝试性、试错性、表面性的问题。

而以各级法院所代表的司法权体系，则兼具集中性与分散性的原则。一方面，联邦各级法院、乃至各省市县的法院、以及国家最高法院，应当具有超然性、超脱性，冷静地处理各样法律争讼案件，原原本本地根据既定的立法，来裁定案件是否吻合还是违反了某项既有法律。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民事、刑事案件中，以来自于民间成员的、具有审定案件权力的陪审团，对于案件进行裁定。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前者具有权力的集中性原则，后者则具有权力的分散性原则。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于共同的目的，即，“行公义、好怜悯”。在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应当由选举产生。在联邦各级法院的法官，应当由联邦民选长官（总统、总理等）任命与民选参

议院成员认证，以及某些复合方式产生。

======================

第七，再思基督教信仰对于民主制度的巨大有益作用；以及，应当怎样发挥、促进、体现这些有益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看见，民主制度的致命弱点，与民主制度的明显优势，都与基督教信仰的文明体系与文化土壤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对应性的关系。

我们绝非是说，一个民主制度的政体必须要与基督教信仰完全结合，甚至进行所谓的“政教合一”。我们也绝非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信仰，就根本无法进行民主。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任何稍微对历史留心的人都会无可否认，现代民主制度是诞生于基督教信仰的文明体系与文化土壤中；现代世界的民主制度的大发展，也是在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大力推动下所导致的结果；包括台湾、韩国、日本、等许多国

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在西方的保护和支持下才得以建立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摆正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要深刻地反思、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教义而言，相比于世上的其他宗教信仰体系而言，为什么是正确的、是真理性的信仰？为什么耶稣基督福音是真理、是真实的？——这涉及到许多关于基督教信仰护教学方面的书籍与思考，本书就不在这里赘述。读者可以参考《基督教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的证据》等等书籍。

更进一步说，我们必须要深刻地反思、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教义为而言，相比于世上的其他宗教信仰体系或是道德伦理体系而言，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具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深刻的、甚至从长远来说不可或缺的有益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有益作用，并非是时刻不可缺少的作用。例

如，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政体虽然不是在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台湾、日本、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个别中东国家等，但是，它们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实行民主制度。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强调，那些国家往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导致的民主制度，例如整个印度曾经被英国统治了上百年；台湾是在二战以后美国的特殊保护之下；日本是在西方的军事力量胁迫之下建立的民主；等等。

换言之，对于民主制度而言，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虽然不是时刻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就长期性、主流性、原发性、等等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宗教信仰体系与道德思想伦理体系之中，基督教信仰具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保持有着极其特有的、强烈的、大有功效的有益作用。

至于，这些有益作用都有哪些，以及，这些有益作用与基督教信仰自身的内在教义有什么深刻的关系，等等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只有当我们深刻明白了这些有益作用具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有益的作用，我们才能够知道，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在现实世界中、在实践活动中，摆正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政治事务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本书后文中，会继续对上述问题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仅仅是提出一些鸟瞰式的思路。简单地说，基督教信仰的内在教义包含了以下重要内容要点。

1.所有人都是被上天、上帝所造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世人的生命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世人生命的本质与心灵和灵魂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2.什么是罪。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4.谁是那位伟大的永生真神、上天、上帝、造物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5.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6.圣经是上帝的全备、无误、权威的启示、话语和旨意。7.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8.上帝是爱；他是圣洁、公义、慈爱、恩典的；他是全知、全在、全能、全备的；他有着无限的智慧；他有着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是至善至美的。9.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世人的救赎主；他道成肉身、降身为人、来到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并第三日复活，成就了那无限美好的救恩，使一切相信和接受他恩典的、谦卑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赦免、救赎，得到那无限美好幸福的永生，进入那无限美好的天上国度。等等。

上述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有着什么内在的、深刻的关系呢？上述基督教信仰教义，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有什么巨大的有益作用呢？简单地说，这些重要的有益作用包括以下方面。

【1】基督教信仰教义使得民主制度不是建基于人类自高自大、自傲自义的乌托邦空想主义，而是建基于这样一种谦卑的认知：人内心之中有着深刻的内在缺陷、罪；人需要从罪中悔改、寻求真理、归向真神；人需要有敬虔的、超越生死的、执著的、以上天为人之心灵归依的真挚信仰。

【2】在世人良知之中，关于是非、真假、善恶、诚实、虚谎欺骗等等的道德法则与道德标准，不仅在人的心灵中应当有着重要的权威，而且必须以上帝自己为道德的终极根基。上帝是无限完美、圣洁公义的；他更是鉴察世人生命与道德的终极审判者。如本书前文所述，道德基础，正是民主制度的重要软肋所在，也正是决定民主制度成败的关键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却实际上非常复杂而深邃。（主要难点在于：——在民主制度社会中，怎么可能针对道德事务进行立法、强制、或是采取某种要求性的措施呢？如果真的那样，岂不成了专制主义社会了吗？或是变成空洞的口号了吗？道德与法律、政治之间的本质关系，究竟在于什么？）我们在本书后文会继续深入思考。

【3】基督教信仰教义指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在于爱。爱的本质是在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处之道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这样的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之中。上帝正是以这样的爱来对待我们；他以怜恤、慈爱、恩典的心对待我们，但是，他恨恶我们生命之中的罪；甚至，他愿意为我们的罪而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以把我们从罪中挽回。人与人之间彼此饶恕的根基，正是在于人首先得到了上帝的饶恕与赦免。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4】基督教信仰教义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应当努力、谦卑、勤勉、热忱、专诚地把各样事情做好，但是，人不应当以这个世界上的受造之物为自己心灵的归依，而是应当单单地倚靠那创造天地与世人生命的主。正是因此，唯有因此，人才能够在各样世事中既有执著热忱的态度（而不是像佛教徒那样出世、厌世、看破红尘、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反对生命的执著），又有谦卑的心，并能够彼此之间求同存异、谋求妥协。这种既努力坚持真理、又努力谋求妥协的精神，正是民主制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生命线所在。

【5】基督教信仰教义对于个人崇拜、对于崇拜人间领袖的偶像化思想倾向，有着内在性的反对。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是平等的，都是被造之物。我们彼此本应当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本是天父的儿女。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繸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

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马太福音20章

20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前来见耶稣。她跪在耶稣面前求他。21耶稣问她："你想要甚么？"她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22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甚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23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24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25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26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27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作你们的奴仆。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6】基督教信仰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倾向，也有着内在的反对。

罗马书13章

1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　神来的；掌权的都是　神设立的。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　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3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4因为他是　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但如果你作恶，就应当惧怕；因为他佩剑，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是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5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6因此，你们也当纳税，因为他们是　神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事的。7你们要向各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

爱是成全律法的

8不要欠人的债；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9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10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是成全律法的。

总要披戴基督

11还有，你们知道这是甚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12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13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象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7】类似于上述的各项要点，我们还能够举出很多。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要点本身，并非是彼此孤立的、或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是有着内在的机理、原因、体系；它们互相都是融会贯通的，都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本质层面上紧紧相连。这些要点，都与圣经整体所显明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息息相关。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进一步总结归纳。

========================

社会的目的、国家的目的、人生的目的

正如本书一开始所说的，所谓正确的民主制度，并非是人生、社会、人类的终极真理，而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圣洁之民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虽然我们可以说，民主可以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绝非意味着，民主就是人类社会所应有的、终极的、完美的样式。

最关键之处是在于，人类【——如果，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具有自由、圣洁的属性（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圣洁，并非是意味着完美，而是意味着真诚、诚实、而没有诡诈）】虽然可以通过民主来进行自我管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类的心灵、生命与灵魂，就不需要君王。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在心灵中有了真正的君王【对于基督教信仰而言，对于基督徒而言，这君王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之耶和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造物主、上天、上帝；（——事实上，对于普世之人也都应当是如此；然而，关于基督徒应当如何在民主政体中对待那些非基督徒人士、与他们相处，则绝不应当是歧视、蔑视、打压等等态度；对此，我们会在后文中深刻反思）】，所以，人才不应当以地上的世人为君王。反之，当人不寻求那造物主的荣耀、不愿意真心归向那上天的无上权柄，那么，人就必然会臣服在世上那些所谓伟人们的脚下，对他们顶礼膜拜，而无法真正地进行民主制度中的自我管理，从而沦落入专制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之中。（这并不是说，在人群、社会中就不可以有领袖；而关键是在于，众人怎样看待他们中间的领袖；在尊敬、崇拜、敬拜、敬畏之间，在服从、顺从、五体投地之间，有着微妙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

从终极层面而言，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是为了人而存在，还是人为了国家而存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却实际上很难回

答，因为答案绝非是非此即彼的选项。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在于什么？人为了什么而活着？人又为了什么而死亡？人生中真正的幸福、利益、福祉在于什么？

只有在这些问题上找到正确的、符合真理的、真实的答案，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社会的目的与国家的目的和价值。而那些答案，都是建基于正确的、符合真理的、真实的信仰基础之上。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符合真理的、真实的信仰呢？还是，在关乎信仰的领域中，信则有、不信则无、心诚则灵、无所谓对错、无所谓是非呢？

（以下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什么是自由

【引述 圣思录】

+++

+++

+++

+++

+++

+++

+++

+++

+++

+++

+++

+++

+++

+++

++
+++

==
===

9.《你是谁的奴仆》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6:17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第一部分】

自由与奴役的区别

自由的反义词是什么？也许不仅是约束，而更是----被奴役。奴役指的是：欺压、压榨、剥削、鞭打、践踏、捆锁、使之辛苦流汗、威逼利诱、用武力强迫苦力劳动。奴役的对象是奴隶；奴隶不得不要辛苦地、汗流浃背地劳作，却得不到、也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奴隶不能说不，更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选择的权利。奴隶每天所作的事情，就是被迫地、勉为其难地，做自己不愿意去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生活得极其痛苦。每一个奴隶所朝思暮想、极其渴望的，就是能够挣脱捆锁，得到释放，能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奴隶的主人是奴隶主。奴隶主剥夺、榨取、巧取豪夺奴隶的劳动果实。

奴隶主是罪恶的，是无能的（除了压榨人之外），是贪婪的；因为他总是想要得到更多，总是看自己手中缺乏，总是有着填不满的贪欲，总是罪上加罪。撒旦正是如此。罪恶的奴隶主，其本质是负面的、缺乏的、亏缺的、毁灭的、朽坏的、死亡的，面临公义之神永远的审判惩罚。

【第二部分】

罪恶之中的奴仆，罪恶之下的奴役

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我们被缠绕在罪的网罗之中。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仿佛被一张无形的大网捆锁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想要挣脱那与生俱来的枷锁，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

我们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和荣耀，为了自己心中的偶像-----为了金钱，财利，名誉，功名，家族，眷属，脸面，地位，等级，光宗耀祖的理想，别人的仰视和巴结，通过使自己对别人有用、被别人有所乞求而显出自己的价值和分量，为自己、家人、乡亲、国族的崛起、兴旺、强大、令人刮目相看而奋斗终身的雄心抱负，等等等等。

为了这些人生“目的”，我们殚精竭虑，含辛茹苦，废寝忘食，付出我们一生的汗水，洒尽我们的热血和青春。为了那些宏伟或辉煌的目的，我们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

或者，我们以为“活着”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目的。我们以极大的坚忍和韧性，承受和面对许多艰难困苦-----背井离乡的坎坷、疾病的病痛、妻离子散的辛酸、“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忧伤。我们有着在命运面前逆来顺受的恒忍之心，以及在时间的长河中那些逝去的无奈的光阴与回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所以，对我们来说，“活着”本身，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我们的生命，不是正如可怜的奴隶一样吗？我们被这罪恶所充满之

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所欺压、压榨、剥削、鞭打、践踏、捆锁；我们不得不汗流浃背，被威逼利诱，不得不被强迫作各种各样的苦力。在生活的艰辛面前，我们不能说不，也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选择的权利。我们每天所作的事情，就是被迫地、违背自己心意地，做自己不愿去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们生活得极其痛苦。我们所朝思暮想、极其渴望的，就是能够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能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但是，我们之所以落在这分田地里、身处这样的处境之中，我们自己却无可推责。因为，是我们自己选择了那个"奴隶主"-----它就是"罪"。我们选择了：作这被罪恶所充满之世界的奴隶。

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肚腹，为了填满我们的属肉体血气的心思和欲望。甚至，当我们说服自己，在心里"放下"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世人独醉我独醒"的"清高"自傲之罪的网罗之中。在无所事事的舒适肉体中时，我们荒废着我们的生命；而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时，我们为五斗米折腰。在我们明知对错、是非的时候，为了一己之私，我们仍然选择"错"、选择"非"-----因为我们早已愚妄地说服了自己，叫自己相信，没有什么真的全知全能、审判天下的造物主。我们所要的生活，就是怎样让我们自己舒服而已；对错是非，算不了什么-----尤其是当我们必不可少的切身利益与其发生冲突的时候。

所以，我们嫉妒争竞，贪得无厌，指鹿为马，好勇斗狠，功利主义，成败论英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活着"-----为了自己活着，为了自己的家人活着，为了自己的族群活着，为了自己的国家活着。我们看不见，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也不知道，他的能力，不在任何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之内----因为这些，本是他创造的；我们更不晓得，我们本是他的儿女。

【第三部分】

顺命的奴仆，神的奴仆，自由的奴仆

凡 较 力 争 胜 的 ， 诸 事 都 有 节 制 。 他 们 不 过 是 要 得 能 坏 的 冠 冕 。 我 们 却 是 要 得 不 能 坏 的 冠 冕 。

所 以 我 奔 跑 ， 不 像 无 定 向 的 。 我 斗 拳 ， 不 像 打 空 气 的 。

人总是为了某样事情、某种东西、某个理念而活-----尽管这种目的和价值常常是在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潜意识里面。人就是这样的目的和价值的奴仆。

在人的生命中，若有什么是极其珍贵以至于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或是他自己的身体、血气、私欲，或是他所倚靠和盼望的对象），那么，他就是那样东西或是内容的奴仆。

然而在这世上，有一种奴仆，是自由的奴仆，是顺命的奴仆，是神的奴仆。

这样的奴仆是自由的，因为他的主人是宇宙天地的造物主，是全能而全备的，一无所缺；因为他的主人把白白的恩典、舍命的情爱赐给他；因为他的主人已给他宝贵的应许，把永远的生命赋予他。

这样的奴仆，无论是生是死，都与主同在，日日渴慕、祈求、祷告主，与主交通，向主倾诉。这样的救恩，何等奇妙。这样的深情，何其圣洁。

==

10.《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既 是 这 样 ， 还 有 什 么 说 的 呢 ？ 神 若 帮 助 我 们 ， 谁 能

敌挡我们呢？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8: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8: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云云或作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吗）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8:36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8: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第一部分】

谁能敌挡他们

这个世界，并非在本质上是“二元”的，有善与恶两个源头。而是“一元”的：即，只有一位造物主、只有一个源头-----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是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罪恶，只是缺乏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神不仅创造了宇宙天地万物，而且，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作他的儿女。

神赐给他们自由的意志和选择的能力，愿意他们真诚地、出于内心地，拣选良善、远离罪恶。正如父母，因着对儿女的爱，愿自己的儿女真诚地、出于内心地，拣选良善、远离罪恶。

什么是善？遵从神、归向他，就是善。什么是恶？背离神、违逆他，就是恶。然而，在这世上，自从人起初犯罪以来，就在内心深处背离了神----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活着；每个人，都在按着自己的标准和自我的中心来分别善恶；每个人，都在心中为自己树立一些偶像，来代替那永生的真神，来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和生命目标；每个人，都在以自己为自己的神。因此，他们活在谎言、诡诈、自义、欺压、冷漠、偷窃、贪婪之中-----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在地狱之火中，就是面临无限公义之神的永远刑罚。

在这世上，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真心从罪中悔改的人，谦卑地知道：-----

自己距离神是何等遥远，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卑微；自己凭着己力，是何等无法靠近那位宇宙天地、万有的主。

这样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是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而偿还的罪债-----唯有耶稣基督的中保，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归向他。

神在这世上拣选的人，是被这世界看为愚拙和软弱的人；是那些真诚而单纯、内心谦卑、如同小孩子一样的人。他们安静、不喧嚷，温柔而卑微。他们软弱，并常常受人的欺负和毁谤；他们在苦难与艰难面前，常常闭口不言，以善待恶。他们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主耶稣曾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然而，那些属神的子民、上帝的儿女，谁能敌挡他们呢？他们的心意完全归向神的心意，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和贪婪。他们的心中，被圣灵点燃起了信、望、爱的热忱之火。他们向神，心中是炽热的爱。他们向自己，是谦卑的悔改之心。他们向世界，是爱人如己的心。

神若帮助他们，谁能敌挡他们呢？有谁的能力、权柄、智慧、与荣耀，大

于那位宇宙天地万有的造物之主呢？

【第二部分】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谁能定他们的罪

审判的权柄在于神。他是终极的审判官。他是公义的审判官。他绝不屈枉正直，也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是万有的主宰者。他是全能和全备的神，是自有和永有的神。他一无所缺，更不受任何贿赂。

他是全知者，是无限的智慧者，洞察一切；世人的心敞开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隐秘之事，在他的所知之外；他更不受任何谗言。

神的审判和鉴察，在这世界的每日之中，更在那终极审判之日；神的惩罚和刑责，在那永远的、可怕的、悲惨的、黑暗无光的地狱之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不死的。

轻看神、藐视神、悖逆神的人，不知道那来自于神所赐的一切，是多么可贵；也不知道珍惜神的恩赐与恩惠。他们既然离弃神，藐视、睥睨神所赐的阳光、雨露、恩泽，就必然配得地狱的永远黑暗和痛苦哀号。

然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一切权柄，都是来自于神。一切的审判和判断，都必将以神的审判和判断为归依、终结。

神的审判，是按着真实。

神的审判，必将推翻一切的诡诈奸恶的诬告与构陷。

【第三部分】

谁能使他们与神的爱相隔绝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神的爱，是借着基督；是完全地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拯救、挽回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承担我们自己因罪孽而应受的永远惩罚；并三日后复活，使我们每一个愿意悔改、归向神、接受他十字架救恩的罪人，得与他一起在天父的家中，在基督为王、为主的永远天国中，得享永恒的幸福与甜美。

对于如此的神儿女，谁能使他们与神的爱相隔绝呢？基督既为他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并已经把永生赐给他们，必将使他们死里复活-----

那么，谁能使他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

==

==

==

11.《一切都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9:15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9:16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第一部分】

神的普世救恩与拣选

神的拣选和救恩，是普世的、普及的。他从来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任何人，无论是男女老幼，也不分种族肤色，都能够得到-----只要他们愿意相信与接受。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

神把阳光、雨露、空气和大地，赐给一切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我们的生命本身，更是出于神的大能、神的赐予。

神的律法和公义，写在我们的良心之中；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但是，我们却选择背离神，选择自我、自高、自义，选择罪、选择灵魂的灭亡。

我们都是罪人，然而，若我们愿意心中谦卑，愿意悔改，愿意接受主的救恩，那么，我们就必将是永远属于他的国度；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第二部分】

我们的局限----我们所知有限，所能有限，所为有限。

与那位万有的创造者、主宰者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极其有限。神在时间之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事，都尽皆敞开在他的眼前。然而我们，在时间之内，所能看见的事，就只有当下，以及很近的过去时间中，一点很小的局面；我们对未来更一无所知。

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也极其有限。我们的能力，与那浩瀚的宇宙星河以及苍茫的大地洋海相比，实在是微如灰尘，微不足道。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遥不可及。很多复杂与精妙的局面，更是严重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在未知的知识海洋面前，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连沧海一粟都不如。

而且，每当我们对未知事物的了解多了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发现，一个问题的有限答案，会立刻带来百倍千倍的繁多的新问题。

即使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中，我们实际去做的事情，也是极其有限-----因为我们总是在罪和懒惰的网罗之中。我们看不见什么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事。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总是荒废在彼此的争斗、嫉妒、争竞之中，或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虚妄之事中。

对于那些我们真地看见了有益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也常常是心猿意马，被这世界的声色犬马吸引了注意力，离开正确的道路。我们总是分不清孰重孰轻，更常常在理念之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指鹿为马、明知故犯、颠倒黑白。

【第三部分】

定意的，奔跑的人；

一切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1）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在深刻的根源性上说，更在我们每日之中、漫长年岁之中、时时刻刻的言语、行为、关系、一切事情上，从根本上说，都并非在于那定意的、奔跑的人。而是，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神在创世以先，就知道我们、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未被造、还未出母腹的时候，他就按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

我 未 将 你 造 在 腹 中 ， 我 已 晓 得 你 。 你 未 出 母 胎 ， 我 已 分 别 你 为 圣 。

（2）

是的，人是渺小的、软弱的、不可靠的、有限的、有罪的。

但是，感谢神-----世上的一切事情，并不取决于人的谋算，也不取决于人

的奔跑、人的定意、人的决心、人的意志。

而是，完完全全地在乎神的旨意和安排。一切都完完全全地只在乎那位发怜悯的宇宙天地的造物主。

固然，我们应当努力、辛勤、坚毅、殚精竭虑地去事奉神、服务人；然而，事情的起源、启动、发展和结局，方方面面，内因、外因，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在乎神的旨意。

对于属神的百姓来说，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平安！何等的激励！

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生命之中燃烧起信、望、爱的圣洁火焰。

愿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充满谦卑和热忱的心，为了主而大发热心，为了主的圣殿而心中急如火烧，

作那定意的、奔跑的人------

并且深深地知道，神爱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寻求他、事奉他、热爱他的人；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更谦卑地、深深地知道，事情的启动、发展和结局都早已在神的手中；我们的主，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

===

12.《人的义与神的义》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10:3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10: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10:5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10:6 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10:7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10:8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10: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0:11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第一部分】

人的义

如果说，有人认为世上的宗教都是彼此相似、劝人向善，那么，这样的人实在是谬大矣。

因为，究竟什么是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人人皆知；但实际上，却深奥无比。

（1）

比如，善意的谎言，是善吗？为了良好的目的，而采取手段上的变通，算是善吗？如果算是善，那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善吗？目的之善，手段之恶，其中的界限在哪里呢？这样的界限又是由谁来定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还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又比如，如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善的话，那么，人也应当“己所欲，施于人”吗？这样，人应当怎样对待那些遇见的一切世人，以及未曾遇见的所有世人呢？

人是否就应该变卖自己的一切，施舍给别人；否则就算为恶呢？如果不算为恶，那么，冷漠与怜恤、博爱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又是由谁来决定这样的区别呢？

而且，“己所不欲”的事情，一定就是错的事情吗？“己所欲”的事情，一定就是对的吗？这对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再比如，“善”就是对人友好、满足对方的要求和心愿吗？对方的要求和心愿，可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么，谁又来决定什么是公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人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那么，是否公众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呢？

人云亦云、从众的心理，就是正确的吗？那么，“众口铄金”、“法不责众”等等，就是对的吗？道德的审判，是否就可以通过投票、民主的形式来完成呢？（尚且不说，这里还需假设，人们能够、并且愿意努力地去仔细查明真相和事实）。

谁能保证，私利的影响，血气的愚拙，迷信的虚妄，不会蒙蔽亿万人的眼睛呢？难道很多罪行，不就是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吗？难道战争的基础、乃至打群架、群体闹事的原因，不就常常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哥们义气、族群主义、以及私利和血气所驱动的吗？我们难道不是常常地、义愤填膺地，把自己当成正义化身，以恶报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吗？这样的仇恨、鄙睨、血泪、暴力、凶杀，不就是人类的历史吗？

可是，难道我们在恶的面前，就只能退避三舍、苟延残喘、胆怯懦弱、趋利避害吗？

在报复与懦弱无为之间，在“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之间，其中的“度”，又该怎样掌握呢？

更重要的是，谁来决定这样的标准是正确与否呢？这样裁决的人，他的权柄的来源和凭据是什么呢？

（2）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生死、以及意义呢？

我们相信善人死后会有好报，恶人死后会有惩罚。但是，对究竟什么是“善”，以及究竟怎样才是足够的“善”、才能达到满意的标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握。

如果我们内心诚实，我们也一定会心里承认，我们完全没有权柄，来裁决这些关乎生死、意义、死后结局之事。那些事情，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和认知之外。

若没有神的启示，凭我们自己的私意猜测和臆想，我们也更不知道------死后的奖赏，究竟是什么、有多么美好，以及奖赏的条件是什么；死后的惩罚，究竟是什么、有多么严重，以及惩罚的条件是什么。

所以，是不是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还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呢？亦或是，“心诚则灵”呢？

（3）

如果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确定，或是凭着人的标准去妄自揣测，那么，我们的所谓宗教信仰，就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呓语而已。

这样的凭着人的标准的妄自揣测，以及在宗教信仰中 依 据 、强 调 任何"人的义"、"人的智慧彻悟"、"人的修行"-----无论那是关公、妈祖、观音、罗汉、圣徒、清真、蒋公、还是毛公；无论是怎样的至圣先师；无论是人的彻悟，还是缘分、菩提；无论是人的行为、饮食、言语的戒律规条；无论是人的修炼、修行，自我灵修，还是修身养性-----这些，或许看似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道理和优点，但是，这样的宗教信仰的人，却实际上是、并终将是遗害无穷的无神论者-----

因为，他们（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整体）必终极地是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以自己的认知和智慧为权威和主宰；以自己的领悟和判断本身，作为判断的凭据和权柄的来源。

他们在内心深处，潜在性地，把自己与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看为平等。他们用自己的义，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牺牲，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刻苦修行，自己对他人的无私表现，自己的智慧、大彻大悟，自己的坚忍，自己的容让、博大胸怀，自己的清洁、圣洁，等等等等，来当作基石，当作根本，当作可以凭据的、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基础。

【第二部分】

神的义

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

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的权柄遍及全地，他的能力胜过一切，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永有的，是全备的，是无限的。

他创造了天地，那么，他自己岂不在天地之上？他的能力，岂不远远胜过天地？

他创造了海洋和其中匍匐的巨浪，那么，他自己的能力岂不远远胜过风暴

和大海？

他创造了大地，那么，他的大能与智慧岂不远远胜过全地之中的一切？

他是有位格的。

他既造了人的耳，那么，他自己岂不能听见？

他既造了人的眼睛，那么，他自己岂不能看见？

他既造了人的口，那么，他自己岂不能说话？

他造了人的头脑，他自己岂不能思想、岂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旨意？

他造了人的心灵，他自己岂没有感受、喜悦、忿怒、判断、选择、憎恨、厌恶？

他造了一切世人，把生命赐给他们。

他的圣洁、公义、慈爱，岂不远远地胜过世上一切的世人？

然而，在神那里，不会有我们人身上的罪、软弱、污秽、疾病、虚谎、朝三暮四。

人，作为全地之上最独特的受造之物，有着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神的旨意和法则。他们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但是----可叹，他们生活在罪中，活在血气、虚谎、诡诈和自义之中；他们离弃了他们的造物主，离弃了神的恩典与恩惠。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天空的飞鸟知道来去的定期，燕子、斑鸠、白鹤也守候着当来的时令。然而-----人却不知道敬畏神、遵从神。

【第三部分】

信主的道，在我们的口里和心里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为我们的罪责以及应受的永远惩罚，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他三日后复活，使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复活-----

把我们从罪中挽回，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

与神和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永远的幸福。

这是神的应许，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神的恩典，赐给那谦卑、悔改的罪人。

这是叫人无以自夸的恩典-----

因为，人若想要来到那无限之神的面前，

从根本性上说，人所能靠的，必不是人的优点，

而是神的恩典与饶恕；

靠的是人的信，

而不是人的立功和功德。

这样的信心与信靠，

必是完全的委身和倚靠；

必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热爱和敬拜；

必是在心灵和诚实之中，

敬拜与遵从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

==

13.《神的恩慈与严厉》

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11:17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11:18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11:19 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11:20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11:21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11:22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第一部分】

神的恩慈

（1）

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造物主的恩惠之中。

因为无论是好人还是歹人，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都同样享受着生命最基本的条件，比如阳光、雨水和空气。

我们自己的身体内部，每天、每时、每刻也都在进行着极其复杂的协调机制和代谢过程，若没有这些，我们的机体就会立刻失序、崩塌、衰败。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亲人之中、集体之中、社会之中，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的、攸关我们利益、甚至生死存亡的事情，正在演进着、筹划着、发生着，待所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它们对我们的益处就会显现出来。

这些，都是出于神的供应，出于神的意志安排。

无论是祝福、还是灾祸，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或允许。他把祝福赏赐给地上的万人，也降罚于全地的罪恶。

（2）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尽管，一切世人都承受着神所赐的生命与恩惠；但是，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却千差万别。

（2.A）有的人看重的是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荣华和荣耀-----

他们被那些宏伟和浩瀚的事情与事物震撼着，羡慕它们。

于是，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在他们的眼中，这世界如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于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当作他们纵马奔驰的疆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这个海阔天空之中，他们慷慨激昂，潇洒驰骋。

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着。这梦想，就是作出一番大事业，尽情享受激情燃烧的岁月。

然而，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他们自己心中的骄傲。

他们却没有谦卑的心，没有饮水思源的感恩，更没有饥渴慕义、切切地祈求公义与圣洁的一颗灵魂。

（2.B）有的人看重的则是自己的温饱和舒适-----

他们知足常乐，安居无虑。他们只看重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事情。对那些于己无关的人、事情和事物，他们一无挂虑，也不会去思索、烦恼。

他们人生在世的倚靠，就是自己手中的财富，和自己身边的家人。

他们却不去思想：

财富终将朽坏。当死亡来临时，家人也终将离自己而去----或是自己终将离他们而去。

他们并非不知道这些必将衰亡之事；但是，他们已经在心中作好了决定，就是蒙上自己的眼睛，不去思想那些看似虚幻的、永恒的、幽冥的事情，而只看重手中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惠的事情。

他们宁愿倚靠自己的眼睛、手、脚，也不寻求那关乎灵魂与信心之事。

他们的眼中，没有神。

（2.C）有的人关心、好奇、努力去了解和求索那些超自然、冥冥之中的事情-----

然而，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却是私利和血气。

他们推演出一系列复杂而精妙的算式，发展出一些繁琐、奥妙、难懂的理念和认知。他们称之为风水，阴阳，五行，黄历，易术、星座，血型，生辰，八字，生肖，属相，算卦，占卜，神通，气功，冥币，特异功能，通灵，交鬼，星相，法事，等等等等。

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作法、知识、理念，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诸事顺利，比如，投资、嫁娶、生育、兴旺发达、出行、搬迁、健康、能力、力量、预知、儿女、学业、事业、朋友、亲情；甚至一些琐事，诸如，理发、穿衣、驾驶，等等等等。

他们也希望，自己可以用这些来为死去的亲人带来一些好处，使去世的人们在那幽冥的世界里仍然可以得到快乐和享福。

他们也更希望，自己在死去以后，儿女们、后代们能对自己作同样的事情，祭祀自己。无论自己在此生怎样，行善或是行恶，建功立业或是荒废生命；只愿自己在死后，因着儿女的祭祀，能够在阴间得到些好处。

他们却不知道、也不去想一想，人的兴旺与顺利，是来自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的恩赐与恩慈。人在死后的际遇和结局，更加完全是超乎人的权柄之外，完全是在乎那施行审判、惩罚、奖赏的神自己。

他们也不思想，神所喜悦的，是人的公平、正义、公义、圣洁、怜恤、和平、正直、诚实、信心、盼望、热爱、敬虔-----是人在内心深处归向神自己，是人的清洁、正直、谦卑的灵魂。

然而他们所作的，却是把此生此世的那些私利，当作神自己来寻求。他们虽然喜欢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公义、圣洁的神。

这些，不仅是迷信，而更是-----

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2.D）有的人看重的是智慧-----

他们在纷繁的世事人生之中，期望自己能够悟透人生的奥妙哲理；并且，凭借着这样的明白、彻悟、智慧，能够得到人生的进深、升华、释放、放下，并进入那极乐世界。

破除执迷不悟，超脱而超然，不再被愚妄和苦毒的枷锁所缠累、羁绊。

他们追寻许多至深的至理，并看透世事人生之中许多的空乏、空虚、虚浮和虚谎。在缤纷繁杂的表象之下，他们看见人生世事的荒芜和荒谬。

他们放眼全地，看见的是人生的苦境，体现在许许多多的层面之上。

他们看破红尘，在心中离弃、离开这个世界，将它如同脏水一样、连同其中的婴儿一起倒掉。

他们把善恶有报，看作是某种直接或间接的逻辑关系；他们把人生的不同结局，当作是智慧参悟与善恶有报的结果。

然而，他们穷尽了心思和智慧，却没有看见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事实-----

这天地宇宙，虽然浩瀚宏大，虽然精妙入微；然而，却不能自我生成。

如果，有那样一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那么，他创造天地的大能与智慧，以及我们在诸天、苍穹之中所瞥见的、万物所述说的，神的荣耀，就远非我们世人的智慧所能完全了解。

他的公义和能力，远在我们的心思、智慧、头脑、能力所及之外。

我们也绝无可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接近他，凭着自己的彻悟和智慧去进入在神的权柄之下、国度之中的极乐世界。

我们这些被造之物，更永远不能成为像神自己一样的全能者和主宰者。

只有神，才应得到、才配得我们的敬拜、热爱和赞美。

然而，只有一颗卑微、谦卑的灵魂，而不是骄傲、自义的心，才肯承认、接受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事实。

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

（2.E）然而，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面前，认识他，遵从他，敬畏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微、不配神恩的罪人，谦卑悔改己罪、接受神救恩的人，有福了----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

你 们 ， 你 们 就 有 福 了 。应 当 欢 喜 快 乐 ， 因 为 你 们 在 天 上 的 赏 赐 是 大 的 。

【第二部分】

神的严厉

神是公义而圣洁的；他憎恨罪、厌恶罪，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神对罪恶的惩罚和咒诅是极其可畏的，是永远的。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成为自己之罪的奴仆。他们沉浸在自高和自义的骄傲之中。

将要落在地狱里的人，有祸了。

那里是永远的火湖，是彻底黑暗之地。

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那里，是彻底的与神永远隔绝之地。

今日，我们生活在阳光和雨露的恩泽之中。然而，若我们不知道珍惜这些来自于神的恩赐，若我们不悔改己罪，若我们不归向、不敬畏那造我们的主------

那么，我们就将要永远地与他隔绝，也将要永远地失去一切来自于神的美好，再也不会看见光明，再也不会得到舒适和幸福-----

而是，要在永远的刑罚之中，永远地痛苦哀号。

【第三部分】

神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

神的救恩，在我们每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之人的身上。

圣经上说，凡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的，就必能得救-----

你 若 口 里 认 耶 稣 为 主 ， 心 里 信 神 叫 他 从 死 里 复 活 ， 就 必 得 救 。

因 为 人 心 里 相 信 ， 就 可 以 称 义 。 口 里 承 认 ， 就 可 以 得 救 。

经 上 说 ， 凡 信 他 的 人 ， 必 不 至 于 羞 愧 。

神向我们的恩慈，是何等的大；神更愿我们长久地活在他的恩慈之中。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耶稣基督里，看见神，遇见他的救恩，并永远得到他的保守。

愿我们的感谢赞美，归于至高的神，归于我们永远的救主。

===

14.《人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

我 们 没 有 一 个 人 为 自 己 活 ， 也 没 有 一 个 人 为 自 己 死 。 14:8 我 们 若 活 着 ， 是 为 主 而 活 。 若 死 了 ， 是 为 主 而 死 。 所 以 我 们 或 活 或 死 ， 总 是 主 的 人 。 14:9 因 此 基 督 死 了 ， 又 活 了 ， 为 要 作 死 人 并 活 人 的 主

【第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而活

耶稣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1）

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当我们对酒当歌，感叹人生几何的时候

当我们回首往事，为逝去的光阴而忧伤，为曾经的岁月而激动欣慰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碧海蓝天，任海风吹拂，惊叹于人的渺小、世界的宏伟的时候

当我们仰望星空，被那浩瀚的环宇所震撼的时候

当我们在每日的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被亲情感动着、温暖着、幸福着的时候

当我们看着儿女渐渐长大，一幅一幅崭新的人生画卷，在他们前面展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心底、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晓得：

人生的意义，不在此生之中，不在转瞬即逝、朝荣夕枯的物质环境里，而在人生之外，在永恒之中

（2）

我们为什么而活呢？

是的，我们应当一丝不苟地努力去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

应当努力地做好规划，经营我们的人生、学业、家庭和感情，

应当努力地与人为善，作一个对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有益的人

努力地善待我们的亲人和朋友，用信实、善意和诚实对待他们

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意义吗？-----

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个社会的建设而添砖加瓦吗？就是为了GDP的发展而贡献汗水吗？就是在一个一个庞大机器中，作一颗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吗？

固然，人群、社会的精诚团结极其重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包容、协调、信实相待非常可贵，

-----然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吗？

我们的生命，远远大过这些；

我们的人生意义，远远超乎这些之外。

（3）

人，是按着神、那宇宙天地独一的造物主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在人的里面，有一颗灵魂，能够晓得永恒、超越生死、能够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

正是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比死亡还重要，比死亡还坚强-----那是一种牺牲的精神，是一种宁愿舍身取义的渴望，是一种永存不朽的东西，是灵魂之中的信念。

正是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死，都知道生命何其甜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对身后之事的牵挂。

正是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东西，当作我们生命的终极意义、盼望、价值和寄托，那么，我们就必将失望。

这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东西，都是被造之物组成的，都必将朽坏、凋残和衰败。它们必将带给我们的，就是无尽的失意、惆怅、羞惭、和痛苦的失望。

无论，我们所倚靠的东西，是怎样的被造之物-----

无论是我们手中的事业、学业、家庭，还是宏伟的高楼大厦、商业帝国，或是那些宏大的、远超过个人的事情和事物，比如，国家，民族，土地，江河，祖先，群体，社会；亦或是朋友，亲人，师长，长辈，领袖，儿女；又或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地位，他人的需要和尊重，等等等等，

若我们把他们，或是它们，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精神支柱、意义、价值，那么，我们就必将在羞惭之中，无尽地失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造之物。如果我们把人，或是其它任何被造之物当作我们人生的盼望和寄托，我们就必将羞惭。

因为，在这世上，在这宇宙天地之中，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承载、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不朽灵魂。

只有一位是自有永有的，就是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神。

只有他，才应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目标、价值、归宿、寄托、盼望。

只有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寻求、敬畏、倚靠、信赖。

（4）

真正的信仰，并非是使人离群索居，悲观厌世，孤身自傲，

也不应是使人看破红尘，放下执着，隐身于世，心中清高，

更不应是使人愤世嫉俗，仇恨满胸，怒目对人，傲然于世。

而是，使人的心灵，谦卑下来，勤奋起来，眼睛张开，行动起来，友善起来，

并且，因着神的大能，去除、清洁那愿意谦卑悔改己罪之人的灵魂中的罪污、诡诈、软弱、疾病。

（5）

我们为什么活着呢？就是为了-----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的神，

并且，爱人如己。

我们虽然卑微，软弱，力量衰残；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被人藐视；

虽然，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令人失望痛心的事，那么多可憎的罪恶

虽然，这世上有那么多醉酒宴乐、心灵冷漠的人

然而，我们愿付上自己的一生，跟随主耶稣，活出他的救恩的见证

把我们的生命，浇奠在神的台前；把我们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他

那也许并非什么建功立业，并非什么功德，

而是，在每个日子中，在每个事情中，在每个言语和行为中，直面人生，迎接挑战，克服困难-----虽失败，却不会毁灭；虽气馁，却不会绝望；虽挫折，却永不言弃-----

活出圣灵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 爱 ， 喜 乐 ， 和 平 ， 忍 耐 ， 恩 慈 ， 良 善 ， 信 实 ，温柔 ， 节 制 。

【第二部分】

我们为什么而死

人终有一死。我们为什么而死，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而生。

未知死，焉知生-----

正如，一个行路的人，只有知道了目的地和归宿，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才能够在旅途之中百折不挠，才能够坚韧而坚忍。

人生在世，必须要对自己的灵魂归宿，有妥善的安排和考虑。这样，他才能真正地有勇气面对生活，直面人生，面对惨淡的现实和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

只有一个不畏死的人，才能够真正面对生的艰难，以及人生之中的一切不如意；才能即使在风浪之中，也永远存着美好的盼望。

然而，不畏死的人，也许有很多；可是，只有在信心中死的人，才是真正谦卑、幸福、信靠、盼望、热爱的人。

这信心，不是来自于、倚靠于世上的任何被造之物，而是，来自于、倚靠于那位永生的神。

如果，造物主的大能，能够创造这宇宙天地，能够赐予我们生命；那么，死亡岂能阻断他的能力？死亡岂能隔断他对我们的爱？

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死亡的毒钩已经被拔去；我们只要有一颗谦卑悔

改的心，一颗信靠、盼望、热爱他的灵魂，那么，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必与他同在。我们必将在他的国度里，在那无限美好的天国之中，与他坐席。

==
==

15.《与人为善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15:3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第一部分】

善是什么，益处是什么

（1）

善是什么？

善就是对人友好，为对方的益处着想；把喜悦的事，带给别人。

然而，什么样的事情，是真正的益处？什么样的事情，带给人真正的喜悦？

若我们仔细思想这些话题，就很快会发现，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义”------

因为，

与人为善，必须有两方面：

憎恨罪，

爱罪人。

人的心，被罪玷污；从里面发出的，是对私利的渴望，是对此世的追寻；其中，满了骄傲、自义和虚谎、诡诈。

如果我们只是讨好他们，满足他们的私利，只是为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满足他们的私欲，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善待他们-----因为，我们是在把他们推入那可怕的地狱深坑之中。

那么，怎样是善待别人呢：

“爱 是 恒 久 忍 耐 ， 又 有 恩 慈 。 爱 是 不 嫉 妒 。 爱 是 不 自 夸 。 不 张 狂 。

不 作 害 羞 的 事 。 不 求 自 己 的 益 处 。 不 轻 易 发 怒 。 不 计 算 人 的 恶 。

不 喜 欢 不 义 。 只 喜 欢 真 理 。

凡 事 包 容 。 凡 事 相 信 。 凡 事 盼 望 。 凡 事 忍 耐 。

爱 是 永 不 止 息 ”。

人的益处，在于他们灵魂里所得的益处，在于他们在永恒里的归宿。

在于“义”-----是正直、公平、正义、诚实、谨守、敬虔地对待人。

（2）

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自己。

善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源头，或是独立的位格，或是一个自立于世的东西。

对善的奖赏和认定，是一个权柄，是一个荣耀，是一件极其本质、根本之事，是一件极其本源的属性。

善与恶的终极判定权，不在任何受造之物的手中。

神是善的源头。

什么是善？遵从神就是善。什么是恶？背离神就是恶。

神必将有审判-----一切的罪恶，都将显露出来，都将落在那鉴察人心的造物主的审判之下，都将承受神永远的惩罚。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人里面，有一颗不死的灵魂。他有自由的意志和选择的能力，有着神所赐的生命。

然而，若人以为自己有分别善与恶的权柄，那么，这就是他背离神、悖逆神的起点。从此，他就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以自己为判断事物、利益的终极标准。

从此，他以坏为好，以好为坏；他在内心深处离开了造他的主。他灵魂里的眼睛被自己的私利和骄傲自义蒙蔽，看不见那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之事。

他以为自己自由，实际却落在自己的罪的网罗之中，成为自己之罪的奴仆。他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血气和肚腹，为了满足自己今生的骄傲，为了寻求他人的认同和赞美，为了获得自己的属世利益。他用谎言欺骗自己，为自己埋下深坑，自己把自己绊倒。

（3）

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他人？

憎恨罪，爱罪人。

这需要我们用百般的忍耐对待人，用百般的恩慈对待世人，爱我们的仇敌。

效法耶稣基督-----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____

我们所传的，（或作所传与我们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作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意（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第二部分】

与人为善的根源-----

我们爱世人，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饶恕人，因为神先饶恕我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承受无与伦比的痛苦和伤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承担我们的罪债，饶恕我们每一个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并三日后复活----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若没有神的救恩，我们就没有一人能够有真正的爱的力量。

与人为善，爱一个人，是这世上最难、也是最美的事情。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若要爱世人，就必需在我们的心里先有神的爱，先接受他的爱、他的救恩----

这样，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爱的力量、忍耐的力量、恩慈的力量、等待的力量、盼望的力量，才能-----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才能有那永不止息、永不衰败的爱。

【第三部分】

基督的公义、恩慈、与眷顾

在基督的里面，是完全的公义与慈爱。

主 阿 ， 我 要 在 万 民 中 称 谢 你 。 在 列 邦 中 歌 颂 你 。

因 为 你 的 慈 爱 ， 高 及 诸 天 。 你 的 诚 实 ， 达 到 穹 苍 。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恩慈与眷顾之下，

阳光、雨露和恩泽，出于他，

人心中的慈爱，也是来自于他，

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他、敬畏他、真诚地热爱他-----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

16.《我们应当怎样来到神的面前》

（赛40：3-5）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第一部分】

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填满一切山洼，削平大小山岗；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我们怎样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为什么与神相隔绝？为什么看不见他？为什么摸不到他，听不见他，不能认识他？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上天”，也都知道“永

远”，然而，为什么我们却还总是要在心里向自己推诿，说，“凡是我作的事，我心里的污秽，都不会被发现、不会被审判，-----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

（1）

愚顽人在心里说：“没有神”。

（1.A）

这是人心中一种一般性的、根本性的、广泛性的判断。这样的判断，代表了一种理念，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以及道德审判，没有绝对的、无上的、神圣的、圣洁的、超自然的权威和能力。

所以，尽管在人世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则、制度、秩序、规章，以及针对这些规章制度的奖惩措施；也尽管在人世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舆论环境以及道德法庭的风言风语；

但是，从终极性的角度讲，只要我们的恶，不被发现，或是能够逃避人间法律的审判，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无所虑。其它方面的顾虑，比如在人背后的风言风语，或是在史书中的记载与评论，相对而言，只要对我们的切身利益没有什么损害，我们都可以轻视、笑骂由人。

“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有着这样想法的人，是一个愚顽人。

在他的心里，如同沙漠地，其中充满了坑坑洼洼、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崎崎岖岖的山洼、山岗和山坡。

在他的心灵里面，是荒芜与枯萎，是苦毒与咒诅，是猥琐与阴暗，是心骄气傲与自以为义，是狂妄自大与胆小懦弱，是狐疑多端与心智麻木。

他看不见诸天述说、苍穹传扬着的神的荣耀与伟大。

他不晓得创造宇宙天地之神的法则、祝福、咒诅、恩慈、严厉与公义。

他不思想人生的奥妙、意义与真谛。

他在这个世界上舍本逐末，追逐那些转瞬即逝、朝荣夕枯的荣华与利益，为自己的私利、虚荣和骄傲而辛勤奔忙。

这样的人组成的人群与社会，是彼此争斗、妒嫉、仇恨、践踏、怀疑、坑害、欺骗、睚眦必报、哄笑、贬低讽刺、怒目相视、冷漠相待。他们彼此伤害。

他们在其中，不但不知道伤痛、哀伤，不知道饥渴慕义，反而沉浸在罪恶与虚荣之中，沉浸在罪与淫欲的欢愉之中。他们仿佛待宰的猪狗牲畜，为自己引颈受屠而庆祝。他们在死亡的前夜狂欢着，说，“我们痛快地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1.B）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这不是他在殿堂庙宇里大声宣讲的话，也不是他在街市上与人谈论时，理直气壮的话语；而是，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所说的话，就好像在试图说服自己。

他们不但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把这样的话和判断，公然说出来，

而且，他们还要为自己编排出许许多多冠冕堂皇的说法，作出伪善的样子，伪装出自己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

他们把这世界的荣华当作自己的信仰，

把人自己的智慧当作追求的对象，

他们以自己为自己的神。

他们不但不承认人的渺小，不承认在人心之中普遍的罪，反而藐视悔改之道，

把“人类”“人民”“人的智慧”“人的劳动”等等等等这样的概念，举得很高，看为伟大，当作自己的神，当作自己的信仰，当作自己生命的价值与归宿。

他们说：我们的梦想，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凡事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吧，让我们自强不息。

（1.C）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可是，他们还要为自己编排出很多关于超自然世界的种种理论体系，

用自己的虚谎，代替神的真实。

虽然，他们在心里说：宇宙天地中，没有那位无限的、无上的、绝对的、全能的、全知的、独一的权威和主宰，

但是-----

他们以己度人，用自己的模样和属性，来揣度神。

他们不晓得神是全备的、自有永有的，

反而以为他和人一样，是不足的、亏欠的、有缺陷的、局部的、需要帮助的、限制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的。

所以，他们为自己编排出很多神，比如------

土地爷，灶王爷，财神爷，缪斯，阿波罗，丘比特，宙斯，玉皇大帝，太白金星，太上老君，命运之神，福禄之神，

还用五彩的玉、铜、金、银、石为它们造出各种偶像，象人的模样，

以为它们象人一样，也很看重那些金玉良材，并且-----

需要各司其职，各管一摊，各当一面，有君臣、文武、百官，有等级、阶位，而且还会彼此争竞，争风吃醋。

甚至-----

他们还以为自己通过修行和修炼，凭着自己的功德，也可以成为仙，成为神。

（2）

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填满一切山洼，削平大小山岗；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当主耶稣的救恩与圣灵临到人心的时候，在人的心里，必充满了谦卑悔改、为罪而忧伤痛悔的心情。

认识永生神，必从人的悔改之道、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恩典与医治开始。

施洗约翰在耶稣以前来了，传悔改的洗礼。他在人心之中，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当圣灵来到我们心里，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柔软、变得谦卑的时候，

当我们祈求、寻找、叩门，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

神的救恩，离我们就不远了。

主是我们灵魂里的医生，只有承认自己灵魂生病、愿意接受神的医治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医治。

神是我们的救主，把救恩给一切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然而，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只有承认自己若不悔改、就必将承受神永远的审判惩罚，只有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救恩-----只有愿意接受神救恩的人-----

才能够得到神的救赎之恩典。

（3）

我们怎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的心中，主的道路被预备、修直，

当我们灵魂的沙漠地里，大小山岗被削平，一切山洼被填满，高高低低、崎崎岖岖的改为平坦的平原，

当我们谦卑悔改，恳切呼求，

当我们仰望上天，渴盼恩典，

当我们清心温柔，饥渴慕义，

那么，我们就能够预备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来到神的面前。

在神那里，是无限的美好与能力，是浩瀚的广袤与美丽，是永远的国度与幸福。

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得到、归向、享受、热爱我们的神！

【第二部分】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主的荣耀，在他创世以先、所预先定好的那日，在他审判全地的那日，必将降临到全地上。

全地的人，无论是在东西南北，无论是在田间犁地，还是在嫁娶宴乐，到那日，都将看见神的荣耀，以极大的威严和威势降临。

全地的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将立刻知道，谁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在那日，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神的荣耀。

在那日，那些在过去年代中、历世历代的已经死去的人们，也都要在神的大能之下复活，并与全地的一切世人接受神的审判。

他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手中所作的每一件事，心中的每个心思意念，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出来。

他们心中的每个秘密，都要在那鉴察人心的神面前敞开。

那些浸淫在罪中的人，

那些心中骄傲的人，

那些凭自己的智慧自高的人，

那些作自己肉体、血气、肚腹之奴仆的人，

那些被贪欲和雄心所占满的人，

那些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这必死之世界中的人，

那些背离、离弃那造他之主、神的人，

那些藐视神恩典、轻看神救恩的人，

那些不愿接受神救恩、以为自己不会有罪责和罪债的罪人们，

那些内心充满诡诈，以为自己可以欺哄神的人-----

有祸了！

==

==

17.《人的盼望、喜乐、平安的源泉是什么》

5/14/2015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第一部分】

人的盼望的根基

（1）

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盼望。

希望，是人生的动力，是人生最甜美事之一。

正因为，每晚我们都知道，明天艳阳会照常升起，所以，每夜我们才会在

床榻上安然入睡。

无论今日我们经历了多少艰辛、困苦、失望、惆怅，我们在夜晚的时候，安静地躺在床上被子里，在疲倦中，舒然地休息，

因为我们知道，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变化，我们更可以好好计划，作出更多、更好的努力。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里，每个脚步中，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盼望。

这盼望，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是我们生命的甘露，给我们力量面对困难和挫折，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努力，明天就会更好。

我们在幼小、童年的时候，盼望着长大，盼望着像邻居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有着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在辛苦学习的同时，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盼望着有一天，能像书里、影视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活得潇潇洒洒，快意人生。

我们在青年的时候，对爱情的盼望充满着我们的心，从懵懵懂懂，到初恋的纯洁美好期望，到感情之中的等待、成熟、与渴盼。我们的成长，伴随着那些最美丽的和风煦雨、以及痴痴的盼望；这些都给我们深深留下终身难忘的情怀与回忆。

我们在成年的时候，盼望着儿女，能够快乐幸福，长成一个听话懂事、知书达理的孩子，能够渐渐地有出息，能够不枉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的心血，能够将来懂得、记得爸爸妈妈为了这个家的付出与辛勤、艰难的汗水。

老年的时候，我们盼望着儿孙们的探望，盼望着他们的喜讯，盼望着朋友们的消息，盼望着儿时伙伴们的问候。

每时每刻，我们盼望着出门在外的亲人能够早日回返，思念着他们。

我们盼望着事业上的顺利与成功，盼望着爱人的理解与宽容，盼望着父母的明哲、原谅与包容。

（2）

盼望的根基是什么

盼望，需要根基吗？是的-----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何来盼望？

如果我们没有乐观，何来盼望？

如果我们没有想念，何来盼望？

如果我们没有羡慕，何来盼望？

如果我们没有渴求，何来盼望？

如果我们没有期待，何来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建基于对人生美好的信念，是来自于对生命珍贵价值的看重。

然而，这世上多少人，他们看重的，只是地上短暂之事；他们的信念，只是关乎触手可及的柴米油盐。

他们却不知道，我们生活中这些美好之事，都是来自于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的赐予；更不觉得，我们的明天与未来，都在神的大能之手中掌管。

盼望的根基，在于对神的仰赖和信靠。

若他看顾那天上的飞鸟，眷顾野地里的百合花，那么，他就必时刻看顾每

一个热爱他、信赖他、渴慕他、遵从他的儿女的灵魂。

这样的人，他们的盼望，必不会落空；他们的盼望，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

他们的盼望，是来自于神的救恩，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他已经为他们偿清了罪债，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天家。基督必与他们同在。他的大能膀臂，必时时保守着他们。

属神的儿女，他们的盼望正如这首诗歌中一样-----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渡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

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

今天我必与主同行，祂深知前途光景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飢饿

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

我前程虽经历水火，或快乐或有灾祸

但我主引导我路途，祂宝血将我涂抹

每一步愈走愈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

每重担愈挑愈轻省，每朵云披上银衣

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没有眼泪

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

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瞭

但我知主掌管明天，祂必要领我向前

【第二部分】

人的喜乐的源泉

在患难中要忍耐，在指望中要喜乐。

人的欢喜快乐，如果是建基在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各样转瞬即逝的事情与事物身上，那么，这样的欢喜快乐就必然是短暂的、风雨飘摇的。

这样的人，常常以物喜，以己悲，心情仿佛墙头的草，没有根茎，也没有枝叶，随波逐流，没有定准，变换莫定。

然而，如果人把盼望放在神自己的身上，

如果人认识神的公义与慈爱，

如果人谦卑地悔改、归向他，

那么，

这样的人就一定是常常喜乐的，

因为，他的喜乐的源泉是来自于神自己的恩慈与慈爱，永远不变。

【第三部分】

人的平安的保障

我们常说，好人一生平安。

这既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一句真诚的祝福。

但是，我们所说的平安，常常是以在这个世界上的际遇而言。

是的，谁愿意疾病缠身，经历祸患，诸事不顺呢？

可是，生命的意义难道不是在于拼搏与奋斗吗？不是在于"青山有幸埋忠骨"、"壮士马革裹尸还"吗？

我们固然愿意阖家安康，然而，我们更愿意追求的，是激动人心的时代大潮，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人的真情，在于困苦和试炼之中的坚毅与执着，在于百折不回的锤炼与勇气。

在这世上，无论际遇如何，无论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无论艰难困苦、还是平淡人生，

有一种平安，是这世界不能给的，那是真正的平安；

有一种爱，是这世界不能给的，那是真实的爱；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那是真正平安的保障，因为-----那是来自于神自己的爱，是舍命的情爱。

+++
+++
+++
+++
+++
+++
+++
+++
+++
+++
+++
+++
+++
+++
+++
+++

____

清华北大等高校与中国知识分子

在1949-1966年期间，正如在苏联、朝鲜、东欧各国、越南、柬埔寨、古巴等共产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敢言者、批评者、思想者们，受到了巨大的迫害、摧残、清洗。在反右、大跃进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们承受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发配边疆、劳动改造、饥荒、甚至死亡的命运。一方面，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们从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所弥漫着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等等朦朦胧胧的梦想和意识形态中，经历了痛苦幻灭的过程。另一方面，从此，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的短短不到十年以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了万马齐喑、思想禁锢、人身禁锢、经济禁锢、言论禁锢的可怕状态。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主义统治，在深度、广度、程度、范围上，超过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与此同时，在中国清华北大、复旦大学等文史哲专业，产生了影响广泛的犬儒主义文化；如同奴隶一般的文人们，在兴高采烈地为中国共产党唱着赞歌；他们从历史、哲学、文学等等角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添砖加瓦”、“添油加醋”，自欺欺人；并在更加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用马克思思想、共产主义的谎言，厚颜无耻地统治着亿万人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7/10/n9375047.htm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1）延安圈套

编写：高天韵

中共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是对内、对外不断斗争的历史。谎言、暴力，充斥泛滥，遗祸无穷。然而，当罪恶的真相层层曝光、渐渐广为人知时，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悲剧后，很多人依然对中共抱有幻想、甚至相信它的新的谎言。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谎言具有精致的欺骗性，而且与时俱进，变换包装，因而迷惑了几代中国人。本篇关注中共对于知识分子的欺骗、迫害和思想改造。

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世世代代承载和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堪称社会的中流砥柱。历史上的风流才俊，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演绎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

然而，在中共的欺骗宣传下，在中共全面、系统的思想改造之下，大陆知识分子饱受摧残，苦不堪言。从延安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屠城，再到当代的信息封锁及对正义知识分子的打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运动中、在谎言的包围和强权的压制下，一步步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从整体上沦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中共曾经宣扬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民主和自由，可是，在中共治下，知识分子从未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延安圈套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简称“边区”，占陕甘宁三省之边地，形成了“国中之国”。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率部将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打出了“抗日”与“民主”的大旗，大肆宣传蛊惑。一时间，延安，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尤其是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怀抱爱国救亡的热情，克服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投身共产运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都激动万分，为终于踏上了“自由”与“圣洁”之地而雀跃高歌。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1939年由四川抵达延安。时年23岁的他写下了最初的印象：“呼吸到一阵阵自由的空气。……能敞怀议论，能放声歌唱，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吗？”“……没有对青年、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迫害……”（多年后，胡绩伟说：“这份报纸（《人民日报》），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它没什么真的！”）

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学者裴毅然在《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中说：“共产主义高举公平旗帜，对资本主义展开强烈批判，占据道德高度，具有相当迷惑性。”“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从术语到概念，因陌生而新鲜，因新鲜而光芒四射，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小知识分子。”

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写：“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未知之数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悖。而论家不顾。”

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炫耀陕甘宁边区的“进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上宣布整风，他在大会上的演讲《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在《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书中，高华写：“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

诱入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展，《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

大批天真的知识分子走入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他们燃烧了青春、理想，甚至生命。

凋零的野百合花

提到延安整风，不能回避一个名字：王实味。这位中共文字狱的首个受难者，注释了延安的“开明”。王实味，河南人，1926年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翻译了200多万字的马列著作。

王实味是中共文字狱的第一个受难者。（网络图片）

王实味是中共文字狱的第一个受难者。（网络图片）

王实味性格孤傲，秉性耿直。从1942年2月始，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

1942年2月26日，王实味动笔撰写杂文《野百合花》，四节文章于3月13日、3月23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王实味在文中批评了延安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化趋向，反映了延安青年们的失望情绪。在文章结尾，王实味写：“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王实味并未意识到山雨欲来。他意犹未尽，继续在墙报发声，呼吁发挥正气，消灭邪气，说："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的几期墙报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引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阅读。

一天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也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决心狠整王实味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共领导人。当时，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约王震一行，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王震看完壁报后大怒，指责像王实味这类文人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中分析说："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

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由于挑战毛思想，王实味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一百多名已关押了将近五年的“特务”、“汉奸”、“托派”等被押撤离。在黄河边，他们全部被秘密处死。

1947年6月，国军飞机炸毁了王实味被关押的看守所，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如何处置。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处决。7月1日夜，在山西兴县，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的一处偏僻山隅，从他身后用大砍刀将他砍死。因怕被人认出，王实味被乱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丢在枯井内。

纯真的幻灭

在涌向延安的青年当中，许多人出身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们无惧物质条件的艰苦，奔向红色大旗。然而，在历时三年多的整风运动里，这些青年经历了严酷的整肃，纯真幻灭。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延安时是王实味的好朋友。他在整风运动前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他曾说，如果当年留下，“在后来的一个个‘抓特务’运动、‘抢救’运动、‘整风’运动中我总难逃一死，可能像王实味一样。”

民运人士、被两度开除出党的王若望说过：“当时投奔延安的我们，都有受骗上当的感觉，都觉着死气沉沉，王实味是位敢言的作家，他在延安的小砭沟墙报上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很快就成了毛泽东的俎上肉；接着我在延安的大砭沟编辑的轻骑队墙报也成为批判对象。王实味被抓后，我接着也被贬到山东，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整个延安，政治空气凝固了，人人自危。”谢韬后来有评：“王实味死得冤枉、死在梦中；王若望死得清醒、死在流亡。”

“红色女作家”颜一烟出身满族贵族，曾于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38年春前往延安。据颜一烟之兄颜毓蘅的儿子颜超记述，其姑姑和姑父高羽在延安都经历过“审查”。高羽因为曾被捕入狱，党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而颜一烟“也曾遭到长时间的审查和监禁”。颜超说：“我想也许这段经历给姑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思维和心灵创伤。”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父亲是清末赴日留学生，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清末举人的女儿。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2月，她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1939年到达延安，从事青年工作，还担任过编辑、教师等职。

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曾说："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

然而，在现实中，韦君宜所体验和见证的，却与"美好"恰恰相反。1998年，韦君宜出版回忆录《思痛录》，记述了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反思其毒害，引发巨大反响。该书有一章讲述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

韦君宜自述，当时，她和丈夫杨述受到了党部的打击和怀疑，"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

1943年底，绝大多数延安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此时，信念崩塌的，何止韦君宜一人？据《思痛录》写，从天津跟随韦君宜到延安的女青年吴英，曾在延安政学院被关禁闭。一日，她见到韦君宜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

《思痛录》里还写，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因为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大会上，丁汾在台上哭诉委屈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

韦君宜小结：“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当时，韦群宜曾和杨述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若干年后，中共当真把整人的运动扩大到了全中国，而且一次比一次惨

烈。几代人、十数亿百姓，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被卷入了一重重谎言与恐怖的恶浪狂澜。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2）反右阳谋

编写：高天韵

1951年，31岁的巫宁坤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攻读博士。新年时，他忽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请他前去燕京任教。巫宁坤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归祖国。当时，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劝他不要走，他不听，李政道就帮他打箱子。7月中旬，在登上邮轮前，巫宁坤问前来送行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一笑了之，二人话别。

1957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迎来事业最高峰。在大陆，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先后在监狱和农场被关押劳改近20年，九死一生。

1979年，"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国讲学，而巫宁坤进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此乃命运弄人？

"共产党你不要跟它讲道理，没有道理，……黑白永远是颠倒的。"巫宁坤

的夫人李怡楷如是说。

1993年，巫宁坤在纽约以英语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记叙了自己从肃反到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经历。

中共在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创伤和灾难，被指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作为主要受难者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之后，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中共也不再允许来自党外的批评。巫宁坤的遭遇，确实是苦难海洋中的“一滴泪”。

“双百方针”与“阳谋”

1951年，中共在全国大学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被逼“改造”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改造”之后，又来了“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肃反运动再掀肃杀之气。几经打击，知识分子由此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料，到了1956年，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竟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松动。

1956年4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在当天的会议总结时说：“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5月26日，时任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郑重地向各界人士宣布此“双百方针”。陆还称，中共“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7月20日，陆定一对出席会议的中共各省市负责宣传、文教的官员们讲话，要他们听取批评，勿乱扣帽子：“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反领导等等。”“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

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只有500万知识分子。这500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500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在谈到“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造现在这种面貌。那么，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毛的讲话让很多原来对共产党存有戒心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与会的著名翻译家傅雷，事后给家人写信，表明自己当时的感动和对毛的钦佩。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在5月2日、3日、7日发表社论，进一步推动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在如此“诚恳”的邀请下，响应号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改进建议或表达不满。新闻界也大力跟进。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5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右倾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继续去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好处”。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撰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后又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12日印发党内。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式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做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驳斥，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

文章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在高等学校的校园里，鸣放更为激烈。从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陆续贴出几百张大字报，很多内容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用“北京大学民主墙”称呼做了报导。

在“鸣放”后期，各种意见都提了出来。共产党对于涌现的批评不能接受，例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储安平的反对“党天下”等观点。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

1957年6月14日，风向彻底变了。《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据说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反右”风暴

《九评共产党》中写道：“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中共出尔反尔，将实话

实说、对党忠心耿耿的人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问题的通知》。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指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一倍，全国的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点名人数，也允许把右派骨干总数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当时，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因为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 反对“党天下”的意见，被称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右派，认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高度赞扬歌颂中共的费孝通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经赞成高校党委制，也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有1500位青年教师和学生在反右中被开除公职和学籍，发配到荒原大漠。20年后，1500人又全部被“平反”接回北京。

曾经因为毛泽东的讲话而心潮澎湃的傅雷，命运又如何呢？1957年，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的暴风骤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批判傅雷。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精神极度痛苦。

《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分子”的认罪书，还刊载了他们互相揭发的文章，这样既分解了“右派分子”，也从道德上摧垮了他们。

政治“帽子”一旦扣上，这些右派便沦为政治“贱民”，按照罪行的轻重被依次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受到前两类处罚的人员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大批右派相继死亡。那些所谓的“极右分子”，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被划成右派的人遭批斗打骂，受尽屈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

至1958年整个反右运动结束时，共有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分子，占500万知识分子的11%，受到牵连的达几百万人。1979年，中共“改正”了552,877名“右派”，发现整错者达99.98%，但是对96人决定“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5人，还有地方级91人。

“右派”血泪

在反右运动中，甘肃日报编辑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

鸣受到牵连，成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二人一同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在十工农场，王景超到了夹边沟，在那里活活饿死。

和凤鸣在回忆录中写："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

当年头号学生右派、始终未得平反的林希翎说，当年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所以上当受骗，全是因为毛的号召。毛泽东让人们反对"三害"，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给党造成的极大的危害，说"你们应当帮助党整风，批判这些'三害'，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讲得漂亮得不得了"。

云南昭通的李曰垓，13岁参加"革命"，16岁被划为"右派"，从1958年元旦过后到1978年底，李曰垓总共度过了20年零8个月的劳改岁月。李曰垓恢复自由后，在网路发表专集《噩梦醒了吗》。他写道："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2007年6月6日至7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昔日的"右派"特地从中国大陆前往参加。

时年72岁的黄泽荣，笔名铁流，原《成都日报》记者。童工出身的他，15岁参加“革命”、追随共产党，是当年共青团系统三大右派之一，历经劳改23年。“划右”原因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他说，8800多字的作品，相当于为了写的每一个字，关了他一天。

黄泽荣说：“做右派的，都是讲真话，相信共产党的，有个人见解的。”他强调，下一代不能够再在“狼奶”中养大了，“现在对孩子就是不能够再接受这种谎话的教育，不能再吃狼奶。一定要在小时候就告诉他们历史，告诉中国发生了哪些事，什么叫反右斗争？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什么叫三反？什么叫五反？什么叫镇反？反胡风？”

黄泽荣表示，中国人至今还不敢讲真话，还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作为现在活下来的人，作为受害者，我们要把这个历史留下来，留给子孙，留给民族，留给世界，绝不让当局掩盖这个历史。”

时年74岁的任众说：“实际上我们对国家是负责任的，我们为国家提一提意见，能够早一点改进，国家更能够前进”，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全都成为“右派”和“阶级敌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参加会议的还有“右派”的后代，比如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黄炎培曾是中共大力统战的对象，利用他赢得知识分子的信赖。但是他的7个子女中，有5人被打成右派，其中两人被逼自杀。

与会的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余英时教授也做了发言。他说，中共第一次正式整知识人，是反右。“1949年（中共）一进了城，看你知识人就是次等人，或者是潜在的敌人。所以它绝对不会相信的，你怎么投降也没有用。它认为你口是心非，它认为你心没有交出来。所以后来一再要挖心，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2008年，一部四卷、120万字的《五七右派列传》问世，共有四百余篇、涉及1300多名右派的受迫害经历。作者申渊，本名陈愉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反右补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放逐内蒙古边疆劳动。

陈愉林说：他之所以要写右派历史，就是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共产党害怕的不是小骂它，它害怕的是说清真相。因为中共的政权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最怕人揭穿谎言。”

结语

著名学者胡平在《1957·苦难的祭坛》指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诬陷直至剥夺人身权利和拘禁。”

王世三在《反右运动之一：引蛇出洞》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打断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脊梁，不仅中国

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几乎丧失殆尽，而且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尊严也荡然无存。至今，‘反右’的阴影依然笼罩当下的中国，造成大陆知识分子难有担当，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犬儒主义者’及‘精致的利己者’。”

2006年的一个春日，林彪的长女林晓霖，致电其中学同学－－反右时期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林告诉章，她从黑市上购得章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林晓霖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其实，她不必说“我们共产党”，不可把自己和中共混为一谈。因为在中共发动的整人运动中，中共欺骗了太多的民众，包括数千万共产党员，还有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受害者。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他的人生何尝不是一个中共治下的悲剧？中华儿女，是炎黄后人，不是马列子孙。远离中共、抛弃中共，不要继续把自己和共产党捆绑在一起，才是对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章诒和在《五十年无祭而祭》中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回顾昨日，我们理应深思－－那一场灾难，引发的最大的悲剧，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让类似的悲剧，不

断重演？我们必须谨记，必须清醒地面对，过去的岁月，留给今天和明天的警示。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3）文革巨难

编写：高天韵

1949年，物理学家、留美博士饶毓泰先生，拒绝了南京政府的邀请，没有登上为著名教授安排的前去台湾的专机。他选择继续留在北大执教。

1956年，留美博士、力学家、计算数学家董铁宝携妻儿绕道欧洲、历时3个月回到中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校刊96期做了报导，写道："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7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1968年10月16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饶毓泰不堪折磨和迫害，在校内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上吊身亡。这位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先驱之一，被打成了"美国特务"、遭隔离审查。那天晚上，他离开了关押他的大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场十年"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多少大陆的科技和文化精英。当年，这些才华横溢的名流才俊，轻信了中共的宣传鼓惑，对红色政党心生幻想，对"新"中国充满期望。然而，在无情的政治风浪中，他们不仅报国梦碎，而且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最大的政治运动，灾难空前。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再一次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波受难者，遭遇灭顶之灾。毛泽东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表层的器物、古迹，到深层的精神、信仰，被彻底砸碎、摧毁。中共的谎言、暴力、强迫式思想改造，重创文化精英的肉体和灵魂，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灭顶之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516"通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直指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文化领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通知说："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1966年6月初，文革的旋风席卷了北京校园。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还号召"坚决彻底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挥舞棍棒，在一个月内打死了1772人，其中包括许多中学、大学的校领导和教师。“红小将”的暴力，得到了领袖的默许；“红八月”的得名，浸透着血腥和暴力。

“无产阶级的革命号令”响起，讨伐知识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展开。知识分子阶层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其它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惨烈的迫害轮番上演：口诛笔伐，批斗毒打，羞辱栽赃，下放改造。这些残酷的折磨令大批知识分子如堕深渊。他们百口莫辩，众叛亲离，无语问天。

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中描述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境地：“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批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的问题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即使在那些后来也被打倒的学校领导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积极领导过或参与过对后者的整治，有意无意地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从自己身边引开，引向那些既无任何党派庇护又无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分子身上。”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来羞辱知识分子，尤其可以来羞辱大知识分子。心术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目不识丁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口号，甚至知识分子自己也整起自己来。”

据单少杰记述，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他，在整“反动学术权威”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就有好几位教授从正对着这位教师家的一幢高楼上跳下来。“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学术名流尸横水泥地面的惨状和尸体旁的标语：‘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仅以北京大学为例，那里被关、被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上海市在1968年至1969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自杀的有10,000多人。有学者研究认为，“文革”初期就有20多万人自杀，其中知识界人士占相当的比例。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在谈话中炫耀：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王来棣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评说：“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

梦断家国

中共在夺权建政的过程中，依靠谎言和欺骗获取了许多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支持帮助。他们有的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从海外归国；有的拒绝了前往台湾的机票，义无反顾要为建设“新中国”效力。但是，中共领导人深知，中共的集团利益与知识界的自由理想不可兼容。对于知识分子，中共

始终心怀仇视，这种态度，源自其对于传统文化的恐惧。因此，在中共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摆脱不掉悲剧的色彩。

文革飓风里，梦想破灭、生命骤逝的故事，上演了千重万回。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之“士可杀，不可辱”的结局，是文革历史中异常凄凉的一笔。傅雷本是个体制外的文人，在书房内静静地翻译著书，却被卷进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他曾经努力地“跟党走”，试图跟上“反右”浪潮，自己却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革风起后，居委会和红卫兵都上门抄家，不仅没收了他的藏品和生活用品，还查到了荒唐的“反党罪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周围是“打倒傅雷”的大字报。9月3日，傅雷夫妇上吊自尽。

在《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傅雷的绝望心态。

“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是傅雷夫妇的最终抉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在文革中被处死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位音乐艺术家，只因为在会上直言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就被当作“反革命”关进监狱。陆洪恩多次被在“斗争会”上被侮辱和毒打，最后，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既无审判过程也无上诉手续。

陆洪恩被拘捕后，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受到株连。16岁的儿子陆于为被发配新疆，十三年后，陆洪恩“平反”，其子才获准返回上海。他说，父亲没有留下骨灰、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他一根陆洪恩用过的指挥棒。

沈元，1955年中国高考文科状元，历史学界的奇才。在反右运动中，沈元被划为“极右分子”，几经沉浮。文革期间，事业渐有起色、组建了家庭的沈元和妻子被红卫兵扫地出门，走投无路，四处躲藏。沈元后铤而走险，闯入某外国驻华使馆，欲求庇护不得。1970年4月18日，沈元以“反革命叛国罪”被枪决，时年32岁。

1980年，一张平反通知书送达沈家。沈母痛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

沈元的北大校友，郭罗基撰写了回忆北大反右运动的文章，题为“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

2007年6月22日，沈元的亲表哥沈君山在《表弟沈元》一文中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假若只允许一个人有大脑，有思想，无论这个人多么英明、多么天才，而不允许其他亿万人有思想有大脑，那不只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里的个人悲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无论人口怎么多，疆土怎么广，也只会是关闭的小国，因为没有敢思考能创新的气氛和人才，就不会有科学上文化上的突破，所以那个时代中国确实是翻了个身，把精英分子面朝上的翻成面朝下，却并没有站起来。”

四个“S”－－屈辱和灭亡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精神和体力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1967年，潘光旦病重。这时，老友叶笃义前来探望。潘对叶说，他在生活中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SURRENDER，SUBMIT，SURVIVE，即：投降、屈服、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吧。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SUCCUMB（死亡）。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重未得医治，在费孝通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王友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里记叙了这个故事。她分析说，这四个S，来自潘光旦内心深处的思考，不仅是对潘光旦教授一人，而且是对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

王友琴写："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做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冲破谎言 找寻良知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都在探讨极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反思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反思这个群体的各式表现，是此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

刘杰在《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失去良知》中说："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失了良知和诚信。"他写道："知识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暴虐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思想史：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

"文革"暴烈之下，知识分子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道出真相，慷慨赴死；有人为保气节，愤然自尽；有的忍辱负重，在悲苦中挣扎，还有人为求自

保，违心地揭发、批判他人，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观念。作为那场运动的亲历者，有些知识分子在事后选择遗忘，有人则以“宽容”的姿态表示原谅运动的发起人及执政党，也有人深刻自省，强调自身的良心“污点”，希望警示后人，警示未来。

许多人依然沉默，但是，终于有勇气的声音，打破了可怕的寂静。

关于“文革”，诗人邵燕祥在《人生败笔》的序言里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韦君宜在回忆录中检讨和剖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一条。”

作家巴金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

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革并未远去。对于持续十年之久、毁灭民族文化、扭曲几代人灵魂、颠倒黑白、泯灭良知的恶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明真相、汲取教训。在那场浩劫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丑剧、悲剧，留下了怎样的深刻教训？在恶意的挑动下，群众斗争群众，阵地和角色不断变换，今天的整人者，就是明天的被害者。揭发批斗，周而复始，“乐此不疲”。十六七岁的少年，被骗得失去了理智和同情，向自己的师长、向邻居挥起了皮带棍棒。

文化革命的红色海洋，写满了愚昧、无知和疯狂。为什么，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知识、尊严和生命变得一钱不值？为什么，在动乱之后的四十年，“文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禁忌？无数历史的碎片，沉积在民族的书简里，等待更多的破译和记忆。

反思，因为昨日和明天；反思，纪念逝者，警醒生者。今天，红色的谎言仍在缠绕，禁锢灵魂，阻碍自由。反思，需要面对事实、剖析自我的勇气，需要以智慧去辨识真伪，以良知拥抱真相。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4）自由有多远

编写：高天韵

在过去的68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痛苦的见证人和承受者。这一个群体，历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窒息在思想钳制的压抑中，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暴力和谎言的高压下，大陆的士人阶层，不幸地从整体上沦为极权专政的工具，失去了舍我其谁的自由捍卫者的精神。"犬儒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套在象牙塔外的标签，透着不堪和尴尬。在他们当中，那些敢于挑战虚伪和压迫的勇者，相继被写进黑名单里，被扣上种种的罪名、遭遇各种形式的迫害，被挤到了社会的底层、边缘。

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主题是"自由是一种责任"。张教授说："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他还说："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

北大校友、作家刘震云也在典礼上讲话，他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本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自由，到底有多远？未来，要如何照亮？

血的教训

在"反右"和"文革"两次大灾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大陆的政治氛围又一次出现松动。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当"后勤部长"。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渐渐地，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趋向缓和。

陈奎德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论述道："邓小平时代，为了拯救即将崩溃的经济，为了挽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开始，中共曾经有限地向知识界、向社会做出一些让步，在经济上也对国人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做了一些让步。于是中国开始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在一短暂的时期内，以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恢复高考、允许西单民主墙存在以及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承诺要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为标记，中国知识界与中共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

在这期间，许多大陆知识分子从"反右"和"文革"的痛苦中慢慢起身，他们痛定思痛，反思反省，决心说真话，开辟新的世纪。1979年，作家李准在《文艺研究》上著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他的话代表了一代文人的心声。

然而，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变了面目，走到了尽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当局直接动用武力镇压手无寸

铁的平民，震惊中外；倒在“人民”军队枪口下和坦克履带下的，是争取民主、呼喊爱国口号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市民。

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算账”即刻开始。中共国家安全部及公安部在全国通缉方励之夫妇、王丹等21名学生领袖，首都23名知识分子及工人领袖。陈奎德评说：“所有表演的那些‘宽松’，其实都是中共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前戏’。”

在严打之下，一批倡导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些人身陷囹圄，有些人停止奋战，臣服于暴政。血淋淋的恐怖，湮没了原本强劲的民主之声，也令许多人认清了中共的残暴，放弃了幻想。良知的坚守并未绝迹，但是，夜幕，确实更加沉重。

包遵信，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80年代初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他因为支持八九民运于1989年6月被捕，被控“反革命宣传罪”，1991年1月26日被判刑5年，1992年11月25日获假释。出狱后，包遵信在研究、写作之外，一直参与维权活动，2007年10月28日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著名记者和作家高瑜，在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后该报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获释。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11月9日，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1999年2月15日，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92年1月中被捕，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以及支持学生运动，1992年7月21日被判刑7年，剥夺公民权利2年。1996年5月28日，鲍彤出狱，但一直受到严密监控。

张显扬，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后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后获释。

1989年，33岁的吴仁华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曾经亲历“六四”凌晨的血腥清场，目睹学生惨死和被坦克碾断双腿。吴仁华后来辗转流亡美国，28年来，他致力于追查当年的涉事者、受难者和被捕入狱者的名单和情况。

吴仁华认为，对于亲历当年惨剧的人来说，“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他问：“‘六四’，过去了吗？”

新的罪恶

枪声过后，中共的罪恶并未停止。坐在火山口上的专制政权，一直将“维稳”的机器指向善良的民众，压向一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中共暴政，漠视生命，践踏才华。

2007年，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希翎历数中共的邪恶“运动”。她说：“反右运动以后，接下来的大字报运动、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运’，一直接下去的镇压法轮功啊，当前对国内维权律师和人士的镇压，都是一脉相承。”

大陆的维权律师群体，汇集了法律界的精英。他们凭着道德良知，以优秀的业务知识努力去实践司法公正，为百姓谋福。然而，中共容不得对法治不公的挑战，多年来当局通过各种非法、卑鄙的手段，对这些律师进行疯狂迫害，谎言构陷、骚扰刁难、侵权折磨，并且株连他们的亲属。大批正义律师所遭遇的无理打压，引发各界关注，令人义愤难平。

封锁之下

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中写道：“中国史上有一种突出现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愤而挺身过问世事，甚至世道越为黑暗，成仁取义之士越发汹涌，不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仆后继、慷慨赴难。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从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为教育保留一块相对纯净的天地、一块以孔圣人为尊的天地。”

可是，中共的统治，将民众陷入了共产“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全民被强制接受“党文化”洗脑，只准信马列，不许谈自由。在暴力和谎言的包围下，知识界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纯净的天地。

陈奎德分析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江泽民政权改变了对知识界的策略，“重点从防范打击变成拉拢收买，和80年代相当不同，除非坚持批判立场的极少数，才对之打击。于是，知识界的精英，包括本人的一些朋友们，不少都拥有了高职厚爵，养尊处优。社会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小，逐渐地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大说话了。堂皇的解释是回归学术领域，实际上就是不愿意甚至无勇气对公共事务发言了”。

诗人黄翔在10年前撰文说：“当下，人们仍然置身在一个持续绵延‘思想禁锢、资讯封锁、精神闭塞’的社会环境中，精神视野天然受到局限。人文意识人为受到制约，普遍难以跳出先验性的‘体制性思维’，更何谈折除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为框架？！……学术界面对诸多历史课题众说纷纭中少有独立言说，而难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学界的许多人无奈如此，海外为求‘自由出入中国’研究汉学者中，也难免有人传染‘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综合症’。”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提到，共产党现在对付知识人的另一个办法是腐化你。“只要不谈政治，不推翻我政权，做什么都可以。那就整个社会腐烂下去就是了。没有精神力量了。”他因此说，中国的前途要每个人担负起来才行，不能眼睛看着共产党改革，那是幻想。

2004年9月初，《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名单。该周刊呼吁，目前最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发出声音。结果，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就是挑拨中

国知识分子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此可见，区区50名公共知识分子就触动了中共的神经，中共不惜用文革式手法来压制更多公知的出现及更大的民间呼声。

2009年12月，北京一个网上读书会评选了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蒋彦永、高瑜、杨继绳、茅于轼等著名学者、教授及维权人士。北京警方进行干扰，迫使组织者取消了发布活动。

2009年的最后一天，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忽然发现，自己“被不上课”了。原来，校方以“介入公共事务太深”为由暂停他的教职。

2017年5月2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媒体表示，他被中共噤声。他的两个博客网站、一个微博和两个微信账号，均被关闭。贺卫方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坚持利用网络空间倡导法治，倡导中国走宪政民主之路。

纵观当下的大陆社会，教育腐败，学术舞弊，乱象丛生，邪气盛行。那些秉持道义原则、坚守良知的中流砥柱者，饱受打压，在狭窄的空间里，在恶劣的条件下，艰难的前行着。要想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须得扛的住磨难，肯为“真”字付出所有。

觉醒的心

虽然中共暴政打弯了许多人的脊梁，但是，在严苛的环境中，希望的火种总会燃烧，勇敢的心永远跳动。

1960年，林昭被捕入狱。她用鲜血写下了控诉："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

1992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在受访时说："共产党这个组织，却是一种邪教，一种巫教式的邪教。这种邪教把领袖作为神，它的信徒在被领袖整死的时候，还要求平反，要求恢复党籍——自己的邪教身份。政教合一，使得这个邪教造成的灾难变成了全国性的。"

著名民主人士王若望早年投奔延安，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已经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后来，王若望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4年。在71岁时又因"六四"入狱，一年多后获释。

1993年，王若望说："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就是对中共的顽固本质缺乏理解的表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特别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上万学生苦苦哀求（有一帮人是长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脑接受最起码的和解条件，而回答学生们的请愿是坦克、是机关枪的大屠杀。"

希望之灯

延安圈套、“反右”文字狱、思想改造运动、“文革”的文攻武卫、“六四”的坦克冲锋枪，惨烈事实似已成过往。而这些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却难以平复。中共的愚民洗脑、资讯封锁、暴力压迫从未停止。68年来，中共不断地吹嘘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保护，也曾一次次许诺民主与自由，而现实却是由鲜血和恐怖构成。回顾与反思，于苦痛中探究真相，拒绝遗忘，冲破谎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前，范仲淹的抱负与嗟叹，穿越千年。今日，大陆知识分子因着不同的选择而站到了不同的队列：有的附庸“喉舌”，见利忘义；有的埋头学术，不问世事，有的坚守原则，与当局“死磕”……他们以各自的言行完成历史对个体的检验，写下人生的答卷。

追求思想的自由，在自由中构建梦想、创造文明的果实，关注社会人生，实践“士”民的使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操守与境界。这一份境界的纯净和光明，不仅能丰富人生，也必将照耀世界。希望的灯，由智慧点亮，因勇气而长明。

（引文结束）（以上引文有删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钱学森等人、原子弹、火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5%AD%A6%E6%A3%AE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男，浙江临安人，生于上海，中国空气动力学家和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前美国空军上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级文职干部、一级英雄模范，中国科学院院士暨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美两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都做出过重大贡献，1991年被中国政府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被中国政府评为“两弹一星元勋”。与钱伟长、钱三强并称为“三钱”。

钱学森1935年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公费赴美进修，1936年起师从西奥多·冯·卡门；1945年被派赴德调查纳粹德国火箭科技；1955年以朝鲜战

争空战中被俘的多名美军飞行员交换回中国大陆。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是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此外，钱学森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位列国家级副职党和国家领导人。

生平

早年

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出身于吴越钱氏家族，是五代吴越国国王钱镠的第33代孙。父亲钱家治。1914年父亲钱家治到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迁居北京宣武门外。

1918年入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1年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院第一附小。1923年入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附中。

1929年秋，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路门，攻读蒸汽机车工程。1930年，钱学森被诊断染上伤寒，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接受中医与气功治疗，并且因此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8月，赴国立中央大学参加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考试。10月成为20名留美公费生之一。

1935年，在清华大学导师空气动力学教授王士倬指导下到南京的航空工厂和南昌的航空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决定未来留美的学习方向。王士倬原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议钱学森入麻省理工学院进修空气动力学。

赴美留学进修

1935年9月，钱学森等20名庚款留美公费生，从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国西雅图。

193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求见空气动力学权威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征求进修意见。冯·卡门建议钱学森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进修。同年秋，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师从冯·卡门。

1938年至1941年间，钱学森和冯·卡门多次合作，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边界层》[9]、《球面壳在外压下的屈曲》。

1939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8月，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音速流》阐明压力修正公式，后被学界称为钱-卡门公式。

1940年，加入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制组，研究火箭固体燃料、结构屈曲等课题。

1940年，参与风洞研制；发表论文《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1943年，发表论文《论风洞的汇聚风斗之设计》。

1943年秋起，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1943年，美军情报部门探知德军正在德国境内建立大规模的火箭发射基地，火速拨款成立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缩写为JPL），下设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钱学森任喷气研究组组长，成为世界知名的火箭喷气推进专家。

1944年美国国防部聘冯·卡门为美国陆军航空军顾问，草拟未来20年美国太空研究的蓝图。冯·卡门特约钱学森到华盛顿参加他领导的美国战争部科学顾问小组。1944年冬，钱学森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的各项职务，到华盛顿参加战争部科学顾问组。

1945年4月，美国战争部派遣以冯·卡门为首、团员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调查组，飞往盟军占领下的德国，询问德国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亲自询问德国火箭科学家包括华纳·冯·布朗、鲁道夫·赫曼。冯·布朗应钱学森的要求，写出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钱学森还视察隐蔽在不伦瑞克市郊松林中德军机密的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和德国其他地方的风洞，撰写多份报告。冬，钱学森由助教晋升为副教授。

1946年发表论文《超等空气动力学，稀薄气体力学》，主编《喷气推进的新天地》论文集。

1946年8月，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教授，辞去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所有职务。1947年5月，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9月，与声乐家蒋英在上海结婚。

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钱学森总共带了11个研究生，其中有2个博士生，分别是：

Mack, Leslie M.（1950）Sc.D.

Shen, Shan-Fu.（沈申甫）（1949）Sc.D.

1949年夏天，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名誉讲座正教授。同年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并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领导美国太空火箭的研究。同年设计了一种12马赫高超声速火箭飞机，即“钱学森弹道”。

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钱学森总共带了11个博士（Ph.D.）研究生，

其中有6个博士生，导师只有钱学森一人，分别是：

Hartlieb, Robert Joseph (1956)

Kerrebrock, Jack L. (1956)

Serdengecti, Sedat (1955)

Cheng, Che-Min（郑哲敏）（1952）

Rannie, W. Duncan (1951)

Lo Chih-Chun（罗时钧）（1951年1月1日答辩）

与其他导师合作培养的博士生：

Marble, Frank E. （第一导师为冯·卡门）

Monroe, Gerald M. (1951)

Chang, Chieh-Chien（张捷迁）(1950)，第一导师为冯·卡门

Fejer, Andrew (1945)

Yuan, S.W.（袁绍文）(1942)，第一导师为冯·卡门

移民监狱关押

1950年7月，美国军方致信钱学森，取消其接触军事机密研究的资格

由于当时冷战开始，加上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共思想高涨，而联邦调查局又从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曾与周恩来特使接触以及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美方禁止其参加机密工作。钱学森无

法继续他的研究。两星期后钱学森告知学校其去中国探亲之意愿，学校并无异议且愿意配合。但是当时海军部次长丹·A·金布尔知道后，认为以钱学森涉及美军机密工作之深，在当时中美苏关系恶劣状况之下，应设法劝阻其访中为宜。联邦调查局仅凭钱学森早年参加过的共产党组织社交餐会出席人士名单，指控他在入籍申请中故意否认曾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不报。司法部藉“伪证”罪吊销他的机密工作许可并将他驱逐出境。美国司法部于1950年8月30日起钱学森临时拘留在特米诺岛监狱里15天。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很快被取保候审。为了确保自己人身自由得到合法保障，钱学森重金聘请纽约市知名辩护律师格兰特·古柏代表出庭，与美国移民局展开了长达5年的法庭斗争。

1951年4月26日，钱学森被禁止离开洛杉矶县。

钱学森的上诉案件直到1954年才被判败诉。在上诉五年期间，钱学森只能涉及一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与教学。联调局认为钱学森所知的机密信息五年后就会变得过时而没有用处。他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钱学森后来幽默地说，“不让我做研究，我会在这里（用手指头）发展”。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钱获颁杰出校友奖受到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该奖项后于2001年由加州理工学院好友法兰克·马波（Frank E. Marble）教授及夫人送达钱学森家中（马波教授于1955年钱学森离美时亲自去洛杉矶港口送行，而钱也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发誓再也不来美国）。《航空周刊》在提名钱学森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时的专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也大致吻合。

交换归国

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及归化局致信钱学森，取消对他的禁令，允许其离开美国。

早在1949年5月14日，在香港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曹日昌（中共党员、香港大学教授）给钱学森写了封信，通过葛庭燧（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寄给钱学森。曹日昌在信中以“北方工业主管人”的名义邀钱学森回国到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1955年，在中美两国政府长达数月的日内瓦双边会谈之后，钱学森被美国政府释放，用以交换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11名美国飞行员。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美国总统轮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的克利夫兰总统号（SS Pres. Cleveland，以格罗弗·克利夫兰命名），当时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10月8日抵达香港后从九龙车站前往中国深圳，当晚抵达广州，10月12日至26日在上海停留，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

从1955年10月到12月，他先后在北京、东北参观各个科学研究所、高等院校、生产工厂，摸清了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基础。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获得批准访问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第一任院长陈赓大将从北京乘坐飞机前往哈尔滨亲自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工。考察参观期间，陈赓与钱学森关于中国能不能研制导弹，发生了一段对话

“陈赓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豪气顿生：钱先生，我要的就是您的这句话！”

1956年元旦下午三点，钱学森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字，并预言导弹战将是未来战争必定出现的场景，他同时建议中央军委组建一支专门的导弹部队。

1956年2月16日，钱学森受周恩来、陈毅接见，周恩来委托他起草一份导弹研制方案，在场的还有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杰。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任务，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并提交给周恩来。2月22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2月28日，周恩来又将《意见书》批给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及中央军委各委员。《意见书》很快投入实施，实际上成为中国导弹研制工程的指导方案及技术文件。

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1956年，钱学森与钱伟长、郭永怀等创建、主持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任首任所长，这是钱学森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按照《意见书》的建议，1956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

局），作为研制导弹工作的领导机构。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院长。1957年3月，中央军委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并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意见书》还提出了详细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意见书》中列出了一份“高级人员”名单：空气动力学：沈元、陆士嘉、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潘良儒；航空结构：王俊奎、钱伟长、王仁、杜清华、胡海昌、钱令希、郑哲敏、李敏华、范绪箕；推进机：吴仲华、陈士祐、梁守槃；控制机：罗沛霖、林津；火箭：任新民。同年9月7日，钱学森以科学技术顾问的身份跟随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有李强、刘杰、万毅、刘寅、王诤、张连奎等，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同苏方进行谈判。期间，钱学森与苏联科学家进行讨论，全方面了解了苏联火箭导弹的概况、计划规划、组织体制和人员结构，在苏联科学院作了学术报告。

1958年，钱学森与中国科学院同事共同倡议并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9年8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东风-1短程弹道导弹（地对地）发射成功。1965年人造卫星工程开始实施。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67年，冯·卡门在出版的自传中特辟一章：“钱学森与红色中国”。
冯·卡门对钱学森的评语是：“美国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的杰出学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学森全家离开中关村，搬到了北京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使钱学森在“文革”期间避免受到冲击，得到保护。

1965年，国防部五院脱离军队系统，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

1966年8月至9月间，各地发生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当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红卫兵开始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钱学森得以幸免。

1967年1月，发生“七机部夺权事件”，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领导人是叶挺的儿子叶正光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就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

1968年起，许多中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波及，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年6月8日，七〇三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造反组织“九一五”的人用钢管打死；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他于1968年10月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而死。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于1966年即开列了一份包括部分重要科学家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1969年，钱学森父亲钱家治逝世。钱家治当时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当年逝世。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如期发射成功。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即文革中的“庐山会议”，开幕第二天钱学森在华北组发言，会议讨论林彪开幕式的讲话。他的发言被写进“第六号简报”。不料这份简报被毛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他的发言内容是关于国家主席的存废问题：“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赞成这个建议。主张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职务的毛泽东要求发言犯了错误的人都要作检查。

1971年9月，发生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之后钱学森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起来。

1975年，钱学森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发表大字报批判上司张爱萍、导致后者心脏病突发住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又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晚年的活动及成就

1979年，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授予“杰出校友奖”。

1986年6月27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钱学森为科协主席。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之际，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钱学森五人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

1991年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迄今唯一一人）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6年4月8日，交通大学建校百年典礼上，唯一经钱学森本人同意，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馆名的钱学森图书馆在其母校西安交通大学落成揭幕。

钱学森获得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证书，原件现藏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1999年9月，与钱三强、邓稼先等共23人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后来引发教育界广泛热议的“钱学森之问”。

2006年10月，与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共5位专家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2008年9月13日钱学森塑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成。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逝。

纪念

小行星3763被命名为“钱学森”。

钱学森科技大学

2020年，湖南省政府发布《湖南省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其中提出推进在浏阳市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暂命名）。

钱学森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2016年成立）

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2017年成立）

南昌理工学院钱学森学院（2019年成立）

钱学森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2011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之际，位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钱学森班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实验班（2007年成立）

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2009年成立）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钱学森实验班（2009年成立）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创新拓展班（2010年成立）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班（2013年成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钱学森空间科学实验班（2014年成立）

钱学森学校

北京十二中钱学森学校，2018年9月1日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为荣誉校长。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2019年在开建，预计2021年建成，为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

广宁钱学森学校，2019年建成，十二年一贯制民营学校。

家庭

父母

钱家治

夫人

蒋英，著名歌唱家，中华民国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第三女

子女

子钱永刚：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高级工程师，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娶开国少将傅崇碧之女傅雅丽（又名黎力）。

女钱永真：1950年生。1968年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罗舜初报请周恩来批准，安排参军到国防科委某疗养院服役。后为儿科医生。

孙

钱磊，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参谋

其他亲属

钱学榘，钱学森堂弟

钱永佑，钱学森堂侄，神经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钱永健，钱学森堂侄，钱学榘之子，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轶事

军衔

在美期间曾被授予美国陆军航空军上校军衔。1956年中苏就火箭技术谈判时，则经毛泽东批准被临时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

争议

"万斤亩"公案

钱学森在1958年大跃进时，自己不是农业家，也并没有认真具体去试验，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地种出亩产万斤，而是在假设，在《中国青年报》将他在一次"科学与人文"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的

《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整理成《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发表，文章中表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假设植物光合作用30%的效率可以达到，并假设植物中的1/5能转换为可吃的粮食，认为只要必需的水利、肥料、劳力等等条件能满足，那么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达到“2000斤的20多倍”。有人认为，这些论述为放卫星提供了“科学论证”，并影响了最高决策。李锐《反思大跃进》曾记载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钱学森后来辩解称他所提出的产量数字明确指“计算的单位面积年产量，无论粮食或是木材都是理想的极限量。要接近这个指标，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

钱学森在1993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辩解，“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并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是能够实现的。

支持“人体科学”研究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各种特异功能、灵异事件、气功在民间以及政界、科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力。1980年6月，钱学森在《自然杂志》明确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人体特异功能太不寻常了，恐怕能接受的人是少数。更大范围的是气功，能治病，人家容易接受。虽然特异功能可能一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气功可以。”为此，他与反对特异功能和气功的于光远等人发生激烈争论。

1982年4月20日，鉴于“耳朵认字”等事件持续发酵，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介绍、不批评”的“三不政策”通知。同年5月5日，钱学森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说，“我以党性担保：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

1983年钱学森首创“人体科学”的概念，并筹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而在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一百个当中有一个人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这就是一件大事。”他认为气功可以提高健康水平，又可以提高智力，而且可以调动人的先天潜能。1990年，钱学森在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提出“人体科学”研究要重视临床医学、西医、中西医结合、民间医学、心理治疗、气功、特异功能等七个方面。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回忆，他在中央发文号召反对伪科学后，才于1995年以《“超人”张宝胜败走麦城》一文发表《科技文萃》上，而文中提到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在1988年5月就已经做出。而他之所以不在当时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因为不想得罪钱学森，让他难堪。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5%BD%88%E4%B8%80%E6%98%9F

两弹一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两弹一星工程的主要负责人。1960-197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成功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1964年）、试射了第一枚装载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1966年）、试爆了第一枚氢弹（196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70年）。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期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而其研发过程中科研人员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为之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0年代-1950年代，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留学海外的科研工作者陆续回到中国大陆。1956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颁发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开展两弹一星的研究，早期苏联方面也提供了重要协助，但同年毛泽东等人发起的“大跃进”直接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据估计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中苏交恶后苏联方面也撤走了所有资助，这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是否继续发展两弹一星的分歧。最终，中共中央于1962年11月成立了

“中央专门委员会”、专门负责国防尖端事业的决策和管理，周恩来担任委员会主任，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也继续进行、由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人直接领导。

1964年10月16日，596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6-1970年间，中国的核导弹、氢弹、人造卫星相继问世，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但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些项目的研制以及中国后续的科研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内，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在内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等人主导了拨乱反正，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并恢复名誉。1986年，四位两弹一星元勋致信邓小平，促成了中国的“863计划”。

名词含义

关于两弹一星的内涵，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核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历史概况

早期筹备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主持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中提到：“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召集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最终于1956年12月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

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1958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个大的。"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而苏联方面从1955年起也提供了重要协助。

反右运动、大跃进及中苏交恶

1957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发动了"反右运动"，至少数十万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中"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被划为极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迫害，也因此失去了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机会。1958年起，毛泽东等人又发动了"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造成了1959-1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据估计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此期间，钱学森在《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等杂志上发文迎合大跃进，尝试科学论证此次运动"高指标"、"浮夸风"目标的可行性，对大跃进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与此同时，1958年7月31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他认为中国无需发展核武器，同时反对中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遂与毛泽东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交恶；1960年7月前，苏联方面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相关资助。

1961年起，一系列不利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是否继续发展两弹一星的争论和分歧，其中聂荣臻等人主张推进两弹一星工程。1962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人同意，批准了原子弹计划的继续进行。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也得以继续、由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人直接领导。

里程碑事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代号“596原子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2）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7年6月17日第六次核试验中引爆了自行研发的类似美国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多级热核炸弹，与第一次引爆裂变弹相距仅32个月，是从裂变（原子弹）到聚变核弹（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引爆的核弹当量331万吨。有一些中文资料中的片言只语显示，中国当时采用了同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略有区别的于敏设计方案（设计全重为一吨左右，

爆炸当量百万吨以上），这个方案的要点在于使用X射线透镜而非X射线反射镜来实现从初级到次级的能量传送，即“球柱球结构”。

文化大革命冲击

文革期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1966-1976年间，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两弹一星以及中国科研的后续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部分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众多科研工作者受到政治迫害，许多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截止1971年9月13日，中国位于青海省的核基地内，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批判和贬低，甚至被称为“臭老九”。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家人、 “氢弹之父”于敏及其家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迫害。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下放到了陕西的五七干校。

另一方面，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受到了周恩来的庇护，周恩来于1966年8月特别列出了一份名单交由毛泽东批准，其中被点名保护的人物因该名单而免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直接批斗与人身攻击。对于其中被保护的科研人员，

周恩来强调：“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期间，钱学森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维护，并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发表大字报批判上司张爱萍、导致后者心脏病突发住院。

拨乱反正及后续

1967年人民画报。氢弹成功被描述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取代时任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为姚桐斌、赵九章等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两弹一星元勋平反，并将姚桐斌追认为“烈士”。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并恢复名誉。

改革开放时期，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曾向邓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个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议，该提议获得了邓的认可并很快得到落实，全国的教授（其中有许多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科研人员）从那时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额外补贴。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两弹一星元勋”致信邓小平，促成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

两弹一星元勋

1999年，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此23位科学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

==

==

==

==

==

==

==

==

==

==

==

==

==

==

==
===

在此期间的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大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F%BA%E7%9D%A3%E6%95%99%E5%8F%B2

中国基督教史

“基督教”在中国有两个意涵。一则是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另一则是口语习惯上的专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本词条指的是前者。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

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而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公元635年，唐朝初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初次来到中国。

唐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其实是来自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他们的主要工作有：兴建修道院、翻译圣经还有出版一些信道基要的书籍。唐太宗御赐"阿罗本"名号，意思是"上帝所差遣来的"。不过，此时的景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影响力，这是有两大原因：第一，内部的争斗，以致福音不能继续有效的传播。第二，只与社会中的高层人士往来，并未普及深入民间，而且没有建立当地的同工，以致于与民间的关系距离遥远。天宝三年（744年），大秦国教士佶和来京行道。唐肃宗令灵武等五郡，重建教堂。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终止了传播。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大主教阿多爵统理中华、印度两国教务，派教士东来，建教堂传教无阻。

元朝

聂思脱里派获得恢复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景教徒数量回升。马可·波

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两部族信奉景教。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大都、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叶尔姜、依犁，江苏扬州、浙江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元世宗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是景教徒。

天主教开拓东方

1243年，教宗意诺增爵四世派西班牙方济会会长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到蒙古帝国传教，于1246年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

1243年同年，教宗还派方济教士罗兰，道明会士安息灵二位传教士到华南传教。但二人未成功到达。

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修士吕柏克（鲁不鲁乞）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吕柏克到达和林晋见蒙哥。

马可波罗与扫马

1265年意大利天主教基督徒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派遣他们回报圣座，请圣座派遣传教士来元帝国。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家乡，教宗克莱孟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不久教宗额我略十世当选，派遣两名道明会修士伟立尔莫、尼格老跟随波罗兄弟前往元帝国。尼古拉·波罗还带上了他的15岁的

儿子马可波罗。两位教士半途而返。1271年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带着教宗给元帝国皇帝的信动身，于1275年再次回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多年之后，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遐想。

1287年来自元朝的景教徒扫马代表蒙古伊儿汗国出使欧洲，1288年抵达罗马，拜访教宗，并接受了教宗尼各老四世致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1289年扫马返回伊儿汗国。扫马对圣座的访问，促成尼各老四世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

方济会进入中国

1289年，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天主教方济会神父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47年－1328年）为北京的主教，隶属各省主教7人。他从伊儿汗国走海路，途径印度，1291年抵达中国泉州，于1294年进入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成宗铁穆尔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1299年和1305年分别在大都建成2个教堂，有三万余人入教。

1303年，阿诺德·冯·科隆（Arnold von Koln）到达大都协助孟高维诺。

1313年，圣座派遣方济会修士日辣多（哲拉多·阿布意尼）等七人前往中国，其中1人留在途中传教，3人死于印度，到达中国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斐莱格林和安德鲁留大都传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国建立了大都和泉州两个主教区。

1322年，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和德理）从意大利抵达中国旅行。经泉州入中国，游历福州、杭州、金陵、扬州、明州、北京等地旅行，取道西藏回国。后在病榻上口述东游经历，由他人笔录成书《鄂多立克东游录》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会修士尼古拉为北京主教。

1338年，热那亚传教士安德鲁作为元帝国使臣出使欧洲，前往阿维侬拜见教宗本笃十二世。随后本笃十二世派遣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为使臣，率领修士团五十余人来华。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北京，晋见元顺帝[8]。1345年，马黎诺里返回亚维侬。

元末基督教被摧毁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亦思巴奚战乱中被杀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灭亡时，再次中断。

明朝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纳瓦拉（今西班牙境内）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大陆的许可，带着遗憾死在了岛上。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道明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1520-1570） 抵达中国澳门。1570年他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在欧洲出版。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

登陆中国

万历三年（1575年），奥斯定会西班牙籍修道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年6月30日－1578年6月）在中国厦门登陆。

万历六年（1578年），驻澳门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传教需要改变策略，于是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

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并希望他们今后传教时得到中国官员的支持。这里面就有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巴范济（Francois Pasio）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万历七年（1579年），罗明坚到广州，后返回澳门。

万历十年（1582年），罗明坚和巴范济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第二年利玛窦也抵达肇庆，使天主教在中国大陆得以立足。

万历十三年（1585年），范礼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国教区区长，潜入肇庆居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郭居静来华。意大利籍教士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年－1654年）来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首次进京，但是未能立足，返回南方。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庞迪我来华。

利玛窦永驻京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庞迪我携带大量礼品再次进京觐见明神宗，终于获得在京永驻的许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青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获教名保禄（Paul）。

1605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óis），从印度出发，经古丝绸之路，经过四年长途跋涉，于1605年抵达中国肃州，因劳累死在那里。他的日记被利玛窦整理发表，证实马可波罗描述的契丹就是中国。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熊三拔来华，协助“钦天监”

修订历法。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之藻1610年在北京受洗。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接任，他对利玛窦宽容中国教徒尊孔敬祖表示不满，这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开始。同年耶稣会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来华，抵达南京跟随高一志、郭居静学习汉语。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抵达澳门。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杨廷筠在杭州受洗。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毕方济抵达北京。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国泉州传教。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南京教案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发生南京教案，许多天主教传教士被驱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跟随金尼阁抵达澳门。

天启二年（1622年），耶稣会德意志教士汤若望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do 1594-1642）来华。明熹宗敕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军用铳炮[2]。

天启三年（1623年），意大利教士艾儒略、毕方济奉召至京。

天启四年（1624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伏若望（Jean Froes 1590-1638）来华。

天启七年（1627年），汤若望被派往陕西传教。

崇祯二年（1629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瞿西满（Cunha, Simão da 瞿西满, 1589-1660）来华。

汤若望与《崇祯历书》

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第二次来到北京，奉召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十年（1637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利类思来华抵达北京，1640年应东阁大学士刘宇亮邀请赴四川成都绵竹等地传教。

崇祯十三年（1640年）耶稣会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来华，抵达杭州，1642年前往四川。

崇祯十六年（1643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卫匡国来华。

天主教与明末动乱

天启二年1622年，18岁的郑芝龙在澳门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Nicolas。

崇祯十三年（1640年），耶稣会德国籍教士瞿安德（Fr.A.X.Koffler 1615-1651） 来华。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汤若望留京未受虐待。清军入京之后，汤若望继续被留用。

崇祯十七年（1644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成都入张献忠幕僚，后被清军俘虏押往北京。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耶稣会波兰籍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 ）来华。

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瞿安德在南宁为王太后、马太后、王皇后施洗入教，后又为皇三子朱慈炫（后被封为太子）施洗，教名君士坦丁。

永历四年（1650年）十月，传教士卜弥格作为南明皇帝的使者与南明官员陈安德出使圣座和西欧各国。

清朝

圣座在华设立宗座代牧区

顺治五年（1648年）1月15日，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在福建福安湖山被斩首处决。

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帝颁布容教敕书。

顺治八年（1651年）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

顺治十三年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上赐御书堂额“通微佳境”敕悬宣武门天主堂，又御制《天主堂碑》。

顺治十五年（1658年），诰授汤若望光禄大夫，并恩赏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顺治十六年（1659年），耶稣会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跟随卫匡国同船来华传教。

顺治十六年（1659年），圣座成立传信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以图替代原来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控制的保教区（Padroado）。

1659-1660年，圣座传信部分别成立了东京宗座代牧区（越南北部和老挝、中国云、黔、湖、桂、川等地）、交趾宗座代牧区（管越南南部、中国粤、闽、浙、赣等地），和南京宗座代牧区（管苏、豫、鲁、晋、陕和东北、朝鲜等地），由教宗直接任命“宗座代牧”。而在此之前，前往中国的传教士都是分别从澳门（耶稣会）和马尼拉（方济各会、奥斯定会、道明会）派出的。

汤若望的历狱

康熙五年（1666年），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书《辟缪论》，诬告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时宪历》十谬，为七年前入葬的荣亲王的入葬时间和地点“俱犯杀忌”。顾命大臣鳌拜也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收押狱中，并株连许多在华传教士，史称“历狱”。

中国礼仪之争

崇祯四年（1631年）1月2日或3日，受西班牙国王保护的道明会的高奇神父（Ange Cocchi？－1633年）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并对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表示不满。

崇祯六年（1633年），道明会传教士黎玉范（P. Juan B. Morales）和方济会传教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FM，1602-1669）到福安。

顺治二年（1645年），接替高奇神父的黎玉范神父（Juan Bautista Morales 或 Jean—Baptiste Moralès1597-1664）特意赶到罗马向圣座报告耶稣会的行为，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公开化。

顺治七年（1650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委派卫匡国赴圣座，陈述耶稣会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获得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的理解。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1667年，因“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教宗于1656年的裁定。

康熙九年（1670年），方济会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Augustinus A. S. Paschali）来华。

康熙十五年（1676年），教宗克莱孟十世任命中国籍传教士罗文藻担任南京宗座代牧区代牧。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教，也是1926年以前惟一的一位中国籍主教。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等五人来华。在北京建立法国耶稣会。该会成员大多反对所谓“利玛窦规矩”。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传教士徐日升、张诚被任用为译员。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索额图和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等人的游说下，康熙连下两道谕旨，礼部即奉旨依议：“……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明确表示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天主教教义，中国老百姓也可以领洗成为天主教基督徒这被传教士称之为“基督教宽容敕令”。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宗座代牧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引发圣座与清王朝的对抗。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为使臣出使法国。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到中国澳门传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开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务。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莱孟十一世（1700年－1721年在位）发出禁约，正式禁绝中国礼仪。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教宗代表铎罗来华发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国教徒敬拜祖先，再度引发中国礼仪之争，康熙帝为澄清真相，派遣艾若瑟出使圣座，中国教徒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圣座将福建传教区交给反对中国传统礼仪的道明会，耶稣会撤离福州。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传教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历时11年，绘成《皇舆全览图》。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教宗克莱孟十一世颁布“自即日起”通谕，重申1704年禁令。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圣座为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Jean Ambrose Charles Mezzabarba）主教来华，重新禁令。康熙帝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详为解说供牌及称天为上帝意义，并说“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

雍正元年（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上疏请将各省西人除晓通技艺者外，余俱送往澳门安置，改天主堂为公廨，严禁入教，获准。天主教正式被禁。

天主教进入西藏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至乾隆十年（1745年），天主教嘉布遣会（Capuchin）修士定居拉萨，后被驱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从印度进入拉萨。1721年他被嘉布遣会修士排挤出西藏。

雍乾嘉禁教与早期天主教殉道者

康熙十七年（1678年），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嘉彼辣），因仇教风波，在福建被差役斩首。他是明末天主教重返中国以来的第一个殉道者。

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传习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内部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

乾隆十二年（1747年5月26日），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白多禄（Pedro Sanz）因禁教期间潜入福建传教，被斩首于福州西门外。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湖北、陕西地方官分别查获前往该地传教的传教士数人，乾隆再度下禁教令。

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因川楚教乱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嘉庆十九年（1814年），第一位中国天主教教徒殉道者吴国盛在贵阳被处决。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徐德新在成都被处决。

俄国东正教在中国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东正教会俄国托博尔斯克教区主教托来华。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抵达北京。1712年康熙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慰问那里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作为同意借道俄国境内为交换条件，彼得大帝提出派传教士团来华。经康熙表示同意，俄国派出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便于1717年首次来到北京。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中方正式允许俄国派东正教教士到中国传教。

1847年7月，沙皇政府授权第十二届东正教北京传道团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商到新疆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处通商”。

1858年，大司祭固利乙（Gurii）率领第十四届传道团前来北京换班。10月10日俄国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从东西伯利亚总督任地伊尔库茨克直接到达北京，表面任传道团监护，实际上则是俄国驻华代表。12月，彼罗夫斯基向清政府声明是俄罗斯驻华全权公使，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中俄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的换约。虽然这违反清朝的外国使臣不驻京的规定，但是咸丰皇帝还是派理藩院肃顺、瑞常与彼罗夫斯基谈判。1859年7月俄国派遣伊格那季耶夫来华，替代彼罗夫斯基。

耶稣会重返中国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7月21日），教宗克莱孟十四世发出敕令《吾主救世主》，解散耶稣会。1775年耶稣会中国省被迫解散，在华传教事务于1782年起由味增爵会受命接管。

1814年，耶稣会被教宗庇护七世重新恢复。

1842年7月11日，三位法国籍的耶稣会士南格禄（Fr. 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 S.J.）与艾方济（Francois Esteve S.J.）重返中国，1847年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正式建立传教中心，徐家汇圣依纳爵堂至今留存。

新教传入中国

嘉庆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新教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华传教，并任职于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七年之后，第一个中国新教徒蔡高受洗。

道光三年（1823年），马礼逊按立第一位中国新教牧师梁发。

道光十年（1830年），裨治文抵达广州，他是新教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于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许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没收，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将教堂发还，因传教纠纷、欺压传统宗教等，引发许多教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禁教令松弛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皇帝根据御史甘家斌的奏请，饬令刑部颁布《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对违反者处以“绞决”。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方济会意大利传教士蓝月旺在监禁五年后，在长沙受绞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月18日，遣使会法国传教士刘格来在武昌被绞死。

道光二十年（1840年），遣使会法国传教士董文学在武昌被绞死。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汉福会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随军翻译和占领军定海知县。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方四个翻译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李太郭和麦华陀。同年，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进入厦门传教。这是新教在中国进入的第二个城市。第一个是广州。

1842年，英国圣公会在香港成立维多利亚教区，负责开拓香港、中国、日本、朝鲜、马来亚等地传教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来上海创立墨海书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25日），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从西湾子出发，历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长途跋涉18个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拉萨。1852年出版《鞑靼西藏旅行记》。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1月11日），美北浸礼会的玛高温医生（D. J. Mac Gowan）到达宁波。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任美方的翻译。该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派遣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广州沿海，于

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法国特使拉萼尼用炮舰相威胁，坚持必须由大清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清政府被迫让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发布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咸丰元年（1851年1月31日），大英循道会差会俾士牧师(Rev. George Piercy)以义务传教士身份自费抵达香港，同年12月进入广州传教。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受中国传教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与宾惠廉一起共同传教。

基督教与太平天国

1834年，洪秀全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在广州龙藏街遇见传教士，并从其手中得到宣传基督教中文传道书《劝世良言》（梁发著，马礼逊代辑付印）的叙述。这条龙藏街就是提督学政署前边的一条街道，现在仍沿用此名。

1843年，洪秀全科举落第，大病，在家研读《劝世良言》。

1847年，洪秀全第三次科举失败，和族弟洪仁玕在广州拜浸礼会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为师，申请受洗。罗认为洪对基督教理解不对，没有同意。之后，洪秀全模仿基督教使徒，与好友冯云山，走出家乡到广西传教。加入明室后代朱九畴所创立的上帝会。朱九畴死，洪秀全被推为教主。遭清政府通缉，逃至香港，跟福汉会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继续学习。1848年回广西，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拜。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1853年，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晏玛太坚守邻近战区的教堂，并戏剧性地营救驻扎上海的清朝最高官员——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帮助其从城墙上逃脱。

1854年5月，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

1854年，洪仁玕当时作为基督徒在上海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学习天文历算，为时半年，后离开上海回到香港。1859年洪仁玕辗转抵达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

1857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

1858年年底，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作为伊利近勋爵派出的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到南京会见太平天国官员。

1860年8月，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杨格非等应忠王李秀成之邀，到苏州会见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然后进入南京，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

1860年10月，罗孝全从广州经上海、苏州，抵达南京，拜见洪秀全。被授

予管理外事的职务。但很快与太平天国不和，1862年1月到停泊在南京长江边的英国船寻求庇护，离开太平天国。

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总督叶名琛。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5月攻占大沽炮台，兵临天津，威胁北京。6月23日清政府与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内容有传教自由一条。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全面开禁西方在华传教。

咸丰十年（186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北京）临时代办。

深入内地与教案冲突

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内地会名义率领一批传教士来华，抵达上海。

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发生贵阳教案，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文乃尔被凌迟处决。

同治七年（1868年8月22日），发生扬州教案。

同治八年（1869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涉及法国天主教的天津教案，清大臣崇厚出使法国谢罪。

同治九年（1870年），大英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抵达中国，第一站是上海，随后从山东登陆，进入山西内地传教。

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医生抵达香港，辗转经过广州，汕头等地之后到达台湾进行“医疗宣教”

同治十二年（1873年），美南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第来中国，在山东乡村传教，长达四十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剑桥七杰加入内地会。

1890年，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提摩太呼吁关注中国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并组成了一个七人上书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阿什莫尔、布劳格特、约翰、穆尔、沃瑞，李提摩太。

基督教与洋务运动

同治元年（1862年），清朝同文馆成立，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任英文教师，1864年美国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也到同文馆工作。1869年，他被聘为同文馆总教习，对同文馆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同治七年（1868年 ），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译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介绍西方科技的翻译出版机构，传教士韦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等先后担任外方翻译。

基督教与戊戌变法

1848年，王韬应传教士麦都思的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

1868年9月5日，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CHURCH NEWS））。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

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chereschewsky）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学院，1905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

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

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康有为、梁启超主要通过《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出版的书刊了解西学。

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

1894年10月，《万国公报》发表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担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

曹州教案与德国占领胶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的借口。

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山东、天津、北京、山西、内蒙等中国北方

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宋教仁被武昌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录取为学生。

1904年10月，黄兴在湖南长沙策动反清起义事泄遭清政府追捕，在基督教圣公会教士黄吉亭掩护下，黄兴从长沙逃往上海，最后逃去日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支持下，该会教会阅报室“日知会”司理、基督徒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主张。

1910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同盟会会员王正廷，秘密参加宋教仁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

1911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王正廷出任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外交次长。后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中国内地会的兴起

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1832~1905），出生英国，十七岁归信基督教，同年决定献身为传教士。他于1854年抵华传教，共在华51年。

1866年：创立内地会：其策略为“凭信心过生活、工作”，这样的生活观念，带给中国信徒有很重要的影响。基地在浙江。

1867年：进入江苏。

1875年：进入河南。

1876年：分派传教士前往山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地。因为事工的需要量越来越多，人手经济上都需要增添，因此，他们开始去到各个国家当中传递异象，鼓励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在这宣教的行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差会也加入内地会的系统，一起在内地福音事工上服事，此时的内地会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差会团体。

1885年：剑桥七杰加入内地会，轰动一时。

内地会奉行本色化原则，一贯训练中国同工自立、自养、自传；同时采取整全的宣教策略，在以福音拓荒为主要重点的同时，在文字、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十足的进展。

经济文化交流

嘉靖三十九年（1566年），道明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在一封信中介绍了中国茶叶。

明朝末年，传教士将土豆引入中国，当时土豆被叫做荷兰薯。（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在北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并刻版刊行。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把天文望远镜带入中国。

天启三年（1623年），艾儒略根据庞迪我、熊三拔所著的底本编译成《职方外记》，介绍世界地理。

1687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论语》拉丁文本，在法国巴黎出版。这是孔子首次被介绍到西方。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1698年，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华，后来他的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信，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伏尔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传教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历时11年，绘成《皇舆全览图》。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景德镇传教七年的耶稣会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写长信给法国，详细地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的制作工艺，使中国瓷器制造工艺的秘密被公开。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门成立医学传教组织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医生在宁波创办“浸礼老医局”，后改名为“华美医院”。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艾迪绥将一所女子学校从爪哇苏

腊巴亚迁到中国宁波，称为“宁波女塾”，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

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58年12月19日），美北浸礼教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初为半月刊，不久改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中止。

同治七年（1868年 ），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译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介绍西方科技的翻译出版机构，传教士韦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等先后担任外方翻译。

1869年，以法国传教土吉恩·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川西，在四川雅安的宝兴县，看到了大熊猫，并首次收集了标本。

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

1892年，法国传教士田氏从越南携带咖啡树苗，进入云南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种植，这是中国栽种咖啡树的开端。

1897年2月11日，上海美北长老会牧师费启鸿帮助由原美北长老会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成立商务印书馆，是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

1906年盛夏，江西大余县基督教信义会德国传教士郛利亨，避暑旅游，进入西华山，在山里他发现许多乌黑发亮的石头，用手掂量感觉很重，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矿石，于是拾了一些带回教堂。第二年郛利亨带回一些回国，找德国矿物专家鉴定，这些石头竟然是宝贵的钨矿石。

早期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1807年来华。

郭实腊

裨治文

伯驾（第一位医疗传教士）

麦都思

薛承恩

戴德生

李提摩太

第一位殉道的中国新教徒是广东博罗的Che Kam Kong（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为基督徒。5年中带领博罗一百余人信教。长辈不满他抛弃传统，警告他停止传教，但被他拒绝。1871年被捕，被强迫放弃信仰。他说，"你能杀我的肉身，不能杀我的灵魂"，随后被推出城门杀害；尸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

中华民国

宗教自由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孙中山 、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数近70万人。

由于基督教教义强调只能信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与"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国传统习俗产生了很大抵触，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直到后来来中国传教的刚恒毅总主教（1876年－1958年）与雷鸣远神父解释中国人祭祖敬孔礼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中国人这么地做是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达尊敬。教宗庇护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国人拜祖先。

基督教青年会

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当时的名称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 M. C. A. in China），首任总干事为美国南部美以会教士巴乐满（Fletcher Sims Brockman 1867 ~ 1944），副总干事为中国王正廷。青年毛泽东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青年会智育部晏阳初在长沙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Joseph Platt）会同奉天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克来克，在停泊在秦皇岛外的英国巡洋舰"麦尔迪"号上会谈，促成直奉双方于6月17日达成停战协议。

非基督教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团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引发了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

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许多知识青年也参加进来。

1923年6月14日，天主教意大利人梅占春神父被湖北应山县农民武装首领雷么扣为人质。中国政府迅速营救。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队围剿雷么，梅神父被救出，但在交火中受伤，9月4日身亡（一说梅神父被雷么枪决）。事后萧耀南等湖北名流集资在汉口建立梅神父纪念医院。

本土自立教会的形成

“非基督教运动”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促进了中国人独立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实践。倪柝声创办的地方教会，就诞生在这个时代。

传教士与中国共产党

中共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因此在苏区驱逐或者逮捕外国传教士。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以释放苏区所有传教士作为条件，要求释放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可证明苏区关押着外国传教士。

1934年12月8日，红军方志敏部队在皖南旌德县绑架内地会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提出2万巨额赎款释放条件，被拒绝后，将师达能夫妇撕票。

1935年，红军长征路上曾逮捕内地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巳作为人质长达一年，勃沙特获释后回国发表《神之手》，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红军。

1949年，天主教神甫雷震远离开中国，回国写作《内在的敌人》一书（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表示对中共武装革命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其所隐藏的潜在隐患的揭示。

抗战时期

侵华日军宣传他们要把中国人从西方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对欧美背景的基督教也极力压制和打击。抗日战争中，沦陷地区的欧美背景的基督教教会活动基本上停止，教堂被摧毁或者占用，未撤走的西方传教士被逮捕拘押。少数中国自立基督教教会勉强保持低调活动，例如北京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聚会”。日伪还于1942年18日成立由日本控制的华北基教联合促进会。一部分日本基督教牧师也随军进入中国。

1930年，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艾伟德来到山西内地，创立了八福客栈，一边传教，一边收养孤儿。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带领90多名儿童，长途跋涉，转移到西安。书籍The Small Woman和电影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讲述的是传教士艾伟德的故事。

天主教遣使会神父雷鸣远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近代基督教在华之贡献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各宗派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传布，成效惊人。而教派除了传道事工之外，并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建设大学、医院、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另一方面，中国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多，遍及中国各地，远及海外，为中国基督教展开一新的局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教教团数目计有六十一个团体、信徒数九万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但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教团数以增至八十二、宣教师数目亦增至三千八百三十三人。民国成立以后，教士、教徒数目均激增。根据民国二年（1913年）的统计：宣教师有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信徒数亦增至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教团数以增至一百七十，宣教师亦增为五千九百七十八人，且信徒数以致二十五万三千二百十人。据抗战前（民国二十四年）的统计，全国

新教教会数有七千二百八十一、信徒数为五十一万三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当中，就曾为四万三千人改宗者施行浸礼。据称：如包括尚未洗礼的慕道者在内，信徒总数以达百万人之数。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教育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一些中国著名大学起源于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新教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津沽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基督教在华所成立的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各种。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一百间、女子中学有九十五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间。中学数计二百五十九，学生数约有五万。大学计有十三间，有：济南的齐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广东的领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上述十三所大学的学生数计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英文杂志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百三十八种。民国二十

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四千种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厂分别承印，并有一百三十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

中国教会大学

在医疗方面

除宣教团队的医师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在中国基督教的医学协会，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该会由一群外籍宣教师所组成，其主要目的为提供义诊，并先后资助在澳洲、广州、上海、香港、宁波、厦门等地医院。该会又出版中文医疗书籍，及主办医疗人之教育等事工。

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医疗协会：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于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首次的集会，其第二次大会于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召开，系由基督教医师所组成的全国性团体。此后，该会又在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先后开过几次会议。该会曾经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及出版数种医学丛书，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对照的医学辞典。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由欧、美回国的中国医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会。隔年（一九一六年），该会与中国医疗传道协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协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在此时期，该会对各种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结核病等）的防治，曾

贡献不少。

教会创办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为求全国医疗工作的扩展，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自动要求合并于中国医学会。中国医学会，最初称为："中华民国医药协会"，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迁移上海后，改称为"中国医药会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

在改善社会方面

基督教曾在中国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当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烟禁赌、辅导妓女从良等。而重要的组织有以下几个团体：

（一）万国改良会分会：成立于1808年，初任干事为丁义华，劝人戒除烟酒嫖赌。该会对鸦片的禁绝，主张尤力。该会的经费，最初倚赖美国总会的供应，当欧战发生时，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宣布经济的独立。

（二）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1924年八月，设总会于上海，发行拒毒月刊。该会系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国医学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该会曾在各地举办演讲，印发拒毒图画。该会的工作，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因战乱而告停顿。

（三）中国妇女节制会：成立于1907年，总会设于上海，由"万国节制会分会"，相助成立。初任的会长，为上海长老会的范女士，后由九江美以会的石美玉医师继任，会务很有进展。该会的主旨，亦为反对烟酒、娼妓，并谋求妇女权益者。另一方面，万国节制会仍继续在华工作，1909年北京公理会的美籍女教士富轲慕慈夫人担任干事。到处演讲，组织支会，计成立

支会四十七处。该会在华曾创办一“节制女子家事学校”于江湾，八一三事变以后，迁往上海租界，改名为“新女子职业中学”。

（四）道德会：1918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会及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十七个团体，组成一个“风俗改良会”，到1920年更名为“道德会”。该会设立有“妇女教养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辅导他们有一谋生的技能，在“妇女教养所”中设立有各种技能训练班。该会并建议政府，逐年减少妓院的数目，每年按照抽签，减少20%，并提倡严格取缔未领执政的私娼。该会发行进德报，并在学校提倡性教育及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自爱国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对基督教会实施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将基督宗教置于中共的严厉控制之下。外国教牧人员被迫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或回到母国。

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动所谓的三自爱国运动，表面上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实质上中国教会自此全面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1951年，发动指任过去的基督教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控诉运动，切断国内教会与国外教会的一切联系。所谓的外国教会在中国的所谓代理人逃到香港、台湾和国外，或者被中共驱逐出境。天主教美国玛利诺会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 ，1891-1981），在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处20年徒刑，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关系将要有重大变化，才被提前释放，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实质上是政府的一个对于宗教的主管机关，而非教会。中共提

出所谓的“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实质上是强化共党对于教会之控制。

1957年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基督教受到严重的冲击，并且遭到严重的破坏，教牧人员受到严重伤害，一切宗教活动基本停止。文革结束后，政府虽然对于文革时代的做法实行“拨乱反正”，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于基督信仰的偏见。这一点可以从历史教科书上窥见一隅。

今日中国大陆基督教

今天，中国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有为数极少的东正教徒。天主教、新教列在官方承认的五大全国性宗教之中，东正教则在黑龙江省等部分地区被官方承认。

虽然中国大陆由于政府的政权性质，在大中小学内实行无神论宣传教育，并压制校园内的传教活动，但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务条例》[1]，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为非法。另外，有一些条款，例如“禁止在登记场所以外的场所传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请不准传教”、“跨省宗教活动需经审批”等等，与宪法上“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有争议。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开始受到其它国家教徒的关注。

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教会（西方称之为“政府教会”或“官方教会”）组织，中国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新

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

分布

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各省的分布相当悬殊。

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是河北（占全国1／3）。许多国际知名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领袖（如已故的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都来自该省。河北保定附近的东闾村，是著名的圣母朝圣中心。其次是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川、福建（长乐、福安）以及上海市。山西太原教区清徐县的六合村有7000名教徒，可能是中国天主教徒最多的村庄。

新教徒最集中的5个省份是河南、浙江（特别是温州市以及杭州市萧山区、慈溪、温岭等）、福建（特别是福清）、安徽、江苏（主要在宿迁、淮安）。其次是山东、云南、黑龙江（特别是大庆）、辽宁、江西等省。其中以河南的信徒最多，全省有5%人口是新教徒（不包括家庭教会的信徒）。浙江温州地区由于信徒众多，已经呈现教堂林立的情形。云南省西北角的贡山县新教徒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5%，是中国基督徒比重最高的县。

官方基督教组织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现显著复兴。由于三自爱国运动，官方新教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官方天主教会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都不承认教宗的行政权，因而

被其他罗马教会视为分裂出的基督教组织。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对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因此被一些家庭教会看作是不贞节的教会。

与梵蒂冈的关系

梵蒂冈目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三自教会实行自选自圣主教制度，拒绝接受梵蒂冈的领导。教宗任命的主教也无法正常在中国大陆开展宗教活动。中国现政府一直强烈反对梵蒂冈宣布的部分圣人，理由是这些人曾在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非法活动”（近代史上协助西方侵略中国大陆以及1949年之后企图颠覆大陆政权）。

家庭教会

出于信仰上的坚持，许多基督徒选择在三自组织以外的聚会，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因家庭教会多数拒绝向政府登记而被视作非法。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的处境很不相同，差异很大，浙江（例如温州）以及福建（例如厦门）的各大城市的家庭教会的力量很强盛，可能由于经济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往往都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通常不会阻止他们众会；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部分农村，家庭教会仍然受到很严厉的打压，家庭教会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把探访家庭教会的香港或外国信徒也拘捕了（因为国家《宗教事务条例》把外国人参加家庭教会聚会视为非法）。家庭教会因为相对缺乏牧养资源，长期处于地下，也不一定像官方控制的教会一样有正式的训练有素或是有足够经验的宣教士带领信徒，而使得偏离正信的异端以及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教派有机会出现（例如：东方闪电）。家庭教会的主要倾向包括福音派、基要派、加尔文派、灵恩派、五旬宗，以及 自由主义神学等，派别比较多。

趋势

估算中国基督徒人数很难，因为许多人不愿公开自己的信仰。由于家庭教会多数没有登记，所以估计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相当困难。

外间对于中国新教基督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二〇〇二年的数字是约一千五百万。而在海外机构之中，《爱德通讯》（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统计的数字则在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七十万间。有不少坊间估计非常乐观。有许多网上资料指中国信徒有五千万以上，甚至有些数字超过一亿。香港宣道会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时代论坛指出，中国新教信徒数字只可能在二千万左右，基于多种因素，外间的数字很可能严重高估 。

教派

官方声称中国教会没有宗派之别，这指的是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但现存的五种宗教的内部各自有一些不同的独立派别。 除了基督教家庭教会之外，现在中国基督教之内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和基督徒聚会处（地方教会）等教派在福建等省份举行单独聚会和礼拜，并不参加政府提倡的三自教会的不分派别的联合礼拜。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中，傈僳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拉祜族、佤族、苗族、俄罗斯族、中国朝鲜族信仰基督教的比重较大。

国际访问和基督教

在北京等国际城市，已经在酒店里设立了专供外国人的聚会。

美国官方访问中国时常去中国教堂，2005年11月，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访问北京时，参加缸瓦市教堂（北京开放的5所官方承认的新教教堂之一）。国务卿赖斯参加棕枝主日。

中国东正教

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现在有人数很少的一群东正教徒。中国东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被俘来到北京的俄国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罗斯族人也是东正教徒。

中国对基督教的敌视和仇恨态度的形成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炮火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从此得以进入内地传教，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中国。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扩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时也办立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等进行传教，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获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国人将传教士与列强混在一起，将对侵略者的仇恨转嫁到传教士身上，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殖

民主义者殖民统治的工具，认为基督教传教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同时对基督教会中的部分人士和中国人而发生连串教案从而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把仇恨转化成暴力行为。终于在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多名传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杀害。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苏共和中共等左翼共产主义团体共同发动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主要参加者是知识青年，也包括了当时主流的知识界人士，如在北京大学便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运动也对当今中国社会，包括政府（政府自身的政治属性以及长久以来的教育系统对基督信仰的偏见的片面灌输）对于基督教总体敌视且充满仇恨的态度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方面的作用超过任何人。英国和美国宗派，如英国循道会，继续派遣传教士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驱逐传教士。

==

==

==

==

==

==

===
===
===
===
===
===
===
===
===
===
===
===============

谢模善、袁相忱、梁家麟、王明道、吴耀宗、丁光训、等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A2%E6%A8%A1%E5%96%84

谢模善（1918年2月17日－2011年6月30日）中国基督教传道人。

谢模善是江苏扬州人，生于1918年2月17日。十四岁时在浸信会信主。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曾在中学教书，随后就读于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抗战胜利后，谢模善在上海中华浸会书局，任主日学编辑七年半之久。1947年，徐复生在青岛和上海创建中华基督徒布道会，1950年代初，徐复生在上海组建三自自来水笔厂，由谢模善从事文字工作，并任该会总干事、《布道会刊》主编[3]。1955年又主编《圣膏》杂志。1956年5月28日，谢模善因拒绝参加三自运动在上海被捕，23年后，于1979年8月25日获释。出狱后服务于家庭教会。1985年和1994年又两度被捕。2003年宣讲福音大会信息“活为主活，死为主死”。2011年6月30日，谢模善在中国扬州去世，享年93岁。7月2日，在扬州举行“神的忠仆谢模善追思礼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2%81%E7%9B%B8%E5%BF%B1

袁相忱（1914年-2005年8月16日）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被称誉为“中国家庭教会运动的卓越人物”,而王明道也称他和林献羔两个为“真正不向政府[压制信仰而]低头 、能站立得住的人”。

袁相忱

英文名　　Allen Yuan

出生　1914年农历六月

安徽蚌埠

逝世　2005年8月16日

北京

母校　圣书学院

生平

1914年农历六月，袁相忱出生在安徽蚌埠，名为袁振邦。父亲袁禹庭是广东东莞人，在铁路部门工作，因此家境小康，母亲罗孝纯，也是广东人，笃信佛教。1岁时全家移居江苏徐州。7岁时，袁相忱进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老师取学名袁相臣。1923年，袁禹庭因亏空公款被开除，全家移居外祖父所在的天津。1927年，因父亲在北京的真光电影院工作，袁相臣进入北京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学校就读。1930年，改名为袁相忱。

1930年，由于他的老师石天民的介绍，袁相忱开始到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听道，不过当时他并未相信。1931年圣诞，袁相忱接受公理会王牧师的点水洗礼。1932年12月29日，袁相忱获得重生的经历，并且开始热切地向周围人传福音。1933年8月，袁相忱在颐和园旁青龙桥接受王明道为他施浸。同年升入青年会办的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但是次年即不顾家人反对，退学进入远东宣教会所办的圣书学院（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十四号）成为神学旁听生。

1936年7月，袁相忱曾前往厦门鼓浪屿，参加宋尚节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灵性大为提高。1938年毕业后，袁相忱到天津圣会所的南市福音堂布道，同年7月22日与梁惠珍在北京结婚。1939年回北京任圣书学院翻译并在其学校的杂志《暗中之光》择文。1940年，袁相忱携妻子和未满一岁的儿子袁福音，同美国宣圣会（拿撒勒人会）传教士的裴约翰牧师到河北南部的成安县，向周围农民传道。珍珠港事件以后，裴牧师一家被关到山东潍坊集中营，于是袁相忱不依靠任何组织，继续在农村传道，虽然在日军和八路军的夹缝中，仍然得到了大批信徒。

1945年，袁相忱因母亲患重病，返回北京。不久国共内战爆发，袁相忱无法回到农村。1946年3月，他接手了阜成门160号原由日本牧师帜田金雄开办的福音堂。1947年，信徒数目达到二百多人。

1951年，三自运动开始后，袁相忱是北京地区11名拒绝参加该运动的独立教会负责人（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之一，他们认为自己的教会早已实行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因此没有加入的必要；另一个原因是：不愿与控制三自的现代派为伍。1957年，袁相忱因为批评政府歧视基督教的宗教政策，以及批评三自领袖王梓仲是“三朝元老”（先后投靠美国人、日本人和共产党）的“吃教者”，而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19日，袁相忱因为拒绝加入三自运动而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

袁相忱监禁期间，照顾6个孩子和年老的婆婆成为妻子梁惠珍的责任。因为她是“反革命家属”，她成为建筑工人谋生，亲友被强迫划清界线，不准提供帮助。在二十一年中，反倒有一些匿名基督徒不时提供他们资助。她还坚定自己的信仰立场，甚至大方的帮助其他人,没有抱怨。后来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人来看，一个八口之家，很难维持生计，但总是上帝在负担”。

1979年12月20日获释。出狱后他在白塔寺家中带领家庭聚会，为北京人数最多的一个家庭聚会。2005年8月16日，袁相忱于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享年91岁。

著作

忆神仆王明道先生，《中国与教会》第86期第11页，1991年11-12月

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生命季刊》2000年3月号。

帐幕的隐秘处,《生命季刊》2000年9月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C%AE%E7%BE%94

林献羔牧师（1924年10月4日－2013年8月3日），英文名Rev.Samuel Lamb，中国著名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

名字由来

小时候，他父亲喜欢按照国家使用的普通话来翻译，将“林”译成‘Lin’，但林献羔因自己名字有个“羔”字，就把林字译成广东音“Lam”，再稍为一变，成为一只如假包换的羔羊“lamb”，真是“献给羔羊基督的羊”了。英文名字是Samuel Lamb（林撒母耳）。

生平

林献羔牧师祖籍广东省台山县，1924年10月4日出生于澳门，他的父亲林保罗牧师当时担任澳门白马巷浸信会的牧师。在他未出生时，父亲为他起名献羔，意为献给羔羊基督。1936年在香港长洲受浸。1942年进入梧州建道圣经学院，1944年毕业，1945年起在广州传道（位于大北堂），1950年开始在广州市中心大马站35号的家中开始聚会，称为“大马站福音会堂”。

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三自爱国教会，认为其政治宣传式的教导偏离了纯正的福音，结果在1955年9月14日，在肃反运动中和王国显、张耀生作为“大马站反革命集团”头目被捕，1957年获释。1958年第二次被捕，被判20年徒刑。

1978年，林牧师出狱。1979年，林献羔牧师恢复了大马站35号的聚会。曾有多位美国领事到访,之后人数逐渐增加到数千人。2000年大马站拓宽马路时迁至德政北路雅荷塘（北）荣桂里15号。他从1979年开始编写第一本《灵音小丛》，已陆续发表了超过一百册，第一页都标有“没有版权”。之后人数逐渐增加到数千人，影响颇大。

林献羔牧师于2013年8月3日下午去世。原订于2013年8月17日（周六）14:30，在广州银河公墓银河园白云厅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 因场地及安全理由现改为2013年8月16日（周五）14:30，在广州银河公墓银河园白云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8%8E%E9%81%93

王明道 （英文：Wang Mingdao； 拼音: Wàng Míngdào； 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人，20世纪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主张基要派神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从1927年起，他自资发行《灵食季刊》共28年，发表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从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并引领基督徒会堂共22年。因为反对三自教会，他在1955年被中国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0年被释，但从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生平

成长

王明道原籍不详，父亲名叫王子厚，壮年来到北京，在北京美以美会所办的同仁医院中帮忙，成为中国医士。母亲李文义。二人是基督徒，伦敦会会友。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外国人和很多的中国基督徒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难，王子厚夫妻也在其中，当时二人有一女儿，王夫人身怀王明道已经身重。王子厚恐惧被攻陷后会遭遇痛苦残杀，于6月22日自尽身亡。王夫人于7月25日在避难处生下一儿，名为“铁儿”。后来在入小学时起学名王永盛，1920年自己改名王明道。“就是表示我愿意神在真道不明的时代用我证明他的真道。”

王夫人带着姐弟二人艰难度日。少年王明道性格倔强，喜爱读书，学习优异，但“一直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他从小被母亲带去礼拜堂，后来在教会学校读书，参加很多聚会，学习圣经课程，但对宗教活动不感兴趣，“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十四岁时，“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对祷告和读经发生了兴趣”，自述“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1914年复活节受洗，踌躇满志，立志要做政治家，“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做大政治家的目的”。

1918年王明道入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之一）预科部，一年后预科部转到济南，王明道不愿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因而辍学，想要直接进入燕京大学本科部又未果，满腹雄心壮志的他极为抑郁。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学校教书，看到改变人心的工作是多么的有价值，渐渐放弃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决心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学校中工作颇有建树，深得学校看重，有望被学校所属的伦敦会送去读神学，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但这个新的计划又被一件事打断。王明道以前受洗时是受的

点水礼，就是洒一点水在头上，这期间他受一位同事启发，发现圣经中的洗礼是使用浸水礼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忆自己受洗时其实不明白自己所宣读的使徒信经，因此他坚持要重新受浸礼。他因此与校方发生争执，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让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挣扎，最后还是决定顺服上帝的命令，被校方开除，另外有五名学生也跟随他退学。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们在保定城外结著厚冰的护城河边沿河寻找，找到一处没有结冰的地方，六个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礼。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愿教会受到"扰乱和纠纷"的苦衷，"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我一点不怪责他们"。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轻不成熟的地方，他关于浸礼的看法也未必是对圣经唯一正确的解释，但他看重圣经、顺服上帝的旨意、顽强不屈的秉性已经渐渐突显。

王明道回家以后，周围的人－包括母亲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于旁人的偏见，他找不到工作，从读中学起就凭奖学金经济自立的他现在要回来依靠母亲，这更使他非常难堪。他坚持自己受浸"并没有错"，但是也自觉"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从痛苦中醒悟过来，把要去英国读神学的雄心壮志也放下，认识到"最要紧的乃是用功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上帝的训练和造就"，开始潜心研读圣经，领悟日多。他向上帝全然顺服，一边读圣经，一边在家中尽心竭力做琐碎的家务。他自述道："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上帝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上帝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做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上帝，到了这个程度，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 "

传道

王明道住在家中读圣经，渐渐地常有人来他那里谈道查经，1924年10月8日，他开始在家里设立查经聚会，第一次有三个人参加，这是他传道的开始。这时候他也开始写一些小册子印刷分赠，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开始几次他的查经班人很少，但他的讲道有力量，有信徒听他讲道很感动，便来帮助他组织聚会，1925年5月在别人家里开特别聚会，人数已超过一百人。他也渐渐接到邀请外出讲道，他的讲道越来越进步。他看重圣经，但不止是讲解圣经的知识，而是从圣经的话语中激发人的信心，呼召人向神悔改，也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1921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想把家中除了圣经以外的书都烧掉，因为他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但后来慢慢领悟了，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风格，他不用深奥的神学概念，语言准确、贴切、朴实、流畅、生动，贴近圣经，贴近生活。

王明道在讲道中看重圣经，对罪恶放胆斥责，对世界中的、教会中的种种丑恶，剖析得入木三分。他批评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学立场的信徒，他称他们是不信派。他最认同圣经中的耶利米先知，认为神给自己交托了同样的使命，要做“坚城、铁柱、铜墙”，反对世界中的罪恶。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他本着神的话语放胆直言，每次讲道都准备只去一次，但还是有很多的教会请他多次去讲道。从1925-1948年，他每年平均有5个月在外地讲道。收到的邀请更多，大致每四处邀请中只能允诺一处。他走过全国28个省中的24省，在3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

在1923-1925年，他与倪柝声、李渊如等有不少来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但后来地方教会的发展却与他的教会观产生了差异，双方保持比较疏远的

关系。他对宋尚节一直非常敬重他的真诚与勇敢，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谓惺惺相惜。

1927年，他开始自费出版《灵食季刊》，他的文章在中国基督徒中有很大影响，见下文分别讨论。

成家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与太太刘景文结婚

1925年底他应刘德森牧师邀请去杭州带领聚会，弹琴的一位太太没能来，临时请刘牧师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王明道看见景文小姐弹琴的风范，十分心仪，在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意总无误，而予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反复祷告之下便托人向其父母提婚。因为当时刘小姐尚年轻，过了一年，长辈才允许两人订婚。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结婚后，他母亲和姐姐把媳妇当外人，不愿意接纳，常常闹出很多纠纷，夫妻俩在家中竭力事奉，经受很多磨练。王太太当时年纪只有20岁，但性格开朗通达，受了许多委屈也从不诉苦，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还时时排解王明道心中的烦忧。王明道说她不爱读书，不擅文学，还粗心大意，但她喜爱音乐、擅长钢琴、满怀爱心、凡事忍耐、心宽量大、

料事中肯、有人生的智慧，王明道遇事就同她商量，称她为“参谋长”。当她见到王明道言语行为上有错误和过失的时候，她会当面替他纠正。因为她的规劝都很合理，王明道虽然当时觉得难堪但最后总是能接受，还很感谢她，所以又称她为“诤妻”。两人在小事上常常有很多摩擦，但大事上都很同心，两人从来都以诚相待、互相信任，铁与铁磨出刃来。王明道说，“说来也真稀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大多数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

王明道与太太育有一子王天铎。天铎到两位老人家离世的时候也没有信耶稣，成为父母心中的牵挂。但是一家人非常恩爱，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天铎也省吃俭用地往监狱里面寄食品，儿媳妇也好像亲生女儿一样待两位老人家。

建立教会

1937年8月1日北京基督徒会堂献堂礼拜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开始设立聚会，4月23日迁至炒面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会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号建成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王明道不在意建立大教会，只要建立他认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他对接纳信徒受洗非常谨慎，必须要确知是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他坚持要敬虔的信徒才能参加诗班敬拜神，没有这么多又敬虔又擅长唱歌的信徒，他便宁肯不用诗班。他的教会不用牧师的头衔，也不庆祝圣诞节，因为他认为这些没有足够的

圣经根据。他极力避免金钱对教会可能造成的侵蚀，因此不传奉献袋，也绝不在意信徒的钱财地位。他非常愿意去各种的教会传道，不受宗派观念的局限，但他的教会在组织上不与别的教会联合，以免造成一种压力会影响到传讲的真理，他也不随便请外人来讲道，一定要清楚这人的信仰和生命才行。他不认为通过社会活动来改良社会是教会的职能，所以他的教会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搞募捐。他的教会里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他认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到1949年底有七八百人聚会。他反对"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和三自运动也是与他的教会观一脉相承，并非出于政治的原因。

抗战时期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王明道一直留在北京，排除时局的干扰，继续尽心竭力传道，也仍然外出传道。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抵制三自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他虽然知道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但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他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讳。”他这样做到了，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正式开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的神学基础是自由神学，就是他认为的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

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纹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发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学和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

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反过来逼迫以前弟兄姐妹的。王明道继续各样日常的工作，但身上的压力非常大。8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XXX【按：王先生旧日好友】来访，劝予勿触人之怒，谓于今日反对神之时代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事非是；又谓一切为了政治。八时半妻入室与伊谈数语，伊怫然迳起，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意伊之改变一致于是也。心中受刺激甚深，早餐不思食。...午餐不思食。....。今日予心中充满幽暗苦闷，甚至转为畏惧。十一时卧床不能睡，愈变愈劣。”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入狱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投降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

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各地的教会里有人因为他的失败而失败，但也有人因为他讲过的道仍然站立得住。(有一点澄清，王明道称自己在狱中“失败”，是因为他承认了三自教会，并且认了一些他认为是莫须有的罪，但显然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对神的信仰。）

王明道后来总结自己失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一直相信共产党不会干涉人的信仰”，另一个是“因为我跟日本人战斗了八年都没有失败，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结果“一支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词中勉励后辈：“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没有！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疏忽。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出来。出来以后极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绝与三自运动合作，离开基督徒会堂，以无声的方式与三自运动对抗。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这时候他仍然是失败的，被提审的时候他会把以前招供的谎话又说一遍，应许出去后与三自会合作，但显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从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讲自己是“惨遭失败八年”。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这反而使他绝处逢生，灵性上得到极大的复兴，自此以后，宁肯死在监狱，也不说一句谎话。他承认除了“反对三自会”是真实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没有一样是真的。政府让他写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变思想，他前前后后写了几千张纸，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推翻了，甚至还多管闲事，给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政府对他就绝望了。在文革中间，他在监狱里面也被别的犯人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出狱

1988年12月王明道与太太刘景文合影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因白内障视力近乎失明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因为国际压力的原因，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但没有平反。因为没有平反，他不愿意出狱，政府只好用计将他骗出来。1983年以后，他视力也已经极弱，写字都很困难。他们夫妇后来有机会去美国就医治眼睛，王太太为了国内的基督徒的缘故坚持不肯去，她说“我们老了，不能再为圣徒【指基督徒】做什么了，但我们在国内可以陪陪圣徒一同受苦”。1984年以后他们在上海武康路家中引领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王先生讲道，王太太弹琴，一如二人初识之际，直到王先生辞世的日子。他们亦曾接待许多外来访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看望他。他不隐瞒自己的失败，并且给人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他也告诉来客，他在监狱里学到饶恕，以前有人出卖他，控诉他，抵挡他，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长新夫妇来到王明道家里住了三周

之久，请他谈论1950年后这40年的事，并且做了录音，写成《又四十年》，成为王明道和中国教会研究的珍贵资料。

这么多年来，王太太刘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稳，不讲违心的话，与王明道同患难，无怨无悔。王明道出狱以后设法写材料为自己申冤，王太太对他说“你撒过谎，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但事过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想法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只为他祷告了。

去世

王明道、刘景文墓碑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溘然长逝，享年91岁。王明道先生去世后，刘景文女士曾对亲人说过：她一生的任务就是服侍王明道先生，现在任务完成，也就很快要去主那里了。翌年4月18日，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诤妻”刘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在病时昏迷中说的话，仍是某人事的如何、某某人的事怎样，一心挂念他人）。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文曰“王明道、刘景文暂息之所”。碑文“暂息之所”是借用44年前他为自己母亲拟的碑文，那时他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自己将来去世的事这样讲：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灵食季刊

1925年，由于南京《灵光报》拒绝刊登王明道的投稿，因此他自资于1927年春季开始出版《灵食季刊》，每年春夏秋冬四期。该刊内容主要是讲述圣经中的要道，基督徒生活以及护教等问题。发行遍布及全中国，每期刊印量二千本，每期约三万字，此后发行量和内容量一直比较稳定。该刊不收投稿，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是王明道自己的文章。文章内容有很多是反对自由神学的，例如〈现代教会的危险〉(1932年)、〈重生教义〉(1933年)，

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日军要求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刊登四条标语，并将刊物交由日军检查。王明道拒绝刊登标语，所幸《灵食季刊》未被停刊。

1950年以后，《灵食季刊》继续出版，发表在新中国下生活的见证，并在文章中与当时的三自爱国运动领袖如吴耀宗、崔宪祥、丁光训等进行辩论，发表过《真理呢，毒素呢？》、《我们是为了信仰》等著名文章，很多的信徒受到影响退出三自教会。

1955年夏季刊是《灵食季刊》的最后一期，王明道在上面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继续坚定明确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和三自教会，1955年8月7日，王明道被捕，《灵食季刊》从此停刊，自创办以来总共发行114期。

自1928年起，王明道开始把《灵食季刊》里比较重要的题目选出来，印成单行本，到1948年止总共有三十多种。

评价“神的忠仆”

“在人格上的高洁和耐力方面，以及影响的范围和建设性上，王明道应被认为‘三勇士（杨绍唐、倪柝声和王明道）之最。”——赖恩融著《中国教会三巨人》

“王明道是一位最受一般中国信徒尊崇的人物。”——吴利明著《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

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三自委员会机关刊物《天风》周刊，1955年。

“感谢神，在宣教运动极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会领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国差会领一分钱，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教会。如，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倪柝声的聚会处从零开始，成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在当时环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三自委员会机关刊物《天风》月刊，1994年（去世后三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AE%B6%E9%BA%9F

梁家麟博士（Dr. LEUNG Ka-Lun），前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专研中国基督教史。

简历

梁家麟生于香港，于1975年11月在葛培理布道会中决志信仰基督教。出于对中国基督教史和基督教神学的关怀，梁氏在大学期间主修历史学，副修哲学，并于1980年获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82年及1985年又取得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广东基督教教育（1807-1953）》。1989年，获加拿大维真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

梁氏出身于贫困的环境，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靠半工读维持，在大学暑假时曾从事货车搬运和猪肉屠房工作。1982-1984年，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曾任《突破杂志》执行编辑。

1985年，博士毕业后，梁氏到建道神学院教授中国教会历史，并曾担任出版部主任、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务长、学术副院长，研究教授。2005年9月接张慕皑牧师的棒，成为建道神学院院长。

梁家麟在教学之余也担任宣道会华基堂的顾问牧师（1999-）及九龙塘中华宣道会屯门友爱堂义务牧师（2000-2011），2011年后以顾问牧师身份继续于友爱堂出任。

2017年3月，梁家麟宣布将于2018年8月退下建道神学院院长一职，他并指出由于自己在建道神学院逾三十年，留下来对新的院长不好，退休后计划会出走一段时间。2018年1月25日， 梁家麟公布，学院已委任蔡少琪牧师出任建道神学院第14任院长，任期由2018年9月开始。

2019年1月起，梁氏担任旺角浸信会顾问牧师。

教学与研究

梁氏最初到建道神学院教授中国教会史时并未受神学训练，他更自认颇具叛逆，在“完全没有任何承担感或异象”的情况下到神学院任教为“一生中至今最冒险的事”。然而，自开始神学教育后，梁氏有所转变，并到加拿大维真神学院接受传道人训练。

然而，由于梁氏致力研究中国教会历史，并涉及一些争议性人物，他担任该院院长后即惹来不少对建道神学院的评议。其中一项就是指责，建道当年让梁氏未受神学训练已训练传道人（虽然教授的是中国教会历史，而非神学或圣经）的安排不很洽当。

梁家麟学术研究及出版著作等，截至2004年，共著有45本专书，所发表学术论文45篇。梁教授研究范围以中国基督教史为主，包括：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基督教史、华人教会的属灵传统、中国本土释经问题、华人神学与本色化的有关课题、宣道会的历史与信仰，及历史神学与相关课题。不过，他的《中国祭祖问题》与《倪柝声的荣辱升黜》引起了许多争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8%80%80%E5%AE%97

吴耀宗（1893年11月4日－1979年9月17日），男，广东顺德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

吴耀宗是一位争议性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他是“爱国爱教的典范”；因其在信仰上属于社会福音派（现代派），被基要派基督徒（如王明道）讥之为不信派。否定三自运动的人士，则斥他为“披上宗教外衣的共党特务”、“基督教的叛徒”。

生平

吴耀宗生于广州一个非基督徒木材商人家庭。1913年进入北京税务学堂。（所以能讲一口标准国语）。毕业后在海关供职。1918年受洗加入北京公理会，1920年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校部干事。1924年去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属于现代派神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神学、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27年返国，在上海任职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干事，后又兼任基督教唯爱社中国分社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吴耀宗常与陶行知等人讨论时局，坚决主张抗日。1937年秋重返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翌年3月回国，改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抗战期间在重庆两度拜会周恩来。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

1950年9月带头起草、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号召实现自治、自养、自传，断绝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建设“新中国下的基督教”。

1951年在基督教内组织开展控诉运动，批判亲美人士。这时，原来主要由西方传教差会支持的各大教派大体上都加入了三自运动，只有一些本土人士建立的教派未加入，如王明道在北京史家胡同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和分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教会。吴耀宗诬告地方教会领导人倪柝声经济犯罪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导致1952年倪柝声被捕，以此恐吓不愿加入三自的各处地方教会和其它独立的教派团体。随后制造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上海和其它地方教会的多数骨干被抓，迫使少数人转向三自运动。

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耀宗出任主席。未参加三自运动的基督教活动则陆续被禁止。

历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届、二

届、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三自爱国教会”也未能幸免，吴耀宗被斗，接受劳动改造。1979年9月17日在上海逝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1%E5%85%89%E8%AE%AD

丁光训（1915年9月20日－2012年11月22日），男，祖籍浙江定海，生于上海，中国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和现代派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前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

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至五届主席（1980年－1997年此时副主席为罗冠宗）、第六至七届名誉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一至三届会长、第四至五届名誉会长，爱德基金会董事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南京大学副校长兼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第二届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级副职领导人）。

生平

丁光训祖籍浙江定海桃夭门村，丁氏祖上在清朝康熙年间从宁波府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迁往定海县（今舟山定海区）。1915年9月20日，出生于上海，外祖父是圣公会牧师。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1942年获圣约翰大学神学学士学位，被按立为圣公会会吏，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并与郭秀梅（1995年去世）结婚。1946年，丁光训夫妇移居加拿大，从1946年到1947年担任加拿大基督教学生运动干事。随后他前往美国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1948年获得两校的文学和神学硕士学位，从1948年到1951年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担任干事。

1951年底，丁光训夫妇和儿子一同回到中国大陆（次子出生于1952年），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丁光训回国后，先在上海广学会担任总干事。1953年起，担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丁光训被选为常务委员。1955年与王神荫牧师一起，被中华圣公会分别祝圣为浙江教区主教和山东教区主教。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失去了牧职，只保留了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的虚衔（当时该院停办，直至1981年复校）；但在1970年代又回到了重要岗位。

1980年，丁光训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虽然圣公会组织在中国已不再存在，但丁光训仍然保留了他的主教圣职与头衔。

1980年至1989年，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

1985年发起成立爱德基金会并任董事长。

1989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南京大学副校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

1993年以后，丁光训不断批评基督教内占主导地位的“保守落后”的神学思想，主张建设一种“积极、开放、包容、能动”的神学思想，提出淡化“因信称义”的教义和“信者与不信者”的对立（他自称在家中醒目位置陈设观音像以测试访客神学态度），倡导“伦理型、服务型和理性”的新自由神学思想，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7年初，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基督教全国“两会”名誉主席、会长。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上当选为名誉主席 。

2012年11月22日上午10时，丁光训主教在南京逝世，中共对其的官方评价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轶事

程干远在《中共统战部揭秘--统战干部回忆录》一书中说丁是中共秘密党员。

爱行论思想

丁光训大力提倡“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如他倡导淡化新教的传统信条“因信称义”而强调“因爱称义”，产生了许多争议。

相对于“文革”后，中国国情与处境中，丁光训倡导中国教会所应该着重的是“因爱称义”。过往来华传教士所传“因信称义”的教条致使人着重“称义”的部分，以律法为进入信仰的门槛，使信徒与非信徒、得救与非得救、上天堂与下地狱，对立于鸿沟的两端。倡导将“因信称义”的神学“淡化”为“因爱称义”，宣称是因为在中国的国情与处境中，多谈上帝的爱，使在苦难之下的国民能了解上帝普及万千且无私的爱，并在人与人之间的爱，在落实于中国伦理思想中“推己及人”、“爱邻舍及仇敌”的道德理念，使福音更切合经历苦难的中国。

“宇宙的基督”是丁光训所倡导的“基督论”，他宣传是根基于对上帝的爱的了解，并连系基督于上帝所创造世界的美善的了解而来。“宇宙的基督”的神学是为配合当前中国的文化与经验，包括社会所追求的自由与社会公义，并且基督所彰显的并不是对个人的救赎，更是上帝爱所创造的宇宙。并且，基督的拯救是伸展至整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也包括建立中的新中国，而这其意义有二：

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

基督普及到整个宇宙主宰以爱为其本质。

这种物质救赎和爱世上国度的爱神学，被很多基要福音人士论证为异端，而丁氏斥反对者是不爱国不爱三自教会。

同时，丁光训认为圣经中的神迹不可信，认为耶稣复活后结束了肉体生命不是升天，认为不信基督但做到善事的，行义者，也能称义，种种怪论被批评为爱行论，既认为神爱一切并救一切物质和做义行的人。丁光训的具体思想，总结出版了《丁光训文集》支持者认为“神学思想建设”是从“和好”的概念出发的神学理念，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和发展，丁光训主教选择认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建设教会，建构出适合当前处境的神学观。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8%87%AA%E7%88%B1%E5%9B%BD%E6%95%99%E4%BC%9A

三自爱国教会或称三自教会是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在政治方面领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中国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但边缘化的中华东正教会未建立全国性教务组织或各级“爱国会”组织）三大教派三自爱国教会各有一套组织体系。中国境内拒绝接受中国政府领导的基督新教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

三自原则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中，“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养、自传”，反对宗教组织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其字面意义与以前大同小异：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

义。

“三自”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被使用，以说明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意指脱离西方教会的管辖及领导，中国人独立自主办中国教会，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国教会或多或少地采用。这个原则在实践上常常遇到从宣教士和当地中国基督徒而来的阻力。美国传教士约翰聂维斯在1885年左右试图在山东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他宣教士反应很冷淡。后来他应邀去韩国与那里的美国传教士同行分享，却广受欢迎。基督教传入韩国虽然较晚，发展却远比中国好，这是一个原因。

这个词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养、自传”，很多的中国教会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一政策。比如1906年开始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另外，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倪柝声建立的地方教会[4]，还有耶稣家庭等等，也是实行三自原则的。这些教会可称为中国自立教会。到1949年为止，从中国基督教会的总体来看，能够实施三自原则的教会还是一小部分，实施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贫穷动荡的中国，中国自立教会还处在一个成长过渡阶段。

“三自”或者“三自爱国”这两个词还隐含了服从中国政府领导的含义。在“三自爱国运动”引发的矛盾中，这个附加的含义是争论的焦点，很多原本真实实行三自原则的教会的领袖，包括王明道，都因为反对这种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而入狱。由于各种的宗教信仰、政治的动机，历史上“三自”这个词的使用中往往带着很多的弦外之音，远超过其字面意思。

1942年北平被日本占领期间，一些教会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致信王明道，称“为促进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贵教会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王明道一直以来主张政教分离，绝口不谈政治，他认为此促进会是日本人的一种政治工具，用来操纵教会，他回信道：“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鄙会堂自创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双方都宣称“自立、自养、自传”的立场，内中的意图、目的却大相径庭。

由于三自政策对于基督教信仰本身有或多或少的抵触（三自教会不需服从外国梵蒂冈教宗，天主教则要服从教宗等），加上不接受三自教会，如同天主教会要接受教宗一样（中国天主教徒要接受天主教爱国会领导），这也导致中国地下教会的兴起。

三自教会

三自教会或称三自爱国教会是指被中国政府承认，不受境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新教、中国天主教教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像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徒会堂这样的使用“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教会可以称为“中国自立教会”，以资区别。）

中国的三自教会由以下“三自爱国教会组织”管理：

基督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合称“基督教全国两会”）。

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即“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原另有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

这些“三自爱国教会组织”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监管。

中国还存在不属于三自教会的民间独立教会，这些教会的建立在理论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有观点认为家庭教会的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因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而受到政府打压。

与佛教、伊斯兰教经典不同，《圣经》没有出版刊号，在中国书店内无法买到，只能在国家许可的“三自”教会教堂或基督教两会的销售点购买，但从三自教会批量购买需要登记个人信息及用途。

历史

自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入华，其中有亦有不少冒充教士之名，从事走私、情报（参见郭士立）等不法工作，为清末和民国带来不少混乱。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5月，一些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的领袖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7月28日，发表《三自宣言》，征求信徒签名。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

项任务”。到1951年，政府称在全国70万基督徒中已有18万签名支持“三自宣言”。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全称“中国基督教会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吴耀宗出任主席。政府称这时已有40万基督徒签名支持“三自宣言”。

在这次大会中也开始了对一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的控诉运动，大会以后控诉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一些被控有罪的被移交政府，处以刑罚。这之后，三自革新运动得以控制全国大部分教会。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三自革新运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共有232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为第一任主席。

这时，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基督教领袖和团体反对三自教会。比如在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团体开会，当时在北京有60多个基督教团体，这次会议共有11个团体100多人参加。其中一些已经实行三自原则，但反对三自教会的自由派神学观点，反对教会受政府控制，不同意加入“三自教会”。会议上，以王明道为主要代表向政府直陈其词，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理由。1955年，反对三自教会的宗教

领袖陆续被捕入狱，剩下的基督徒有些加入三自教会，有些转入地下。

“三自爱国运动”在天主教方面的发展略晚一点。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以王良佐神父为首的500余名天主教徒联名发表“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提出“与帝国主义者隔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使徒书信“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给中国的天主教徒，安慰“遭受攻击”的中国天主教会，鼓励他们“传播福音的真理”，“引人从善以登天路”，申辩外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除了传教以外”并无他求”，重申非常愿意“你们国内的教区可以交给你们本国主教治理”，但是坚决反对教会“替一个国家、替一个政权服务奔走”，反对“与罗马宗座脱离关系”。1955年，许多中国天主教徒被捕。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1957年7月，皮漱石当选为主席。

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各地基督教活动大大减少，例如，上海的教堂由208所减少到23所，北京的64所教会合并为4所。

三自教会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停顿，各地教会关闭，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会议分别于1961年1月和1980年10月召开，中间间隔近2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至2008年已举行8次全国代表会议。1991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加入普世教会协会。

争议

1950年的《三自宣言》在其“总的任务”部分中说“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一些教会领袖看来，“在政府领导下”完全违背了教会以基督为元首的基本原则。比如，1954年12月1日，王明道在“顺从人呢？顺从神呢？”一文中说“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他又明确说明在哪些事情上是不能顺从人的：“基督徒应当顺从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惜做任何牺牲。我们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在发起《三自宣言》的40名新教基督徒中，只有一名大致是基要派。三自教会的倡导者吴耀宗是现代派的代表，他在1948年《没有人见过上帝》和1951年7月分别发表 “基督教与唯物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共产党教育了我”两文，说“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赞同和反对三自教会的矛盾被认为在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派（或称自由派神学）和基要派的矛盾。现代派的观点不认为圣经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所以，当他们看见共产党统治的开始，他们就放弃圣经中与此相矛盾的思想，接受政府控制教会。这种理论是基要派完全不能接受的，基要派称现代派为“不信派”。

不可否认，在中国以外的反对三自教会的基督徒中有很多人带有强烈的政

治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但在新政权以后还留在中国的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比如王明道、倪柝声、汪佩真，都对共产党的政权在原则上持相当中立的立场。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均自称中国没有类似于外国的众多教派：“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基督新教，也只有一个中国天主教。”

而实际上，中国存在着试图摆脱官方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教会，被统称为“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天主教方面，部分天主教徒只接受罗马教廷的领导而非天主教爱国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96%B0%E6%95%99%E5%9C%B0%E4%B8%8B%E6%95%99%E4%BC%9A

中国新教地下教会，或称家庭教会、地下天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官方教会“三自爱国教会”以外的、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基督新教会。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因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并且脱离控制而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打压。近30年来，它的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三自教会。

概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必须加入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活动。并接受政府的“宗教事务局”的管制与干涉。1950年7月，中国基督新教界的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宣称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此项规定引起了相当部分基督教徒的抵制，他们认为，教会的领袖应该是耶稣基督，而非顺从某个世俗政权，尤其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部分不愿接受政府管制与干涉的新教教徒在政府登记场所之外的场地开展宗教活动，他们多在信徒的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开展，所以中国新教地下教会也被称为“家庭教会”。

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一切未经官方登记的宗教组织，包括家庭教会在内，均被视为非法，它们不同程度地的规范。同时，也祇有作为三自教会分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组织，才可以在官方登记。

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的处境很不相同，差异很大，浙江（例如温州）以及部分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地方家庭教会的力量很强盛，人数也较多；而其他一些地方如河南、江苏、山东，家庭教会仍然受到很严厉的打压迫害，家庭教会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把探访家庭教会的香港或外国信徒也拘捕了（因为宗教事务条例把外国人参加家庭教会聚会视为非法），所以部分香港和外国的华人教会出于安全原因对家庭教会保持距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有些团体披着家庭教会的名义，实际上从事间谍工作，或本质上是邪教【如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呼喊派】，从事骗财，骗色甚至杀人（2014年招远围殴女子致死案）等非法活

动，亦令至中国政府需要加强规范工作。

政府打压事件

1988年3月，河南北部一个家庭教会神学培训中心被公安冲击，抓走十几个神学生，和几个教会负责人。

1999年11-12月，中共地方当局在浙江沿海城市温州附近地区捣毁或没收数百座教堂或祷告场所。

2000年秋，福建省宗教局和公安局人员8月19日到福建省长乐县金峰镇上陈堂逮捕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高依华神父和与会教友。

2001年冬，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邪教”等罪名，将“华南教会”17名负责人判刑，其中2名创办人龚胜亮及李英，分别被判死刑及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15名负责人分别被判处2年至无期徒刑不等。

2002年8月，河南永城市地方教会位于顺和镇的主要接待家庭被当地警察抓捕，两个月后，负责接待的基督徒夫妇被开除教师公职，被迫离家逃亡多年。

2002年10月，河南永城市地方教会同工刘玉屏在家中被国保大队警察抓捕，刘玉屏被关押28天，酷刑折磨，并被勒索1.5万元，同年12月，地方教会同工胡引领等人被国保大队警察抓捕。后被判刑2-3年不等。

2005年2月25日，中国警方驱逐了十几位海外福音派教会领袖。《宗教事务管理条例》2005年3月1号生效之际，中国当局对地下新教教会的迫害也在不断升级。

2008年10月16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在北京的家人遭到约15名暴徒袭击，大儿子张建遭到毒打。报导称暴徒为国保公安和派出所便衣员警，也有报导称暴徒为员警找来的无业游民。

2008年11月28日，中国民政局以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为由，宣布取缔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12月9日，包括范亚峰、郑恩宠在内的15位知名法律界人士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民政局对家庭联合会的取缔，并呼吁人大撤销违宪条例。

2008年12月9日深夜，北京警方闯入基督徒华惠棋家，将在此借宿的张明选强行押送到河北省燕郊。

2009年1月16日晚，警方再次将张明选从华惠棋家带走，并押送上一辆前往河南的汽车。此前，张明选在华家探访华惠棋91岁的父亲华再臣，并于两

名来自新疆的穆斯林人权活动者会面。

2009年2月11日下午5点，超过60名家庭教会领袖，以及2名韩国牧师，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被当地警方逮捕。截至2月16日，至少还有4人受到关押。

2009年3月8日，福建仰恩大学教师刘爱新因在自己的博客发表宣扬基督教文章而遭校方单方面解聘。

2009年6月5日早晨，北京家庭教会华惠棋牧师在太原车站转车时被抓捕，并遭到毒打。行凶的国保人员同时称："我掐死你，再让你传福音，以后再到外地我就打断你的腿。""我打你是上帝让我打的，三个月之内我凑足材料把你和你妻子一起抓起来判刑""我们国保就是专门打压你们信耶稣的"。

2009年6月10日，印发和免费赠送圣经，基督教书店老板和家庭教会领袖石维翰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三年徒刑，并罚款15万元。石维翰的其他同工亦遭判刑罚款。

2009年6月21日，成都民政部门宣布取缔秋雨之福教会。2010年8月，教会开始修订《治理章程》，并正式注册并更名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美国中部时间2009年7月3日，在中国基督新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会议闭幕之前，南阳市员警和有关当局包围会场，将与会50多名代表全部抓捕，张明选会长和20名各地分会长现被拘押在金都宾馆，逐一进行登记。

2009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当局出动400多员警及身份不明的暴徒，野蛮殴打集会所集体宿舍内的基督徒，导致百余人受伤，严重者当场昏迷不醒，被送往医院急救。同时，当局还出动推土机和挖掘机，捣毁几十间建筑物，并将聚会所内的圣经和财物洗劫一空。这段视频显示了事后当地基督徒和平集会祷告，当局试图阻止拍摄的场景，以及被毁坏的聚会场所。视频最后则显示了当地公安试图偷拍摄像被基督徒阻拦的事件。

2009年9月17日，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华惠棋被公安人员带走。被秘密关押5天后，华惠棋在5个北京国保员警的押送下在北京天坛医院与病危的哥哥华会林短暂见面。

2009年9月26日，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家庭教会带领人陈天石被迫返回老家广西玉林容县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庆典，10月3日才能返回北京。陈天石返回北京后，再次受到逼迫，可能被迫搬离刚住下两月的房子。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被迫搬家。

2009年9月26日，山西省临汾市教会继续遭受打压，教堂被武警严密监控，

禁止信徒聚会，四位主要同工杨荣丽、杨旋、李双平、杨红珍被抓走，另有多人受到监控失去人身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前夕，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领袖张明选牧师夫妇遭当局软禁，与外界失去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期间，任不寐的博客被连续遮罩三天，而该博客纯属讨论基督信仰，并未涉及政治。

2009年10月3日，山西省临汾市政府指控教会带领人王晓光夫妇违法，要彻底清理。

2009年11月3日，基督新教家庭教会领袖范亚峰博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以“政治”原因开除。此前，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2009年11月8日，尽管牧师被非法软禁在家，北京守望教会仍按原定计划在海淀公园聚会，遭到当局的骚扰，并被警告会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

2009年11月10日，上海万邦教会被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取缔，是继北京守望教会后又一个遭受逼迫的大型家庭教会。

2009年11月12日晚，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围堵万邦教会的聚会场所，信徒被迫在室外雨中举行祷告会。11月15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则把看守教堂的刘弟兄一家三口强行赶出教堂，用木板封锁所有入口，并拆毁教堂内外的广告牌。并且，还有人假冒崔权牧师之名给教徒发资讯，称取消聚会。

2009年11月22日，上海市万邦教会的崔权等四名牧师，被当局以进行非法社团活动的名义带到派出所进行审问。其中，刘全勤牧师被弄伤手指，其物品也被损坏。而崔权牧师则被审讯长达七小时。尽管牧师缺席，教会500多教徒仍然坚持在室外聚会。

2009年11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教会再次遭受打压，传道人杨荣丽等五人被法院以“非法占用土地”、“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分别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

2009年11月30日，山西临汾教会又有五位领袖被判劳教两年。其中，杨才珍、杨红珍、李双平三人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为名判刑两年，高琴和赵国爱的消息则在进一步确认之中。同时，山西临汾公安局并未出具劳教通知书，而只让家属签字。

2013年3月28日，新疆伊犁自治州新源县杨爱霞等人参加的家庭聚会受到当地政府打压，聚会场所被查封，村长也被要求限期拆毁该聚会场所。

2015年—2017年，中国政府推行基督新教中国化，修改《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使中国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家庭教会在法律层面上严格控制，不再有法律生存空间。所有家庭教会都被定为邪教加以取缔

2018年1月9日，继2012至2017年对基督新教的持续打压迫害后，山西临汾出动武警部队，炸毁了一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金灯堂。

2018年9月2日，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遭到公安、特警、消防人员共百余人冲击，教会被查封。该教会牧师黄小宁和邓庆高律师及数名信徒被警方带走。

2018年10月14日，由中国著名基督教牧师林献羔于1950年创立的家庭教会荣桂里教会遭查封。

2018年12月9日晚，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当局突袭。王怡牧师夫妇二人均遭到抓捕，同时该教会至少80名信徒也被警方带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苏交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B%8F%E4%BA%A4%E6%81%B6

中苏交恶（俄语：**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又称中苏决裂，是指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的外交、军事关系上的疏远甚至对峙冲突。

中苏分歧同时覆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层面。有鉴于两者的军事地理及历史关系复杂，双方的矛盾基本不可避免。冲突开始时间尚无定论，但大致缘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中苏论战，中共党内部分党员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感到不满，此后中共在发动大跃进并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苏联

方面依然逼还债务，1961年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与苏联方面激烈辩论不欢而散，并拒绝参加此后的苏共二十三大。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中苏两国关系彻底冻结。

中苏冲突在军事上接着发挥了作用，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达到顶峰，中国与苏联在边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对方，此后中国开始谋求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发展关系，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美建交后中国立即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一边倒政策也正式终结。

中美建交后的中苏关系一直很紧张，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至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中苏关系才得以正常化。随后苏联于1991年解体，中苏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立，然而时过境迁，新的格局也形成了，目前中俄关系继承了中苏关系。

中苏矛盾缘起

前奏

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在城市发动工人阶级的革命全被国民党镇压，因国民党重军驻守在城市），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领导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遵义会议及

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后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而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退出权力中心，自此毛泽东全面执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斯大林仍然不愿意承认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而他的成功并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奋斗，更明言“我们努力解放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本国交给莫斯科”。赫鲁晓夫回忆称，斯大林曾认为毛泽东是个“仿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限，缺乏国际眼光，局限于自己的革命经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军队向日本宣战，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期间苏联把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掠走，并没收了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满币。苏军把部分日军武器交予中共军队，却不让他们控制东北。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希望中共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合作。1945年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令毛泽东很不高兴。国共内战期间，苏联虽然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却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泽东事后认为，是因为没有听斯大林要他和蒋介石合作，革命才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歌曲《莫斯科-北京》还成为建国初期家喻户晓流行歌。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如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等多项建筑计划，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莫斯科-北京轴心”因此形成。毛泽东还于1952年赞扬这个轴

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

尽管如此，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却有很大的分歧。中国认为“毛泽东道路”，即像中国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及“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这理论“不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普遍意义”，更认为中国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经典”。苏联却不认同毛泽东的言论，认为应遵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亚洲人民以中国革命看作样板非常危险。

分歧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

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

1953年斯大林死后，195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并在1955年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斯大林的去世使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路线”。之后苏联和从前斯大林批判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搬走了压在中共头顶上的石头，但其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一般认为，赫鲁晓夫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让中共不悦。但沈志华认为，事实上，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时，中共还强令北越代表接受与南越划北纬17度线而治的提案。因而苏共二十大时，中苏还未因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妥协而产生分歧。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

军事控制中国。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赫则无法理解毛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沈志华认为，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合舰队之事大发雷霆，是为了把赫鲁晓夫骗到北京。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而就在联合公报发表后的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然而，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在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其实是狐假虎威，赫鲁晓夫被毛泽东利用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

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反对

131工程地下防核爆避难区，1968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国家准备应战，毛泽东下令汪东兴在鄂南为他修建战时住房，防核战争地下指挥部。

大跃进早期，苏联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则较为谨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开始由西方媒体曝出。1958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载文章披露了美国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月4

日在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称，公社制度对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还表示，公社支队这个词也用错了，“公社”一词缘起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非农村形态。他接着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曾尝试过公社，但行不通。随后《纽约时报》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扬访美期间发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特稿《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

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干，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此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党史研究者林蕴晖认为，这明显是讲给中国“兄弟”听的。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此举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

意识形态冲突

台海危机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事先未通报苏联。9月24日，解放军意外获得了中华民国空军发射的响尾蛇导弹，但一度拒绝移交给苏联，引起苏方不满。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拒绝支持中国。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赫鲁晓夫回忆他之所以从苏共二十二大起逐渐开始批驳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还因为中方在边界谈判中漫天要价。

U2事件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发生了U-2击坠事件，美苏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工会大会理事会上中共积极的组织活动批判苏共立场，随后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

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事实上，苏联撤走专家的确是中国继续大跃进“炼争气钢”、坚持大跃进的错误做法的原因之一。早在1958-1959年，中国已普遍出现了轻视、不尊重苏联专家，认为其思想保守的情况。

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

简言之，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使共产主义的胜利变成毫无意义之事，故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中共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周恩来更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即使核武器可能消灭“三亿中国人”，世界也会“剩下两千万美国人、五百万英国人、五千万俄国人和三亿中国人”。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1962年，毛泽东批判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退缩，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同年初夏，约6.7万中国公民从新疆边境逃亡苏联，称为伊塔事件。当年发生的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

1963年7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国，毛泽东接见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

领土争端

中国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两条不平等条约中被帝俄夺取大量领土。后来苏联煽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古成为苏联一个卫星国。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未向苏联清算中国向俄国的失土，却惹来苏联谴责毛泽东像希特勒般寻求“生存空间”。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40号进行了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帕维尔·泽里亚诺夫、副团长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5月初，泽里亚诺夫乘飞机回到苏联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国。7月初，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苏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但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会面，一日本代表就要求归还被苏联

占领千岛群岛征询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讲："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

7月30日，苏方要求将会议地点设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涌泉提出，若苏方不让步，中方有权采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方将此解读为"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配有评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 8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曾6月达成的协议和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是"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代表团会面时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毛泽东于是表示要准备防止苏联入侵的战争，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做战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苏联入侵东北时的进攻路线。

中苏方面皆声称乌苏里江中珍宝岛是自己的领土，而中国方面称苏联在占

领中国领土。1969年3月，中苏两国于珍宝岛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中方称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事实上首次冲突中，中国军队突袭苏军，而苏军在第二次冲突中报复。其后两国再于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边界线上发生冲突。

赫鲁晓夫下台后

反修论战白热化后，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中共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人，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烈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康生、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

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则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未立即回应。周恩来随即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周恩来一行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时取道中国北京，协调双方援越抗美的立场，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中方拒绝了苏联有关建议。

双方军事策略

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中国对苏联军事行动表示出了深切的担忧，并进行广泛的备战活动。珍宝岛冲突后，华沙条约组织采取了与对抗北约同样的对抗威胁针对中国，苏联则一度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苏没有断交，但除了中国允许苏联经中国给越南战争中的北越运输物资之外，两国关系彻底冻结。1967年，红卫兵攻击了苏联驻北京使馆。

1967年，中国成功试爆氢弹，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氢弹实验是针对华约集团的核威胁的一次重大反击。

1967年1月，发生莫斯科红场中国留欧学生被殴打事件。

1967年冬至1968年初，在中苏边界发生七里沁岛事件。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时，苏联在那里有12个不满员的师和两百架飞机，在1968年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同时苏联和蒙古达成协议，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达兰扎尔嘎朗、宗巴音）。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在越战期间将大量军队从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1968年10月，与苏联克格勃有关的《伦敦晚报》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到台湾秘密访问十天，路易斯见到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蒋经国，提出苏联想与台湾联合进攻中国大陆的想法。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人防工事。

1969年4、5月间，维克多·路易斯紧急要求台湾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单。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台湾指派人员赴欧洲与苏联联络，并称一旦战事开始，不便联络。希望台湾在下次会见时开出所需军备清单。路易斯声称武器不必直运台湾……而可在台湾反攻时运达登陆地点。苏联需台湾反攻详细计划。例如如何利用苏联军事基地的具体方式、在何种区域所需何种和数量的武器等。台湾登陆期间苏军会制造与中共的边境冲突事件。出于对苏联与路易斯的提防，蒋介石拒绝与路易斯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种类的谈判。

1969年8月，中苏双方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秘密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1970年代，为了震慑中国，苏联方面派出“东京急行”轰炸机机队，除绕飞日本外，更迫近中国华东沿岸。

中美苏三角关系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访华，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苏联闻讯之后也和尼克松展开峰会，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

1970年代初，虽然中国继续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但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苏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站在苏联一边，而中国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中越战争。苏联谴责中国，但没有诉诸武力。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办的198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与苏联交好的国家也一并受到中国的排斥，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曾被指为“背叛了革命”“实行法西斯统治”。

和解

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塔什干讲话”，对中国语气友好，被认为是中苏解冻的早期讯号。在勃列日涅夫及其两位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中国分别派出黄华、万里、李鹏率领的官方代表团与苏方接触。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新近掌权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传话；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再次表明这一态度。

随着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扎大幅减少和从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得以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和上海，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苏联为此表示遗憾；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回访莫斯科。

解体后续

1991年，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互动浪潮，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了，在苏联解体之后，分裂成多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先后建立外交

关系，但这中间因为有当年历史因素存在，中国与前述的各个加盟国之间，还尚待解决并取得共识。

1993年，中俄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罗斯及四个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元首开会，形成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在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先后访华之后，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归还中国，官方宣布两国边境问题“彻底解决”。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东欧各前苏联卫星国与中国，中俄两国关系，加盟国之间关系，均日益密切。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印边境问题上，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和境内恐怖组织及分离主义势力。

===
===
===
===
==

____

中国的外交局面

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其实没有真正的朋友。1980年代以前，中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二战以后，——因着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进步【这是近代以来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所直接导致的结果；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因着科学发展而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刺激的作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处于经济腾飞、社会人文大发展的时代；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却一直贫穷落后，处于封闭而愚昧的状态之中。

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外交局面极其孤立。在世界上，中国没有任何真心的朋友。在经济上，中国自立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之外。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政策。

但是，在思想、文化、言论、出版、信息交流、结社、宗教信仰等等领域，直至今日，中国仍然处于严密的、铁桶一般的禁锢统治之下。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亿万中国人民虽然在经济活动方面具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中国人仍然仿佛奴隶一般，被奴役、欺骗、压榨、驾驭。对于外部世界，中国人其实知之甚少；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法律、历史、经济、哲学思想等等，大多数人也更是几乎一无所知。

这种局面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局势。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虽然在经济贸易方面与世界各国都进行了密切的互动往来，但是，在价值观念上、文化交流上、尤其是人民之间的精神交往方面，中国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这种孤立局面，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残暴专制主义极权统治，必将再次把中国带入衰落、动荡、与全世界为敌、甚至生灵涂炭的局面之中。

——————————————————————————————————

中国的经济发展景况

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下【只有经济总量由于人口自然增长而导致的简单化再生产，却没有任何经济技术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质的增长和飞跃】。亿万中国人民都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中，承受着粮票、布票、糖票等等各种严厉的供给配额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罪恶与愚昧统治，往往是罄竹难书。我们就不再在这里赘述。

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文学等等的发展

相对于愚昧落后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方面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人类更大的戕害，尤其是表现在教育、文化、思想、文化等等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例外。自从1949年以后，甚至直到七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文学等等的发展就处于万马齐喑、残酷禁锢的状态。在1980年代以前，无数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打击和残酷迫害。这种迫害的深度、广度、对于人心灵的

戕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帝王的时代。在1980年代以后直至今日的四十年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仍然处于严密的、密如铁桶一般的钳制和禁锢下。犬儒文化盛行；文人娱乐至死；整个国家处于大规模的、病态的、无所不及的、扭曲文化价值观念的乌云密布笼罩之下。

____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传统所受到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传统也受到了致命性的冲击和损害。1980年代以前，“破四旧”运动使得中国正式告别了传统价值观体系。1980年代以后，全民落入了物质主义泛滥、笑贫不笑娼的可悲思想文化潮流之中。198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台湾商人们的大举进入大陆，泛神主义、偶像林立、佛道文化、风水文化的等等愚昧迷信落后的思想观念，对于精神空虚的亿万中国人而言，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____

中国的政法史经哲

1949年以前，中国主流的政法史经哲【政治、法律、历史、经济、哲学思想】观念，处于一种混乱、矛盾、参杂、泥沙俱下、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状态。一方面，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思想传统，在中国社会中仍然牢牢地占据着主流性的、甚至统治性的地位；另一方面，现代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科学、进步等等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来自于西方文明体系的积极进步影响，在中国社会文化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广泛的涟漪性影响。同时，在中国社会许多层面，虽然——基督教处于中国主流社会中的少数状态，但是，基督教信仰一直在蓬勃有力地发展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生命中第一次认识了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主宰，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看见了上帝的无限圣洁、公义、恩典、慈爱。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基督的教会一直在蓬勃有力地发展着【尽管，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教会外部，都充满了各样的重重阻碍、困难、甚至矛盾与纷争等等】；许多中国人，以敬虔热忱的信仰和生命，见证着那位伟大救主的恩典慈爱与圣洁。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在政法史经哲方面的种种生机勃勃的发展状态嘎然而止。在1980年代以前，除了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上

帝的恩典并没有离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七十年中，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发生了惊人的增长；甚至在许多地方的人口比例上，基督徒数量【按人口比例计算】远远地超过了所谓“民主自由政治”下的台湾。在世人的心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在世人的心中，都有着追寻真相、追寻真理、追寻信仰的渴望。人的心灵，只有在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那位永生之神那里，才能够找寻到真正的平安、幸福、寄托与盼望。

+++
+++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1-3章】

罗马书.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

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

2.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　神的忿怒，就是他彰显公义

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忿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并不偏待人。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因为在　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　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　神夸口，

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

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

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

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　神吗？

正如经上所说的："　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

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

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　神来的。

罗马书.

3.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

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

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

++

++

____

个人崇拜、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世人的心当离开了那位伟大的上天、那创造了宇宙天地、创造了世人生命之主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地上为自己寻找偶像，把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和样式来代替。他们以那被造之物，来代替那造物的主，并自欺欺人地在内心深处对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顶礼膜拜、五体投地。他们让自己的生命沉浸在罪恶之中，用狡诈欺谎的心思意念，戕害自己的灵魂。

这一点，我们在纳粹主义的统治体系中，以及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体系中，都能够清晰地看见。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否定那对于上帝的敬虔信仰，并把地上的荣华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中心【纳粹主义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以日耳曼民族为中心的伟大国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唯物主义观念为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纳粹主义强调日耳曼民族的光荣和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劳动人民的光荣和伟大【在这里，我们并非是要否定日耳曼民族的勤劳优点，也并非是要否认劳动人民的可敬；而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是以什么为我们心灵、生命、灵魂的归依】；它们两者都忽视、或故意无视在世人心中的罪，都忽视、或故意无视那对于上天之敬虔谦卑信仰的核心重要性。

世人当离开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时候，就会在这地上为自己寻找"超人"、"伟人"、"强人"，以之为自己心灵的归依、信仰的对象；他们以成败论英雄，以功利主义看待道德价值观念，以外貌评断世事；他们在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罗、齐奥塞斯库、萨达姆等等这样的"伟人"面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无限崇拜。然而，他们在内心深处的自欺欺人的谎言，终究要被现实世界无情地击碎。无论是个人崇拜，还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等思想，它们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无可置疑地显明了，世人的心灵与灵魂，当离弃了那宇宙天地之主的时候，将会处于何等地悲哀、可鄙、荒谬的状态之中。纵观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尤其是，如果我们深思马克思列宁主义泛滥的政治经济历史，——我们就会看见，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得势的地方，往往恰恰是在那些传统文化思想中没有敬虔真挚热忱之对于上帝的信仰的文化土壤之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基督教信仰简介》】

。。。。。。。。。。。。。。。。。。。。。。。。。。。。。。。。
。。。。。。。。。。。。。。。。。。。。。。。。。。。。。。。。
。。。。。。。。。。。。。。。。。。。。。。。。。。。。。。。。
。。。。。。。。。。。。。。。。。。。。。。。。。。。。。。。。
。。。。。。。。。。。。。。。。。。。。。。。。。。。。。。。。
。。。。。。。。。。。。。。。。。。。。。。

第一章

人生命的匮乏

人的自然品性，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情境下，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在程度上和层面上的表现或许有些不同，但却都是大同小异。人生命在本质上的匮乏，是一样的。

若要进一步了解这种匮乏指的是什么涵义，那么，我们要考虑三个问题，即，这种匮乏之状态的起源、性质与程度。

罗马书1章18节-32节：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

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I。人生命中之匮乏的本质景况。在所有人的心中，都存着不恰当的自爱，或自私。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以自己为自己的神，把自己的个人情感、喜好、尊严、利益等等当作是最重要的东西，并以此代替上帝在他心中的位置。人的生命中之匮乏的本质景况，正是在此。人的生命和灵魂，成了自己的属肉体血气的情感与罪性的奴隶；在人的生命中，把那些东西当作是自己的人生目标、终极价值和意义，并以此取代上帝。这种看重个人情感与利益的立场，体现在人的所有道德价值与言语行为中。一个自然的人，在一切计划和追求的目标中，都是建基于以自己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同心圆，比如，自己的家庭、亲人、同乡、朋友、同学、社区、地域、民族、国家，等等。究其本质而言，人所追求的、所看重的，仅仅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利益而已。

这种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在社会交往、商务往来等等活动中，会以各样口头的协议、或是书面的协约的形

式，彼此达成约定、契约，来互相保护好各自的利益，以促进公平的交易和各样事务。

在人类各项事务中，这种小心警惕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人心中的自我中心、自私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种自我中心的情感，导致了人生命中的轻轻乎乎、傲慢、不诚实、虚假、缺乏正义，等等。人生命中之所以具有这种缺乏性，其根本原因，难道不正是由于人在内心深处只爱自己，而缺乏对上帝之荣耀的敬畏和爱戴，也缺乏对于他人利益的根本性关心吗？

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因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自然喜好和情感等等性质本身是无辜的；然而，由于人在内心深处背离了上帝，所以，这些喜好和情感等等成为了人生命之主，进而，人的生命成为了属肉体血气的生命，沉浸在贪婪、纵情、自私和邪僻之中。圣经歌罗西书3章5节讲到，这些罪，就比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歌罗西书3章6节讲到：因着这些事，神的忿怒必要临到悖逆的人。

世人的偶像和迷信的信仰，就是把被造之物当作造物主去事奉、敬拜；即，把那些雕像或是金钱、声色犬马、房屋与亲人、等等，当作是自己生命的终极归宿和倚靠。如果人在心里对上帝有一颗敬虔的、专诚的爱戴之

心，那么，人并非不可以喜欢世上的良辰美景、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只要后者的这种“喜欢”，不是根本性的、终极性的，而是正当的、合乎道德原则的、有节制的、是从属性的，那么就不是罪。

然而，罪人却倚靠自己的“智慧”，不在心里面敬畏和寻求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主，从而，在他们的心中把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把上帝的不能朽坏的荣耀当作是那必朽坏的受造之物的荣耀；“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罗马书1章22、23节）”

世人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早已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以自己为自己的神，高举自己，高举受造之物，从而离弃了那创造生命的主、永生的真神。

圣经中很多地方都清晰地、毫不妥协地、斩钉截铁地指出人生命的这种实际景况——以自私、不恰当的自爱为本质的，生命中之缺乏的光景。

赞，

提摩太后书3章2-4节：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亵渎、悖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恶言中伤、不能自律、横蛮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　神。

诗篇10篇4节：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在他的一切思想中，都没有　神。

诗篇12篇4节：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取胜；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作我们的主呢？"

以西结书29章3节：你要说：'主耶和华这样说：埃及王法老啊！我要与你为敌，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海怪，你曾经说过："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

约翰福音5章44节：你们彼此接受称赞，却不寻求从独一的　神而来的称赞，怎么能信呢？

腓立比书2章21节：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

腓立比书3章19节：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事。

雅各书4章1节：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

雅各书4章6、7节：但　神所赐的恩更大；所以圣经上说："　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应当顺服　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

箴言13章10节：傲慢只能引起争端；接受劝告的却有智慧。

何西阿书5章5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以色列和以法莲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与他们一同跌倒。

彼得后书2章10节：尤其是那些随从肉体，生活在污秽的私欲中，和轻蔑当权的，更是这样。他们胆大任性，毫无畏惧地毁谤在尊位的。

彼得后书2章3节：他们因为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话，想在你们身上图利；惩罚他们的，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盹。

路加福音16章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 神却知道你们的心；因为人所高举的， 神却看作是可憎恶的。"

____

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像上面的这些段落一样，都一致性地指出了，人的自私是生命中罪的一个主要根源。人的不恰当的自爱，是骄傲、自满、嫉妒、冷酷、贪婪、顽梗、憎恨神，等等许多罪的深层次原因。（提摩太后书6章10节）指出，人的贪财，正是许多罪的根源；而贪财，也正是不恰当的自爱的表现。这样的人活着，生命就只有一个价值目标和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肉体血气，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显然，这样的罪是导致人在言语行为上许多罪的原因。

显然，在人心中憎恨神的罪（包含着许多刚硬顽梗、罪恶暴戾的情感）也是出于人心中的谬误的自爱自傲。在人的具有道德属性的行为中，追求幸福是一个根本性的必要动机。然而，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来源，一种是来自于上帝的圣洁与荣耀，一种是来自于世界的欢愉和声色犬马。这两种幸福来源如此不同，以至于圣经雅各书4章4节讲到，与世界（以及其中的声色犬马以及属肉体血气的欢愉）为友的人，就是与上帝为敌。

没有人能够事奉两个主，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喜爱这个、轻看那个。马太福音6章24节讲到，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财物）。

因此，在道德与信仰的领域中，不作为、态度冷淡，却同时又良善，是不可能的。马太福音12章30节说到："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

我一起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因此，即使我们没有干杀人放火的大奸大恶的罪恶行为，但如果我们不行良善之事，那么，我们也会受到公义的审判。

上帝要求我们，应当倾尽自己的精力、才能、生命、时间、等等，来努力地行良善之事，来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事奉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而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和律法，那么，我们就必将受到上帝的公义而终极的审判。马太福音25章45节说到：“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作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作在我的身上了。’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因此，我们或是以这个世界本身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或是以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为我们所尊崇的最高对象、我们的生命与价值的终极倚靠、我们的一切盼望的最高目标和归宿。自然的人、沉浸在罪中的世人，以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被造之物（包括自己的生命）为依归，敬拜尊崇受造之物，远超过对于那造物之主的敬拜和尊崇。所以，世人的这种自满、自义、自傲、自爱、自私，在世界中、在被造之物中的满足与倚靠，就是直接地与上帝为敌，因为上帝的品质、律法、福音，都是与这世界的虚浮繁华和财富、欢愉、虚浮的荣耀为敌。

人们在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等之中的外在行为、形式主义上，也沉浸着这种自爱和自傲的心理。很多人外表敬虔，但是，他们的种种行为都或是为了得到旁人的称赞和仰慕（正如圣经福音书中所常常提到的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那样），或是为了以此使自己可以在上帝面前邀功、积功德。人们谬误地以为，自己的外在行为，就可以使自己在上帝面前得到奖赏，而不需要内心深处的、生命本质中的真正悔改与真正敬虔的信心。

另外还有一点，也可以说明人生命本质中的这种缺乏的景况。圣经把圣洁（以及圣洁之爱）看作是自私的对立面。哥林多前书13章4-7节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马太福音22章39节，出埃及记20章16、17节，都说到："我们要爱邻舍如己。"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腓立比书2章4节也说到："各人不应当寻求自己的益处，但要求别人的益处。"

加拉太书5章26节：我们不可贪图虚荣，彼此触怒，互相嫉妒。

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马太福音10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属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属我的；

路加福音14章26节：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爱我不超过爱”原文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加拉太书5章24节：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

圣经充足地指明了，圣洁是自私的对立面，而人生命本质中的缺乏，正是源于这种自私、不恰当的自爱的景况。

II。人的生命本质中这种缺乏之景况的严重程度。从两个意义上来说，这

种严重程度是普遍的。所有人的生命本质都是缺乏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本质都是彻底地缺乏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完全没有任何圣洁的渴望和情感；人在具有道德属性的任何行为上，都是全然败坏、有罪的。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上帝在罪恶之人、罪恶之事上，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约束，使人不能为所欲为地尽情行恶。比如，上帝使人——看重声誉；希望得到尊敬；尊重亲友的感受和利益等等。通过这些方法，也通过使罪人在行恶的时候感到痛苦与自责，上帝限制、约束人的忿怒。然而，罪人会慢慢地胜过上帝所放在他心里的那些障碍，从而，变得越来越败坏、罪大恶极。而那些刚硬顽梗、不从罪中悔改的人，将与堕落的天使一道，受到上帝的终极的公义审判，并要承受永远的地狱刑罚。

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本质上都处于彻底的败坏之中。在我们心灵与灵魂的深处，一无所是，一无所夸。我们若不悔改，就都要面临上帝的终极公义审判，承受可畏的永远地狱刑罚。

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外表言语行为等等的表现上，都是同等程度地罪恶。显然，有的人要比另一些人表现得更加罪恶。诗篇10篇3节："恶人夸耀心中的欲望，他称赞贪财的人，却藐视耶和华。"那些内心不知满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贪得无厌。那些内心没有怜悯、铁石心肠的人，与心中想要寻求良善、想要知道怎样行事才能得到永生的少年人，肯定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这两者之中，都没有圣洁。

人心中的全然匮乏、彻底缺乏的景况，并不意味着，人就不知道友谊、同情等正面的情感。人的很多出于自然的情感，就其本身而言是好的；这些情感所导致的行为，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这些自然的情感，即使在最可爱、最卓越的状态下，也并不具有圣洁的本质。它们存在于人的心中，然而人的心却不认识圣洁。这世上有的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中规中矩，遵纪守法，但是，他们并不寻求那创造生命的主，并不向他祷告祈求，也不饥渴慕义；他们的心里，并没有良善的、属天的盼望。他们的心中，仍然谨守着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愿意与整个宇宙对抗。即使当他们得到了最大的财富和利益的时候，他们的心中仍然不认识、不寻求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他们停留在天国的门槛之外。他们从大海里拾起一滴水，就把那当成了永生的海洋、生命的泉源。

人生命本质中之彻底缺乏的景况，并不意味着，人所作的任何外在行为就都是错的。圣洁属神的言语行为，有着外在的表现，也有着内在的生命大

能。那些信仰虚伪的人，只看重外在行为的表现，却在内心深处并不真正认识信仰的大能大力、宝贵价值。

外在的行为表现，尽管初浅地看上去，可能是好的、貌似是敬虔的，但实际上，背后却仍然可能包含着想要得到人的称赞、或是为了自私的积功德的目的；其生命的本质，仍然没有对于上帝之荣耀的追求与渴慕。一个富有的人，外在表现很好，总是很准时地来参加教堂的敬拜活动，并热衷于各样捐献的事业；但是，当他被圣灵光照的时候，当福音的圣灵进入他的内心的时候，他说："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有生以来的一切事，都满含着自私自傲与自义。"人在信仰中的某一些行为可能是对的，但是其内心的景况却可能仍然是根本不认识神，仍然是被自我充满，仍然是缺乏圣洁之爱。

马太福音23章23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就如正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作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

一个人可能在遵守上帝之律法的外在行为上是对的（利未记27章30节：地上的一切，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但是，却可能根本不明白上帝律法的精神和主旨。

马太福音23章24-28节：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啊，你们把蚊虫滤出来，却把骆驼吞下去。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抢夺和放荡。瞎眼的法利赛人哪，先把杯和盘的里面洗净，好使外面也可以干净。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照样，你们外面看来像义人，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不法。

____

人生命本质中的匮乏之景况，并不意味着，罪人就是无可选择地、无可奈何地、无法抵抗地，非得犯罪不可。我们的良知有力地见证了，我们的内心犯罪、背离神，是自愿的、自主决定的结果。如果有人想要辩解说，自己的犯罪是不得已的，那么，他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用欺谎的语言，自己欺骗自己。耶利米书7章8-10节："可是，你们竟然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怎可偷盗、凶杀、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跟从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神，然后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说：'我们安全啦！'你们这样就可以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吗？"

人生命本质中的匮乏之景况，意味着，人在生命本质中背离了上帝、背离了圣洁；在人的情感和行为中，在人的道德品质方面，人都是全然有罪的。世人这种普遍的生命中的罪性和罪行，表现在世人从父辈、祖先那里得来的遗传和继承，表现在世界的历史中，也表现在圣经的宣告中。

1. 世人从父辈和祖先那里得来的遗传和继承。

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总是倾向于罪。从肉体生的，就仍属肉体。我知道在我的里面（肉体），没有良善。所有的世人都成了罪人，这本身说明了人的本质是多么强烈地倾向于罪，说明了人生命的本质中是多么不圣洁。整个世界都是伏在罪恶之中（约翰一书5章19节）。

2. 世界的历史证明了，世人生命的本质中是何等地充满了罪。

世人的历史，就是一个自私的历史，是欺压、压榨、残酷、流血、以及所有各样罪恶的历史。在这幅画面中，人的自然情感有时会显出一点明亮的

影子，但是却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圣洁。请看圣经旧约和新约中所记述的世人品格。在约伯记、诗篇、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等之中所讲述的罪恶，都应当让听见的人心中震撼。这些记述，真实地映照了世界古老的历史。在亚当夏娃犯罪几代之后，世人就充满了罪恶，在上帝面前全然败坏。全地遍满了罪恶（创世纪6章11节）。在大洪水的审判和惩罚之后，人类只有义人挪亚一家得以存留。然而挪亚的后代也很快落入败坏的境地之中。（创世纪9章25节）记述了挪亚的醉酒，儿子含的错，以及含的儿子迦南受到的咒诅。（创世纪11章）记述了，世人想要建造巴别塔，显示自己的荣耀。（创世纪19章）记述了，所多玛与俄摩拉罪大恶极，以至于被上帝从天上所降下的火灭尽。在这个灾难以后，罗得和两个女儿虽然获救，然而，他的两个女儿却立刻在罗得醉酒的时候犯下乱伦之罪（创世纪19章31-35节）。

在上面这件事情中我们看见，无论是可畏的审判惩罚，还是恩慈的搭救，都不能让罗得家人脱离罪恶，脱离生命本质的匮乏之光景。这不正显明了，在世人的心里、眼中，根本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吗？我们可以一直追溯人类的历史，一直到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在那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所看见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一点，在以色列家、上帝所拣选之民的历史中，也清晰地显明。在西乃山脚下，就在上帝刚刚以威严可畏的记号与异象，把十诫律法向以色列人显明以后，那些以色列人却立起了金牛犊，敬拜那可憎的偶像。犹太人一代又一代地跌入偶像之罪，一代又一代地落入各样的罪恶与欺谎之中。虽然他们经历了上帝向他们所行的许多神迹、恩惠、启示、审判，然而，他们却仍然始终沉浸在罪恶里。他们杀了上帝所差遣来的先知，用石头打死那些来严厉指责他们罪恶的人；最终，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们恶贯满盈的罪。耶

利米书6章6、7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砍下她的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她是那该受惩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的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怎样涌出恶来；城中常常听到强暴和毁灭的事，在我面前不断有病患与创伤。耶路撒冷啊！应当受警戒，免得我的心与你疏远，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人心是多么倾向于罪，这显明在大卫的行为中，显明在所罗门的生命里，也显明在彼得、以及一切义人的言语行为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上帝没有约束世人，没有不断地督责他们，而是任由他们凭己意行事，那么，世人的品格和罪恶会演变成何等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得不得看到，在人生命本质的光景中，是彻底的、全面的匮乏。在人的里面充满了罪，一无是处，一无所夸。无可置疑，人的自然内心是彻底败坏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满了这种灾荒、恶疾一样的罪。

上面着重回顾了圣经旧约所记述的世人品格。在圣经新约中，我们也能够看见同样的凄凉画面。罗马书第一章就讲述了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敬畏神、反而沉浸在各样罪中的可悲景况。罗马书第三章讲述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是一同沉浸在罪中。

罗马书3章1-20节：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

益处呢？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满口是咒骂和恶毒；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加拉太书5章19-21节：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竞、忌恨、忿怒、自私、分党、结派、嫉妒、醉酒、荒宴，和类似的事。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　神的国。

世界的历史，真实地与圣经中的这些记述相吻合。今天世界的光景，仍然与罗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相同。我们看一看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逼迫、屠杀，都是出于人的自私、嫉妒、纷争以及各样的罪。还有许多表面自称基督徒、但却从未真正认识福音之大能的虚伪信仰者，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上，也做出了许多谬误和罪恶之事。

3. 圣经的更多的直接见证。

约翰福音5章42节：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　神的爱。

创世纪6章5节：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

创世纪8章21、22节：耶和华闻了那馨香的气味，就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我也必不再照着我作过的，击杀各样的活物。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

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

传道书9章3节：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有一件令人遗憾的，就是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并且世人的心充满邪恶，一生心怀狂妄，后来都归到死人那里去。

诗篇14篇1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

箴言15章8、9、26、29节：恶人的祭物是耶和华厌恶的；正直人的祷告却是他所喜悦的。恶人的道路是耶和华厌恶的；追求公义的人却是他所爱的。

箴言15章26节：邪恶的思想是耶和华厌恶的；恩慈的话却是纯净的。

箴言15章29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垂听义人的祷告。

路加福音16章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　神却知道你们的心；因为人所高举的，　神却看作是可憎恶的。"

马太福音12章35节：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心"原文作"库房"）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他邪恶的心（"心"原文作"库房"）发出邪恶。

以赛亚书1章：在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诸天哪！要听。大地啊！要留心听。因为耶和华说："我把孩子养育，使他们成长，他们却背叛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唷！犯罪的国，罪孽深重的子民，行恶的子孙，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转离了他。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整个头都受了伤，整个心都发昏了。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创伤、鞭痕和流血的伤口；没有挤干净伤口，没有包扎，也没有用膏油滋润。你们的土地荒凉，你们的城镇被火烧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面前给外族人侵吞；被外族人倾覆之后，就荒凉了。仅存的锡安居民（"居民"原文作"女子"），好像葡萄园中的草棚，瓜田里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镇。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下一些生还

者，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一样了。你们这些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些蛾摩拉的人民啊！要侧耳听我们　神的教训。耶和华说："你们献上众多祭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肪，我已经够了；公牛、羊羔和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的时候，谁要求你们这样践踏我的院子呢？不要再带没有意义的供物来了，烧献祭物的香气也是我厌恶的。我厌烦月朔、安息日和集会；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是我不能容忍的。你们的月朔和制定的节期，我心里恨恶；它们都成了我的重担，我已承担得不耐烦了。所以你们张开双手的时候，我必掩眼不看你们；即使你们多多祷告，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沾满血腥。你们要洗涤自己，洁净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指责残暴的人，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愿意听从，就必得吃地上的美物；你们若不听从，反而悖逆，就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忠贞的城，怎么会变成妓女！她从前充满公平，有公义居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成了渣滓，你的酒用水搀混。你的官长存心悖逆，与盗贼同伙；人都贪爱贿赂，追索私酬；他们不替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呈不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仇敌报复。我必把手转过来攻击你；我要炼除你的渣滓，如同用碱来炼一样，我要除去你的一切杂质。我必恢复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也必恢复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以后，你必称为公义的城、忠贞的城。"锡安必因公平蒙救赎，城中悔改的人也必因公义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也必灭亡。你们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愧，必因你们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像一棵叶子凋落的橡树，又如一个缺水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絮，他所作的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没有人能扑灭。

马太福音23章：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繸子做长了；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有些抄本有第14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假装作冗长的祷告，所以你们必受更重的刑罚。"）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使一个人入教；当他入了教，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圣所而起的誓，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圣所的金子而起的誓，就必须遵守。'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哪，到底是金子大，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你们又说：'凡指着祭坛所起的誓，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坛上的祭物所起的誓，就必须遵守。'瞎眼的人哪！到底是祭物大，还是使祭物成圣的祭坛大呢？所以，凡指着祭坛起誓的，他就是指着祭坛和坛上的一切起誓；指着圣所起誓的，就是指着圣所和住在那里的　神起誓；指着天起誓的，就是指着　神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起誓。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就如正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作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啊，你们把蚊虫滤出来，却把

骆驼吞下去。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抢夺和放荡。瞎眼的法利赛人哪，先把杯和盘的里面洗净，好使外面也可以干净。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照样，你们外面看来像义人，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不法。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你们建造先知的墓，修饰义人的碑，并且说：'我们若活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决不会与他们一同流先知的血。'这样，你们就指证自己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了。那么，去完成你们祖先的罪孽吧！你们这些蛇，这些毒蛇所生的啊，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因此，我差派先知、智慧人和经学家到你们那里；有些你们要杀害又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一个城赶逐到另一个城。所以，从义人亚伯的血起，到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为止，他就是你们在圣所和祭坛中间所杀的，所有义人在地上所流的血，都要归在你们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临到这个世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把奉派到你们那里的人打死。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招聚小鸡到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你们的家必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一定见不到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马太福音25章31-46节："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

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又什么时候见你作旅客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有看顾我。'他们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作旅客、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监里，却没有服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作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作在我的身上了。'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

圣经中还指出，人必须要重生，否则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哥林多前书2章13、14节："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或译："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　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

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原是　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　神预先所安排的。

提多书3章3-7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被各种私欲和逸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然而，到了　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　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既然因着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____

罗马书10章4节：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

提摩太前书1章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约翰福音1章29节：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哪， 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
。。。。。。。。。。。。。。。。。。。。。。。。。。。。。。。。
。。。。。。。。。。。。。。。。。。。。。。。。。。。。。。。。
。。。。。。。。。。。。。。。。。。。。。。。。。。。。。。。。
。。。。。。。。。。。。。。。。。。。。。。。。。。。。。。。。
。。。。。。。。。。。。。。。。。。。。。。。。。。。。。。。。
。。。。。。

第二章

救赎

“救赎”这个词语意味着：解救、免除、弥补；以及“和好”。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词的意思也指“遮盖”；意味着，人的罪因牺牲之祭而得到“遮盖”、“赦免”、“饶恕”。在希腊语中这个词语的意思还有“赎金”“赎价”“解救”“释放”的涵义。

救赎这个词语与基督相连的时候，意思是，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为赎罪祭，满足上帝的公义，使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因着悔改和信心，罪被赦免，而免除上帝终极的公义审判和惩罚。

基督的救赎包含了他为我们所作的一切，尤其包含了他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承受的苦难。彼得前书3章18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　神面前。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　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提多书2章14节：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作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工。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与他联合，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上帝的饶恕赦免，被称义，成圣，得救；这一切都单单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赎罪宝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赎罪恩典。哥林多前书1章30、31节：——你们因着　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

基督有着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他的苦难与死亡，为我们尝清了罪债，使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赦免。基督为了罪人的缘故，顺服在律法之下，使我们得以称义。因着基督的救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洁净我们的心灵；圣灵以他的大能，保守圣徒，使众圣徒持守信心，直到进入那永生的国度；圣灵使我们的生命成圣。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建基于耶稣基督的赎罪祭。

以赛亚书53章：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佳形，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　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

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作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致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养　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罗马书5章9节：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神的忿怒。

彼得前书2章24节：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

启示录5章9、10节：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　神，使他们成为我们　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

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罗马书5章19节：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

赦罪、称义与成圣这三件事情是紧密相连的。上帝使那被他饶恕赦免的人，被称义，并使他们的生命成为圣洁。赦罪，指的是我们的罪得到饶恕赦免；为了得到赦罪之恩，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悔改己罪，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称义，指的是我们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中，在上帝的律法之中，我们被上帝称为义；我们的称义，是由于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公义；我们因信而得到那

恩典（罗马书5章19节；罗马书10章4节；罗马书3章24节；罗马书5章1节）。成圣，指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洁净我们的工作和影响，使我们逐渐成为圣洁的生命样式。

赦罪、称义、成圣，这三件事情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罪性和罪行。我们的良知也告诉我们，罪人必须需要赦罪。

自古以来的异教传统，有着各种各样的献祭的仪式，甚至其中有很多可怕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也常常刻苦己身、忍受痛苦，想要通过这些方法来平息众神的愤怒，获得众神灵的恩惠。虽然，他们早已失去了对于那永生真神的认知，但是，他们凭着自然的情感也知道，若没有赎罪的方式，人的罪就不能得到神的饶恕和赦免。

每一个谦卑地承认己罪的人在内心都会知道，需要赎罪祭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罪之恩。可是，“我怎样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要带着什么来到他

的面前，向他俯伏敬拜呢？” 我要带着燔祭、赎罪祭、祭牲吗？那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岂会需要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河吗？弥迦书6章7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什么呢？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的这种情感（即，我们若要得到上帝的饶恕赦免、与神和好，就必须需要某种形式的赎罪之祭），在圣经中是有确定的根据的。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与此相关的重要事情，就是在人刚刚犯罪背离神的时候（创世纪3章15节）；在那里，圣经就已经隐含地指出了，那上帝所设定的救赎恩典，在预定之时间到来的时候，将要完全地成就。创世纪4章4节记述了关于第一次献祭的事；创世纪中也讲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献祭的事；整本圣经旧约都详细讲述了许多关于献祭律法、礼例、仪式、制度、典章等等许多事情。在圣经新约希伯来书中，讲述了，那许多祭牲的献祭并不能除罪，而是预表了，罪人需要那更大的赎罪之祭。希伯来书也讲述了，旧约献祭律法中的几乎所有内容都讲到了洒血；若没有血，就不能赎罪。希伯来书9章22节：“按着律法，几乎所有都是用血洁净的，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希伯来书10章1-4节：“律法既然是以后要来的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本体的真象，就不能凭着每年献同样的祭品，使那些进前来的人得到完全。如果敬拜的人一次得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那么，献祭的事不是早就停止了吗？可是那些祭品，却使人每年都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把罪除去。”

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死亡，他的圣洁无罪的生命，他在客西马尼园的伤愁痛苦，他在被钉十字架时的苦难，都显明了，他来到世上的非凡目的。他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到伤害，为我们的罪孽而承受痛苦；我们所应受的责罚落在他的身上；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他的痛苦使我们得到和平。

以赛亚书53章清晰地预言了，基督将要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中保。“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章11节）”

但以理书9章24-26节：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膏抹至圣所（“至圣所”或译：“至圣者”）。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又有六十二个七，耶路撒冷连广场和濠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六十二个七以后，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必像洪水而来；必有争战直到末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弥迦书5章2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伯利恒......细小”有古卷作“以法他家啊，你在犹大诸族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作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因此，耶和华必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直到那要生产的妇人生下儿子来；那时，他其余的兄弟，就必归回以色列人那里。

以赛亚书9章6、7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 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

耶稣基督自己也清晰地宣告说，他来是为了要拯救和救赎罪人。

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约翰福音6章51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这食物，就必活到永远。我要赐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世人的生命而赐的。

马太福音18章11节：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

马太福音26章26-29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必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

基督使徒们也都一致地、清晰地、持续地见证，耶稣基督以他的宝血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

使徒行传2章36-38节："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作什么呢？"彼得说："你们

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希伯来书9章11-15节：但基督已经来了，作了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他经过更大、更完备的会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也就是不属于这被造的世界的）。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了至圣所，就得到了永远的救赎。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可以使他们成为圣洁，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的血呢？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　神，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脱离死行，使我们可以事奉永活的　神吗？因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借着他的死，使人在前约之下的过犯得到救赎，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

希伯来书1章3节：他是　神荣耀的光辉，是　神本质的真象，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作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

以弗所书1章7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约翰福音1章7节：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启示录5章9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加拉太书2章21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使徒行传13章38、39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

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约翰福音3章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翰福音3章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罗马书6章17-23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隶，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以人的观点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隶，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

圣。因为你们作罪的奴隶时，不被义所约束。那么，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时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启示录5章11-13节：我又观看，我听见宝座和活物及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权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